



使用本地劳动力的技术；（5）非本地所能取得，也非短期训练所能掌握的技术；（6）过多地使用进口设备的技术；（7）要花费很高成本才能转让的技术。这些经验值得参考。要吸取其他国家引进技术的经验，对于它们的教训，更该引以为戒，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关于发挥地方优势。中央最近提出的发挥优势、扬长避短的方针，是极其正确的。发挥了各个地区的自然优势和经济优势，才能建立地区的和全国的合理化的经济结构，才能加速四化进程。发挥地方优势和发展商品生产是互为条件的。商品经济不发达，各地只能搞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商品经济发达了，各地就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又促进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发达程度，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合理的经济管理工作。因此不应对商品生产采取限制的政策。过去曾错误地提出各省都要搞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不管有无条件，都大炼钢铁，大搞化肥，经济非常落后的地区也优先发展重工业，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当时曾把我国一个省和欧洲一个国家相比，认为应有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其实欧洲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也不那么独立完整，西欧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都在30%以上，有的高达80%以上，它们充分利用国际贸易的条件来发挥本国的优势。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每个省搞封闭式的所谓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呢？

第四，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问题。从统计数字看，建国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甚至快于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但是，我国人民经济生活却改善得比这些国家都慢，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难。从1957年到1978年的21年中，职工平均工资只增加了1.1%，平均每年只增加0.1%。由于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了。农村社员的收入也增加不多。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缺吃少穿。人民生活改善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没有处理好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长期以来，积累率过高。“一五”时期我国积累率为24.2%，比较适合当时情况。“二五”时期提高到30.8%，“三五”时期为26.3%，“四五”时期为33%，1976年为31.1%，1977年为32.3%，1978年为36.6%。积累率过高是压低消费率的结果。因此必然造成消费水平过低，给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带来消极影响。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直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必须按照这个原则办事，才能处理好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也才能实



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根据当前情况，我国积累率不宜过多。现在仍然偏高，应当争取用几年的时间逐步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现在的关键是压缩基本建设的规模。

要从多方面设法改善人民的生活。要把全国的经济的发展同增进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联系起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增加职工和社员的收入；努力增产群众迫切需要的日用消费品，如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等家用电器产品；要积极改进居民的居住条件。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居住面积仅3.6平方米，低于1952年的4.5平方米，农村居住条件也很差，都应该积极地有步骤地改善。此外，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事业、文化卫生事业，集体福利事业，也都要有适当发展，越办越好，方便和丰富人民的生活。

消费者的需要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决定性的影响。产业结构合理与否，归根到底要看现有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是否能最佳地满足人民物质和生活的需要。为了使产业结构符合消费者的需要，要求改进计划工作，充分利用市场的作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忽视市场问题。资本主义生产苦于市场不足，这是发生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本主义国家有远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很重视国内市场，想方设法扩大国内市场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国内市场无比广大，这应该成为促进生产发展的无比巨大的推动力。



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关系*

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要经常注意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当前调整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同时又要争取一定的发展速度，这个问题就更为重要。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说明的方便，先要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含义作一点解说。所谓经济增长，主要是指生产力的增长，包括经济发展速度。我国经济发展速度通常是用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来反映的。此外也可以用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等指标来反映。有人认为经济增长只是指总产值的增长率，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所谓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由哪些因素组成以及如何组成。经济结构包括生产力结构、生产关系结构等广泛的内容，本文所说的经济结构有时主要是指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

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

从人类社会历史的长过程看，经济结构是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动的，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漫长年代里，生产力极其落后，经济增长十分缓慢，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很慢。例如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几千年都是农业占绝对统治地位，工业和商业所占比重很少，而且难以迅速发展，欧洲一些国家的封建社会没有我国长，但是农业长期占统治地位则是相

* 本文写于1981年1月，曾载《经济研究资料》1982年第4期。部分内容以《合理的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条件》为题刊载于《人民日报》1982年7月26日，署名：彭昊。



似的。这种经济结构长期停滞的状况，是同经济增长极其缓慢相适应的。

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经济结构的变动也加速了。这种情况，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明显看到。例如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工业、服务行业所占的比重，美国 1889 ~ 1899 年分别为 25.8%、37.7%、36.5%，1953 年分别为 5.9%、48.4%、45.7%；日本 1872 ~ 1882 年分别为 64.6%、10.6%、24.8%，1947 ~ 1954 年分别为 24.4%、31.5%、44.1%。美国 1894 ~ 1903 年和 1950 ~ 1954 年间，每 10 年平均人口增长 15%，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33.8%，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6.4%；日本 1893 ~ 1902 年和 1950 ~ 1954 年间，每 10 年平均人口增长 13.3%，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37.9%，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21.7%，它们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是同经济增长较快因而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密切相关的。

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动有一种明显的趋向，就是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劳动就业中，农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工业的比重先增加后减少，服务行业的比重越来越大。有人曾对 1958 年 57 个国家和地区的部门结构、57 个国家和地区的就业结构进行分析，证明上述趋势确实是存在的。^①

表 1 1958 年 57 个国家和地区按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
分组时的部门结构状况

类 别	1	2	3	4	5	6	7	8
国家和地区数	6	6	6	15	6	6	6	6
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元）	51.8	82.6	138	221	360	540	864	1382
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								
农业	53.6	44.6	37.9	32.3	22.5	17.4	11.8	9.2
工业	18.5	22.4	24.6	29.4	35.2	39.5	52.9	50.2
服务行业	27.9	33.0	37.5	38.3	42.3	43.1	35.3	40.6

① 库兹涅茨：《各国经济增长》，第 104、200 页。



表 2 1958 年 57 个国家和地区按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
分组时的就业结构状况

类 别	1	2	3	4	5	6	7	8
国家和地区数	5	6	6	18	6	6	6	6
每人平均国民生产 总值 (美元)	72.3	107	147	218	382	583	979	1 501
劳动力构成 (%)								
农业	79.7	63.9	66.7	59.6	37.8	21.8	18.9	11.6
工业	9.9	15.2	16.0	20.1	30.2	40.9	47.2	48.1
服务行业	10.4	20.9	11.8	20.3	32.0	37.3	33.9	40.3

对一些具体国家进行比较,也可以看到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与产业结构有着内在的联系。下面是 1961 年一些国家的比较,在收入水平愈高的国家,第一次产业所占的比重愈小,第三次产业所占的比重愈大;在收入水平愈低的国家,第一次产业所占的比重愈大,第三次产业所占的比重愈小。

表 3 每人平均国民收入同产业结构的关系 (1961 年)

每人平均国民收入 (美元)	就业构成 (%)			产值构成 (%)			
	第一次 产业	第二次 产业	第三次 产业	第一次 产业	第二次 产业	第三次 产业	
美国	2 310	7.6	35.3	57.1	3.9	38.5	57.6
英国	1 143	3.8	48.5	47.7	3.9	47.3	48.8
联邦德国	1 114	11.8	48.5	39.7	5.1	52.7	42.2
法国	1 031	20.6	39.2	40.2	9.0	46.8	44.2
日本	418	30.9	29.5	39.5	14.6	38.8	46.6
印度	69	72.9	11.4	15.7	46.8	19.4	33.8

上述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是不是偶然的呢?我们认为不是偶然的。

第一,农业比重的下降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方向其他部门转移往往是在农业生产增长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于农业生产增长后超过了需求,加上工业等部门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农业的比重才趋于降低。很多经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所以小,乃是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高,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逐步向工业和其他部门转移。例如美国 1949 ~ 1976



年谷物收获面积减少 20%，农业劳动力几乎减少一半，而产量却提高 74%。1966~1975 年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68%，而制造业仅提高 37%。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大约可以养活 59 人，而西欧为 19.2 人，全世界平均 5.1 人。马克思曾说：“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① 现代经济结构的急剧变化首先是以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的增长为前提的。

第二，工业比重的变化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表明，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劳动就业中的比重先增加后减少，都和经济增长有着内在联系。美国劳动就业中工业的比重 1839 年为 16.2%，1929 年提高到 38.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下降的趋势，1950 年为 34%，1977 年为 27.6%。工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也有下降的趋势，1950 年为 40.4%，1978 年为 34.9%。为什么先增加呢？这是因为工业化过程中对于工业品的需要，包括作为生活资料的工业品和作为生产资料的工业品的需要日益增加，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为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转移提供了前提。为什么后来又减少了呢？这是因为工业发展到一定时期，对服务行业的需要迅速增加，而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为劳动力向服务行业转移提供了前提，因此不仅农业劳动力而且工业劳动力也有一部分向服务行业转移。战后美国劳动力有过两次大转移，一次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其他部门转移，另一次是 70 年代以后工业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一起向服务行业转移。再从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看，轻工业的比重有下降的趋势，重工业的比重有上升的趋势，而重工业正是在农业、轻工业增长的基础上才发展起来的。作为一般规律，工业化是从轻工业开始的，没有工业化初期轻工业的优先增长，重工业发展的资金市场等问题都难以解决。

第三，服务行业比重增加同样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由于工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可以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向服务行业，因此战后一些国家服务行业发展很快。例如美国服务行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1950 年为 51.8%，1978 年提高到 62%，在劳动就业中的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347 页。



重，1950年为55%，1977年提高到68.9%。1950~1977年，美国服务行业人员从3 084万人增加到6 271万人，这期间美国全部雇佣人员由5 613万人增加到9 107万人，增加约3 500万人，其中90%是到服务行业中去的。西方有人估计，美国在教育、科研、情报交流等方面占用的劳动力已接近劳动力总数的一半，这些服务行业人员的增长速度比全部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快一倍半，这也是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或精神的生产的的时间就越多。”^①

第四，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也受经济增长的制约。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增加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增加积累。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积累率并不很高，以后能够提高，正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例如瑞典国内总资本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1861~1970年为5.8%，1871~1880年为8.8%，1881~1890年为10.8%，1911~1920年提高为20.2%，^②这种提高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日本1945~1954年期间国内总资本投资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左右，1955~1964年增长到30%多，这也同经济增长较快、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增加有密切关系。日本的储蓄率1955年为13.4%，1970年为20.7%，储蓄率提高也同经济水平提高有关。这当然不是说生产水平高的国家积累率一定高，但不能否认积累率的高低是以经济水平为基础的。

第五，消费结构也是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动的。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了，消费结构随着也发生变化。战后美国家庭支出构成有很大变化，每100美元支出中，1950年食品占28.1%，服装占11.7%，1978年分别降到21.5%和9%，而医疗保健开支则由4.7%增加到10%，包括通讯开支在内的公用事业支出由4.8%增加到7.8%，住房开支由11.3%增加为16%。美国家庭每支出1美元的食品开支中，流入批发和零售商品多达37美分，和流入农民手中的相等，其他20美分归加工制造商，6美分归运输商。消费结构的这种变化，也是经济增长基础上收入增长的结果。服务行业的发展也是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变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20页。

^② 《经济成长的阶段》，第51页。



的结果。

因此,从国外一些国家的历史看,经济增长对部门结构、就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乃至技术结构、企业规模结构等都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解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动有合理的方面,也有不合理的方面。但总的说,这种变动也同经济增长有内在联系。例如我国农业劳动者的绝对数是增加的,但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则是下降的,1952年占83.1%,1980年占72.1%。工农业劳动者的比例(以工业劳动者为1),1952年为1:13.9,1980年为1:5.6。在工农业总产值中,1949年农业占70%,工业占30%,1980年农业占30%,工业占70%。这些变动是伴随着农业生产增长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而出现的。从1949年到1980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增长2.8倍,1977年我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产值比1952年增长24.8%,比1957年增长11.4%。再如从1952年到1980年,我国积累额由130亿元增加到1195亿元,增加9.2倍,这同生产增长基础上国民收入增加有着联系,同期间国民收入由598亿元增加到3630亿元,增加6.1倍,每人平均国民收入由104元增加到372元,增加3.6倍。正是在此基础上,对工业进行了大量投资,才使工业有较快的发展。再如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也有了变化,情况如表4。这种变化也是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发生的,同期间居民每人平均消费水平由76元增加到175元。

表 4

	1952年(%)	1978年(%)
吃的	56.5	50.9
其中:粮食	22.3	11.0
肉禽蛋	8.1	7.0
穿的	19.3	22.6
用的	20.9	22.2
其中:四大件	0.5	3.4
烧的	3.3	4.3

我们说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当然不是说经济结构完全是由经济增长决定的。事实上,决定经济结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例如产业政策就对经济结构有重要影响。说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也不是说在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或出现负增长时经济结构不会变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经济结构不合理时，为了调整经济结构，有时必须自觉地放慢发展速度。在调整时期，我们就曾有意识地压缩某些部门的生产为扩大另一些部门的生产创造条件，以此来调整经济结构。但是，也应该看到，所谓经济增长率等于零，就是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所谓负增长，就是经济处于萎缩状态，在这两种情况下，虽然经济结构也发生变动，但是国民经济会有很多困难。我国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开始几年经济曾急剧下降，因而带来重重困难，使得难以顺利完成经济调整的任务。因此，调整时期即使有时难免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但我们要尽量缩短其时间。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而从实现经济结构合理化的要求来看，更是要以一定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我们很难设想在经济长期停滞甚至下降的情况下，能够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有的同志认为，把经济增长看成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就是主张速度决定比例。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和速度决定比例是两个含义不同的命题。前一个命题指的是历史上经济结构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动的长期趋势，它并非是说经济结构仅仅由经济增长决定，也不是说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没有制约作用，更不是说不顾经济结构以及比例关系的状况任意决定经济发展速度。后一个命题指的是计划工作中要使比例服从速度，速度定得越高越好，并且把坚持综合平衡说成是消极平衡，把破坏综合平衡说成是积极平衡，因此这是一种为盲目追求高速度辩护的理论，是“左”倾指导思想的表现，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从前一个命题及其依据的事实，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得出后一个命题来的。

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制约作用

以上说明了，作为一种长期历史趋势，经济结构是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动的。但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关系，仅仅看到这一方面是不全面的，因为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也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过去我们对这方面的影响重视得很不够，例如长期忽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对发展速度的制约作用。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重要



性，懂得应该正确处理速度和比例的关系。但是，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例关系的影响远不是它们全部内容。我们应该更全面地探讨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结构主要从哪些方面影响经济增长呢？

第一，影响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全部社会生产分成两大部类，分析了社会再生产中两大部类之间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关系，指出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处理好两大部类的关系，这就是生产资料部门应该生产出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实现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部门应该生产出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实现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这个条件能否得到保证，决定于经济结构的状况。经济结构合理，才能保证满足扩大再生产对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要求。在我国，生活资料主要是由农业、轻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主要是由重工业提供的，因此，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必须协调发展，保证两大部类之间有合适的比例关系。但是，实际上我国农轻重关系长期不协调，发展速度过分悬殊，导致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失调，主要是生活资料严重落后于生产资料，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前我们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也努力生产日用消费品，首先就是为了在两大部类之间建立起比较协调的比例关系。

第二，影响两大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

两大部类之间的一定比例是实现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但远不是充分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社会再生产时，除了分析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外，还分析了各个部类内部的交换关系，如第一部类内部不同生产资料的交换，第二部类内部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的交换，指出这些部类内部也要求一定的比例。可见，合理的经济结构也应该保证两大部类有合适的比例关系。过去我们对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重视不够，对各个部类内部的比例也缺少应有的重视。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也表现在两大部类内部比例关系失调。例如生活资料虽然总的来说是数量太少不能满足需要，但是也存在着有些生活资料产品严重积压的现象，例如现在涤棉布、化纤长丝织物、收音机等就存在着积压现象。这是轻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等原因造成的。农业内部也有一个结构合理化的问题，例如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要有恰当的比例关系，要保证城市蔬



菜和肉类的供应等等。现在农业内部结构也有不合理之处。长期来我国生产资料内部比例失调现象更为严重。这主要是重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如冶金工业中矿山落后，轧钢落后，有色金属落后，机床加工能力大于钢材供应能力，能源工业落后，等等。在工业化过程中是存在着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趋势的。而要使生产资料恰当地优先增长，不仅要处理好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而且要处理好第一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列宁曾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意味着“不断增长着的某一部分生产资料的产品，是靠该部门内部的交换，即生产资料与生产资料的交换来实现的。”^①因此，生产资料内部产品结构对生产资料合理地优先增长有重要的制约作用。重工业内部结构合理，才能保证第一部类内部有合理的比例关系，使生产资料能够合理地优先增长。

第三，影响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

社会化生产是生产和流通的统一。合理的经济结构不仅要保证生产过程顺利进行，而且要保证流通过程顺利进行。如果部门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规模结构不合理，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就要受到阻碍。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尤其要注意经济结构通过流通过程产生的影响。在存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流通不仅是再生产过程的必要阶段，而且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条件。长期来我国商业服务业落后，流通渠道受阻，这是国民经济不能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交通运输部门的作用也绝不能低估。马克思曾说：“产品从一个生产场所运到另一个生产场所以后，接着还有完成的产品从生产领域运到消费领域。产品只有完成这个任务，才是现成的消费品”^②，交通运输落后必然阻碍生产和流通。我们常说交通运输应该先行，但事实上长期来交通运输不是先行，而是后行。现在许多地区用煤非常紧张，但有些地区却有大量存煤运不出来。总之，经济结构不合理会导致周转时间长，流通费用多，积压严重，不仅妨碍生产过程而且妨碍流通过程顺利进行。应该指出，即使在两大部类之间和内部有协调的比例关系，但如果流通过程受到阻碍，社会再生产也难以顺利进行。

第四，影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国民经济才能迅速发展，因此，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1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68页。



合理的经济结构也应该保证生产力诸要素的正确结合和充分利用。这就要求根据资金、技术、劳动力的情况和其他情况，正确地部署资金集约型产业、技术集约型产业和劳动集约型产业。目前我国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更没有得到合理利用。一方面设备利用率低，产品库存多，另一方面不少待业人员需要就业，就业人员人浮于事的現象也相当严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经济结构不合理是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现在劳动力比较充裕，资金则比较紧张，因此，在发展必要的资金集约型产业、技术集约型产业外，要多发展一些劳动集约型产业，同时要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作用。过去轻工业长期被挤、商业服务业不发达，集体所有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从而影响劳动集约型产业的发展，不能使更多的人就业。我国早就提出工业中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的方针，这是正确的，但过去执行中有不少缺点，既存在着盲目引进先进技术的失误，也存在着很多小型企业消耗过多得不偿失的現象。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也必然使得现有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

第五，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现代化社会大生产中，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合理的经济结构应该保证科学技术较快发展，使科学技术较快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就要求在宏观经济结构和微观经济结构中正确处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关系，例如在产业结构中要有先进的机械工业，给整个国民经济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在分配结构中要使科学技术发展有必要的资金和物资保证；在企业组织结构中要使生产发展和技术革新密切结合起来；在投资结构中要重视现有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等等。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也表现在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明显的例子是机械工业臃肿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解放后我国机械工业发展很快，机床拥有量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的，但是结构很不合理，有人说是个“虚胖子”。目前机械工业的状况是，一方面普遍存在生产任务不足，不少生产设备闲置，很多工人没活干；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低，很多生产任务又承担不了。既“吃不饱”，又“吃不了”，“吃不饱”往往也由于“吃不了”。由于长期不注意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我国机械工业设备老化、工艺老化、技术人员知识老化等現象都比较严重。如何使经济结构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应该十分重视的问题。



第六，影响经济效果。

经济效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提高经济效果，才有可能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增加积累，积累增加了，加上投资效果较好，才会有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结构则从多方面影响经济效果。例如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两大部类以及各个部类内部关系不协调，生产流通过程受阻，就既影响客观经济效果，也影响微观经济效果。又如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存在着“大而全”、“小而全”等现象，限制着专业化的发展，也难以充分发挥分工协作对提高经济效果的作用。再如由于基建规模和投资结构不合理也影响着投资效果的提高。我国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结构不合理以及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等原因，现在经济效果比“一五”时期下降很多。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1957年为34.7元，1980年为24.8元；全国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一五”时期为35元，“五五”时期为23元；每万吨能源（标准煤）提供的国民收入，“一五”时期为1168万元，“五五”时期为529万元。当前财政有赤字，资金、能源等方面有困难，都是同经济效果差分不开的。

第七，影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和源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理的经济结构必须保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重要标志和特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得到实现，才能激发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过去一段时期内我们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现在我们正在按照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以消费资料生产为中心来安排国民经济比例，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这是国民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一个重要条件。

此外，合理的经济结构还意味着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充分发挥先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现阶段我国应该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并逐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这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要求。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充分表明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一五”时期我们非常重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根据当



时的条件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并注意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基本建设和生产的关系。由于国民经济中主要比例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因此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而且比较稳定，并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初期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打好了基础。但从1958年开始，由于追求不切合实际的高速度，破坏了综合平衡，导致工业挤农业，重工业挤轻工业，积累挤消费，基本建设挤生产维修，从而使得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58~1959年虽然工业生产速度很高，但这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并导致以后工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下降。经过20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从1963年开始，国民经济才迅速恢复发展起来。70年代我们又继续犯了盲目追求高速度的错误，使经济结构的状况不仅得不到改进而且趋于恶化，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以后坚决贯彻这一方针，才开始扭转经济结构恶化的状况，逐步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使今后的经济增长能够在经济结构日趋合理的基础上实现。由此可见，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是绝不能忽视的。

认真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

由于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因此不仅社会主义国家重视经济结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也重视经济结构问题。很多国家都注意根据国内外的具体情况，通过各种经济政策措施不断调整经济结构，使之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为了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关系，我们要认真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国家处理经济结构的经验教训。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对抗性矛盾，存在着生产无政府状态，经济结构的发展有很大的盲目性，同时它们调整经济结构是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但是，也要看到，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在生产力结构方面有共同点，因此，它们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有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尤其是一些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有100多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积



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教训，从中可以揭示一些规律性。例如，它们在以下一些方面的经验就值得认真研究：

关于处理农、轻、重关系：经济发达国家大都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如美国政府历来很重视农业，美国经济发达，同有发达的农业是分不开的。英法等国家地少人多，但也想方设法发展农业，保证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战后日本农业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也起了积极作用。1961年日本政府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此相适应，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实施的结果，加速了农业的现代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从1950年到1975年，稻米的商品率由49.5%提高到80.8%，白菜由42.7%提高到86.2%，苹果由74.1%提高到98.7%，鸡蛋由50.9%提高到99.5%。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向其他行业转移，保证了工业和服务行业对劳动力的需要。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大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的，这是合乎规律的，因为当时发展轻工业易于解决原料、资金、市场、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即使后来重工业占优势了，为了调整产业结构，资本主义国家有时仍然有意识地优先发展轻工业，例如日本战后恢复时期就曾优先发展轻工业，轻工业的比重由1947年的43.5%提高到1950年的55.8%。它们到了工业化的一定阶段，重工业优先发展起来，这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要求。日本1955~1970年工业（包括矿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4.8%，其中钢铁工业为16.5%，机械工业为21.4%，石油煤炭制品为18%。这一时期重化学工业的优先发展对经济高速增长起了很大作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而且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关于确定重点产业部门：合理的经济结构既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又要求有合适的重点产业部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的历史看，大致情况是：第一个时期（一般在19世纪60、70年代）以纺织工业为重点；第二个时期（19世纪60、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煤炭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工业等部门为重点；第三个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除钢铁工业仍为重点外，汽车工业、航空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也开始成为重点；第四个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开



始成为重点。一个国家的重点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美国的钢铁工业、汽车工业和建筑业被认为是经济的三大支柱，这些部门产值大，就业人数多，与其他部门关系密切。例如，建筑业从业人员超过 380 人，每年消费钢铁产量的 $\frac{1}{10}$ ，水泥玻璃砖瓦的 $\frac{7}{10}$ ，木材的 $\frac{2}{5}$ ，油漆的 $\frac{1}{2}$ ，并占用全国运输量近 $\frac{1}{10}$ ，它的状况对许多工业部门的生产就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都有很大的影响。^① 此外，一些国家的政府很重视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港口、通讯、住宅等建设以及公用事业环境保护等等。同时能源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

关于解决就业问题：为了解决劳动就业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根据不同时期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的状况确定不同的产业政策。例如在劳动力相对充裕的情况下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资金相对富裕的情况下多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在原材料动力紧张的情况下多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存在失业问题，它们为了解决失业问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发展服务行业。联邦德国为了发展服务行业，增加了这方面的投资，在总投资中服务行业的投资 1960 年占 34.5%，1976 年提高到 44%，服务行业吸收了 1950 ~ 1978 年期间联邦德国新增加的大部分就业人员。在经济危机时期，联邦德国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所谓“反危机”措施，包括：（1）扩大公共投资，增加就业门路；（2）刺激私人投资，创造就业机会；（3）扩大“改行”训练，使人们易于改换行业工种和工作地点；（4）提前退休；（5）延期参加工作和推迟毕业离校日期；（6）缩短工时，等等。^② 这些措施当然不能根治资本主义失业的痼疾，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关于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好分配领域的结构尤其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快，是同积累率高分不开的。1964 ~ 1968 年日本固定资本总投资率为 30.8%，美国、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分别为 16.9%、24.8%、25.7%、19%；1969 ~ 1973 年日本为 36.5%，美国、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分别为 17.1%、26.4%、26.3%、19.6%。日本比这些国家都高，加上投资效果好，因此日本的增长率比这些国家也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积累率高是在经济增长快的基础上实现的，在提高积累率的同时保证了消费有

① 《世界经济》第 1 册，第 41 页。

②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第 106 ~ 107 页。



所增加。1973年同1955年相比,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加5.4倍,实际国内总积累增加11.1倍,实际个人消费增加4.4倍,实际工资增加3倍。日本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1951~1960年平均增长5%,1961~1970年平均增长6.4%,1971~1975年平均增长6%。由于工资增长较快,日本工人工资与美欧工人工资的差距不断缩小,并已超过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工资水平。工人工资的增长造成了国内市场的扩大。日本虽然很重视国外市场,但国内市场还是主要的,工业制成品的70%左右是靠国内市场销售的。国内市场的扩大是日本战后工业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再如资本主义国家使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互相适应的经验教训,也是应该研究的。

关于处理技术结构:资本主义国家都很注意技术革新,同时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战后日本在这方面的成绩尤为明显。据日本《产业合理化白皮书》估计,1950~1953年日本的技术水平比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落后20年到30年。由于日本采取积极引进技术的方针,广泛利用世界先进技术成果,促进本国技术的全面革新,因而以较快的速度和较低的代价缩短了同欧美国家的技术差距。从战争结束到1970年4月,日本向国外购买了约13 000件许可证和专利权,其代价和推行费用大约60亿美元,而产生这些成果的直接和间接研究试验费用估计约为1 800亿~2 000亿美元,可见引进技术可以节约大量资金。引进先进技术还可以争取时间,把一项科学构思用于生产所需的时间大约为10~15年,而引进专利用于生产平均只需5年左右,有的更短。日本引进技术十分注意经济效益,并注意把引进技术同加强本国科技力量结合起来。它们对于每一项引进技术都花费更多的经费和投入科技力量去研究和掌握,并且积极推广和改进。在注意广泛使用先进技术的同时,日本也保留着大量相对落后的技术。所谓日本的两重经济结构,就意味着先进技术和相对落后技术并存,这并不是偶然的。

与技术结构相联系的是固定资本投资中用于更新和新建的比例问题。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用于更新的投资有上升的趋势,用于新建的投资则相对下降。例如美国战后固定资本和机器设备中用于更新和新建的比重如下:



表 5

年 份	固定资产投资 ^① 中		机器设备投资中	
	更新的比重	新建的比重	更新的比重	新建的比重
1947 ~ 1950 年	55	45	51	49
1951 ~ 1955 年	71	29	76	24
1956 ~ 1960 年	74	26	87	13
1961 ~ 1965 年	71	29	80	20
1966 ~ 1970 年	65	35	71	29
1971 ~ 1978 年	77	23	81	19
1947 ~ 1978 年累计	69	31	77	23

可见，不论是固定资产投资还是机器设备投资，用于更新的都是增加趋势，而用于改造的则是减少趋势。这同生产集约化程度加深是有内在联系的，是它走内涵扩大再生产道路的表现。

关于处理企业规模结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大企业兼并中小企业的趋势，但是中小企业还是大量存在的。美国在 19 世纪有 30 万个企业，其中绝大多数是小企业。近几十年来，小企业数量急剧增长，每年新出现 40 万 ~ 50 万家，在竞争中倒闭和被大公司收买的约 25 万家，每年约增加 20 万家。美国现有企业 1 297 万个，其中最大的公司只有 1 500 家左右，小企业有 1 000 万家左右^②，其中雇佣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就有 550 万家左右。小企业占国内全部厂商的 97%，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0%。美国政府很注意扶助小企业的发展，以保持自由竞争和更多的就业机会，稳定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和社会秩序。由于小企业有较大的灵活性，便于在某一个产品上精益求精，能为大企业生产高精尖产品提供优质的零部件，大企业需要中小企业提供的零部件越来越多。在美国科学技术成果中，一大半是中小企业创造出来的。日本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③。在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中，中小企业的企业数都在 97% 以上，甚至高达 99%；从业人员在制造业、建筑业中占 70% ~ 80%，在矿业占 50%；产值约占 50% 左右。日本政府也很重视处理好

① 固定资产投资中不包括住宅投资。

② 美国小企业的标准是：制造业从业人员在 250 人以内者；批发者连续 3 年销售额不超过 951 万美元者；服务零售年销售额不超过 200 万美元者；建筑业年毛收入不超过 950 万美元者。

③ 根据日本现行规定，中小企业是指制造业资本在 1 亿日元以下，从业人员在 300 人以下者，批发商业资本在 3 000 万日元以下，从业人员在 100 人以下者。



大中小企业的关系问题，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美国等国家在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组织大中小企业方面也积累了经验。

关于发展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是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增长有超过生产增长的趋势，下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和制成品出口的动态对比^①（1913年=100）：

表 6

	1929	1937	1948	1953	1968	1973
制造业产品	145	168	211	293	466	848
工业品出口总额	129	107	116	175	338	923
出口与生产的增长速度对比	89	64	55	60	72	109

再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和制成品出口的动态，也可以看到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比生产增长速度快。

表 7 1963 ~ 1967 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

	工业生产	制成品出口
日 本	10.5	16.0
法 国	6.5	11.0
联邦德国	5.7	10.7
美 国	5.1	8.3
英 国	3.0	6.5
12 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合计	6.0	10.6

在一些国家里，不少工业部门的出口产品所占比重很高，例如瑞士化工产品 80% 供出口，英国的机器制造业产品 1/3 以上供出口。不少发达国家在钢铁、化工机械等方面的产品，一面大量出口，一面又大量进口。因为每个国家不可能任何工业产品品种齐全，实行产品品种专业化通过国际贸易互通有无更有利。资本主义国家注意通过对外贸易发挥本国资源、劳动力、科学技术的优势，这方面的经验也有可取的地方。

以上我们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经济政策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意在引起大家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以及有

^① 《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下册，第 86 页。



关的其他问题。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因此不可能建立起完全合理的经济结构，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危机。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全有可能建立起比资本主义合理得多的经济结构，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完成的任务。



城市的作用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一些大中城市在地区范围甚至全国范围内起着经济中心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充分而又正确地发挥城市的作用，就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反之，如果不重视发挥城市的作用，不仅城市经济的发展会遇到困难，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阻挠。当前，我们面临着调整国民经济，实现经济结构合理化的重要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深入研究城市在经济结构演变中的作用，研究如何发挥城市的作用以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十分必要的。

城市发展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城市早就出现了，但是迅速发展则是近代的事情。据联合国统计，1920 年世界上拥有 2 万人以上的城镇，其总人口为 2.5 亿人，到 1960 年，就增加到 7.5 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由 14% 增至 25%。建国以来我国城市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53 年全国（不包括台湾省，下同）共有城市 166 个，1979 年增加到 203 个，其中 50 万人以上的城市由 25 个增加到 69 个。我国城镇人口占人口的比重增加不多，但城镇人口的绝对数增加很多，1949 年为 5 765 万人，1979 年增加到 12 862 万人，增加一倍多。

城市发展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些影响与城市的特征有直接的关系。城市的主要特征有：第一，人口集中。现在世界上已经出

* 本文写于 1982 年 1 月，曾载《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2 年第 6 期。



现了不少人口在 1 000 万人以上的大城市，1979 年我国城市人口超过 200 万的有上海、北京、天津、沈阳、武汉、广州等市，其中上海市为 588.4 万人，北京市为 434.1 万人，天津市为 365.9 万人。第二，有发达的商业。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一般都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马克思曾说：“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① 现代城市不仅有发达的国内贸易，而且有发达的国际贸易。第三，工业一般比较发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商业的统治权现在也是和大工业的各种条件的或大或小的优势结合在一起的”。^② 我国工业主要集中在城市，一些起经济中心作用的城市都有发达的工业。1979 年我国 200 个城市在全国所占的比重是：人口占 12.7%，工业总产值占 71.2%，工业企业利润税金占 78.8%，其中上海、北京、天津等 15 个中心城市工业总产值占全国 37.1%。第四，有发达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城市不仅有发达的水陆运输，而且有发达的空中运输，同时还有发达的通讯邮电事业。第五，有发达的科学教育事业。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院校大都集中在城市，1979 年我国 200 个城市共有高等院校 629 所（包括各类分校），有教职工 51.6 万人，占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工总数的 90%，高等学校在校学生 81 万人，占全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的 79.4%。第六，和周围地区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城市和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包括人口的流动、商业的联系、工业的联系、交通运输的联系、通讯邮电的联系、金融的联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联系等。正是由于这种紧密的联系，使一些城市成为地区范围内甚至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中心。此外，一些城市还是政治中心。

城市的以上特征使得城市经济结构具有很多不同于农村经济结构的特点，同时对农村经济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随着城市的发展，国民经济结构也必然发生着一系列重要变化：

首先，由于城市的发展，所有制结构才发生急剧的变动。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是在城市取得胜利的。城市是商品经济的集中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

^{①②} 《资本论》第三卷，第 371、372 页。



的生产关系在城市发展起来，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本家还以城市为依托，利用掌握的工业、商业、金融等等改造农村，加快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使农业生产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列宁曾说，“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它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刻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① 城市中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所有制也是首先在城市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从我国历史看，正是由于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和发展了国营经济，加上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城市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不断巩固和发展，才为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前提条件。

其次，产业结构也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一个显著变化是工业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而工业是以城市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有些地方则由于工业的发展而形成了新兴城市。由于工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城市工业结构的变动对全国工业结构的变动有决定性的影响。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农业的比重下降。这和城市的发展也密切相关。城市工业是在农业发展基础上得到发展的，但城市工业又能促进农业的发展，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人口日趋减少，从而使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在劳动就业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再一个显著变化是商业服务业的地位日趋重要，比重不断增加。而城市商业服务业在整个商业服务业中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城市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才为商业服务业更快发展提供了条件。在近代和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增长，国民经济中第一次产业的比重呈减少趋势，第二次产业先增加后减少，第三次产业呈增加趋势，这种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发展的结果。

再次，技术结构也要发生变化。近代现代社会中技术结构也发生急剧的变化，例如存在着一种由手工劳动到机械化到自动化的趋势，工艺、原材料、能源等方面的技术也在迅速进步着。城市对技术进步和技术结构变动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一是城市工业技术结构上的变动。这种变动决定着整个工业技术结构的变动。二是农业技术结构的变动。农业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44页。



依靠工业提供生产资料，农业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依靠城市工业的支援。三是城市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发展。如前所说，科学研究机关大都集中在城市，城市科学研究事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四是城市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成果的利用推广都离不开人民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由于城市在文化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因而也从这方面对技术进步产生深远影响。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城市特别是经济中心城市是技术结构变动的基地。

又次，地区结构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形成了某些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经济区，城市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一定的自然经济条件是形成经济区的基础。同时必须有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经济区才有自己的生产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运输中心、科学技术中心和教育中心，从而经济区才真正建立起来，才能发挥本地区的自然经济优势。各个经济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主要是依靠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维持和发展的。经济区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于该区内经济中心向周围的辐射情况。因此城市也从多方面影响地区结构的演变。

最后，消费结构的变化。城市的消费结构和乡村不同，我国乡村居民消费中自给自足部分占相当大的比重，城市居民的消费品则完全商品化了，而且在很长时期内城市比乡村消费水平高。例如1979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为197元，其中农民为152元，非农业居民为406元。城市居民由于收入水平高，支出中不仅用于衣着、住宅、交通等方面支出的比重大，而且用于教育卫生文化娱乐等支出的比重也大，城市建设事业的发展也为城市居民过比较优裕的生活提供了条件。人们的生活方式是相互影响的，城市生活方式消费结构往往为乡村所仿效。例如电影、电视等都是先在城市普及然后扩展到农村的。城市的精神文明也对农村有重要的影响。随着国民经济中城市经济比重的增加，城市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将越来越起重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很重视城市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运动。”^①恩格斯也说过：“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②恩格斯早就指出城市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7页。



的发展唤起了无产阶级的觉醒，推动了工人阶级社会意识的发展。例如他说：“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① 列宁进一步指出了中心城市是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他说：“大家知道，在现代各个国家甚至在俄国，城市的发展要比乡村迅速得多，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②

应该指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城市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是有其不同的特点的。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因此城市的发展规律不相同，城市工作的方针也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城市本身存在着对抗，而且城市剥削着农村。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了剥削，城市工作以为全体人民服务为目标，以城乡共同繁荣为目标。具体说来，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对经济结构影响的特点在于：第一，资本主义城市具有的对抗性、寄生性、腐朽性可以消除了。第二，城市不再自发地发展而可以有计划地发展。第三，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城市的积极作用并防止和克服其消极作用。第四，不仅可以有效地建立起合理的城市经济结构，而且可以带动乡村建立起合理的经济结构，促进所在地区和全国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当然，由于我国至今不少城市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不高，生产力水平仍较低，这不能不限制城市作用的发挥。同时我们在发挥城市作用方面缺少经验，难免对城市的作用有所忽视，甚至犯一些错误。对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应当加以总结。

我国城市经济结构的发展和现状

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城市将处于政治经济的领导地位。他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07页。

②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64页。



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①他明确提出城市工作应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②解放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城市建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我国城市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城市经济结构有了巨大变化。概括起来主要变化有：

第一，城市由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变成了社会主义性质。

城市性质是由社会的性质决定的，解放前我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城市也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剥削中国人民的据点。解放后我们对城市进行了改造，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城市也变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现在城市中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优势。据 1979 年全国 200 个城市的统计，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 2 453.2 亿元中，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为 2 310.4 亿元，占 94.1%。城市工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

第二，由消费城市变成了生产城市。

解放前我国的城市大都是消费城市，工业生产微不足道，商业不是为发展生产服务，而是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中国人民服务的，是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服务的。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的必然特征。解放以后，由于贯彻党提出的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方针，我们的城市已经逐步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了。如北京市解放前工业寥寥无几，连牙膏、香皂等也是靠外埠供应。经过解放后 30 多年的建设，北京市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工业总产值增加了 200 多倍，已经成为门类比较齐全的新兴工业基地之一。现在有人对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方针提出质疑，我们认为，尽管贯彻这个方针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例如北京市长期来没有按照作为一个首都的要求进行建设，但是，作为解放后改造城市的一般方针，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方针是正确的，没有理由加以否定。

第三，由单纯的商业城市变成了工业和商业一起发展的城市。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28、1429 页。



解放前我国没有发展工业的社会经济条件，工业难以发展，一些大城市基本上也是单纯的商业城市。解放后情况起了变化，城市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了。例如我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解放前工业也很不发达，全市工业产值只有 23 亿多元，主要是一些轻纺工业，轻纺工业所需要的机械设备、钢材和化工原料基本依靠进口，重工业产值只占 13.6%，机械工业只能修修配配，电子工业基本上是个空白。现在上海已经建成了工业门类齐全、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协作配套较好的工业生产体系。钢产量已从解放初的 5 000 吨发展到现在的 500 万吨，增长了近 1 000 倍。钢材自给率已达到 80% ~ 90%，90% 左右的化工产品为本市工业配套生产的。机械工业和电子工业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四，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尽管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放松了城市建设，但是解放以来在这方面还是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粉碎“四人帮”以后加快了城市建设的步伐，城市住宅竣工面积和公共设施能力普遍有较大的增长。我国城市公用事业新增固定资产“一五”时期为 12.94 亿元，“二五”时期为 22.82 亿元，1963 ~ 1965 年为 11.02 亿元，“三五”时期为 11.59 亿元，“四五”时期为 23.06 亿元，1976 ~ 1979 年为 42.02 亿元。下面是近五年来城市一些公共设施能力增长的情况：

表 1

年份	水厂供水能力 (万吨/日)	公共汽车年底 实有量(辆)	城市道路总长度 (公里)
1976	2 202	22 581	26 489
1980	2 979	32 098	29 485
	人工煤气年供应量 (万立方米)	石油液化气年供应量 (吨)	下水道总长度 (公里)
1976	174 203	137 590	18 269
1980	195 491	290 460	21 860

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结构的改善对国民经济起了积极作用。城市对农村建设，大中城市对小城市建设，沿海城市对内地建设都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发挥了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长时期受“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我国城市经济结构也存在不少严重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但是完全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主要问题有：



第一，所有制结构不合理。

主要是没有充分发挥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作用，同时对发挥个体经济的作用也走过弯路。曾经存在一种理论，认为集体所有制无条件地比个体所有制优越，全民所有制无条件地比集体所有制优越，因此不仅歧视甚至取消一切个体经济，而且急于把小集体合并为大集体，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或者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制，实际上采用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管理体制或管理方法，使集体所有制徒有其名。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同时很不平衡，即使在大中城市，也不仅要充分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作用，而且要允许一部分个体经济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这样才有利于充分利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有利于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服务业，才有利于劳动就业，才有利于方便和改善群众生活。很多城市商业、服务业落后，待业人员多，是同所有制结构不合理有关的。为了实现城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合理化，充分发挥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一定要十分重视并处理好城市所有制结构问题。

第二，工业部门结构不合理。

突出问题是重工业比重过大，轻工业比重过小，而且轻重工业内部的结构也不合理。例如北京市 1957 年轻工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为 58.2%，重工业为 41.8%，大跃进以后“钢铁升帐”，1960 年重工业上升为 57.4%，轻工业下降为 42.6%，经过三年调整轻工业有所回升，达 45.1%，十年动乱中轻工业比重又下降，1978 年轻工业占 35.5%，重工业占 64.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调整方针，轻工业的比重正在逐步回升，1980 年轻工业的比重为 39.7%，重工业为 60.3%。“重重轻轻”的指导思想给首都工业和城市建设带来很多问题，如能源消耗多，工业用水多，三废污染严重，轻纺工业在数量、品种、质量上都远不能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与首都的地位极不相称。再如上海市重工业的生产规模也搞得过大，现在上海炼钢每年要调进矿石、生铁、炼焦煤等近 3 000 万吨，生产的钢材近 2/3 要外调，能耗占全市工业用能的 1/3 以上。上海重工业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如冶金工业内部有色金属不能满足需要，钢材中用于轻纺工业原材料的还只有一小部分，相当一部分钢材还要进口；机械工业长期以来重视生产资料的生产，忽视消费资料的生产，重视为基本建设服务，忽视为技术改造服务，重视国内需要，忽视出口需要；军用机械工业生产单一的军需品，忽视军民结



合。上海轻工业内部结构也存在问题。这些都不利于本市建设和全国工业的合理布局，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从很多城市的情况，还可以看到工业结构没有考虑到本市和所在地区的自然经济特点，因而不利于发挥经济优势。

第三，商业服务业落后。

这也是我国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例如广州市 1980 年与 1955 年相比，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由 7.6 万多个减为不到 1.4 万个，就业人数由占全市就业人数的 23.34% 降为 12.2%，全市平均每千人分摊到的商业饮食服务业人员由 86 人减为 42 人，至今仍未恢复到 1957 年水平。再如青岛市解放后商业机构和网点经过两次大削减，现在市区每千人仅有网点 2.62 处，服务人员 27 人。商业服务业落后的原因之一是对商业服务业的地位、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片面地理解和执行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方针。长期以来曾认为只要发展工业就行了，至于商业服务业则是不重要的，甚至用削减商业服务业的方法来发展工业。事实上，商业服务业和工业一样是城市的重要经济部门，它们都是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和必要环节，城市由于人口集中，又是商业中心，商业服务业的地位作用更为重要。而且，工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商业服务业的相应发展。商业服务业落后不仅使城市难以充分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而且给城市人民生活增加了不便，减少了就业门路。据有关部门统计，1957 年底全国城镇就业人数 3 205 万人中，第一、二产业就业人数为 1 490 万人，占 46.5%，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为 1 715 万人，占 53.5%，第一、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之比为 1:1.15。1980 年底，在全国城镇就业人数 10 525 万人中，第一、二产业就业人数猛增到 6 448 万人，占 61.3%，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为 4 077 万人，占 38.7%。第一、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之比为 1:0.63。如果恢复到 1957 年的劳动就业结构，在第一、二产业就业人数不增加情况下，第三产业还可容纳 3 300 多万人就业。今后 10 年内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预计有 3 700 万人，据此计算，依靠发展第三产业就可基本上把城镇待业的劳动力安排下来。

第四，工业商业的组织结构不合理。

工业中由于领导多头、管理分散等原因，组织结构很不合理。如北京市现有工业企业 3 725 个（不包括农村队办企业），分别由中央各部和地方管理。就地方所属的 3 582 个工业企业而言，分别由市属 24 个



局和 19 个区县领导，这些局区县又分属市政府的 9 个口。这种分散管理导致工厂大而全、小而全、专业化协作水平低以及不必要的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北京机械工业局所属 146 个企业中，70% 是自己完成所有加工工艺和大部分零部件制作的全能厂。由于都按全能厂的模式建厂，生产建设中浪费十分严重。全市有 608 个电镀点，490 个热处理点，346 个铸锻点，设备利用率都很低。全市 55 个单位有制氧设备，利用率不到 60%，有些单位用氧放氮，有些单位用氮放氧，总共每小时放空氧气约 3 000 立方米，放空氮气近 20 000 立方米。再如沈阳市工业企业按隶属关系可以划分为中央、省、市、区、街五级，按归口关系可以分为几十个部门，各部门都自成体系。仅沈阳市机电局系统就有铸造厂点 48 个，专业化水平 44.4%；锻造厂点 34 个，专业化水平 31%；电镀点 32 个，专业化水平 27%；热处理厂点 83 个，专业化水平只有 8.7%。

商业组织结构也很不合理。据反映，沈阳市在同一市场上二、三级站并存，形成两套重复的批发机构，造成生产与收购销售脱节；二级站不负责安排生产和组织沈阳市场，用行政手段实行买卖；三级站要负责沈阳市场的供需，但又不负责储备任务，没有调节手段，无力支持生产；因而造成市场分割，迂回运输，周转延长，费用增加，不仅影响本市的商品供应，而且影响同其他地区的商品交流。

第五，技术结构不合理。

由于长时期重视新建而忽视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导致生产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例如上海工业设备的老化现象相当严重，各工业局现有设备中 20 世纪 30、40 年代水平的估计占一半以上，具有 60、70 年代水平的只有百分之十几。厂房拥挤，三废污染严重，老企业越搞越瘦，而担子越挑越重。技术落后导致产品结构落后。北京市电子仪表工业局 1 321 个产品品种，属于 50 年代的占 32%，60 年代的占 56%，70 年代的占 12%；机械工业局机床行业多是仿苏 40、50 年代的产品，大型精密等关键品种仅占 5%；纺织工业高档产品仅占 13%；轻工食品工业都很落后，婴儿食品、儿童食品、旅游食品、方便食品、疗效食品等基本上还是个空白。

第六，基础结构落后。

我们长期忽视了城市公用事业建设，导致目前城市基础结构十分落



后。国民经济各部门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中，城市的公用事业所占比重“一五”时期为2.8%，“二五”时期为2.7%，1963~1965年为3.1%，“三五”时期为2.1%，“四五”时期为2.2%。总的减少趋势。由于城市建设投资过少，城市供水、供电、道路、住宅、交通、邮电等方面欠债很多。即使是大城市，通讯设备也很差。如广州市目前电话装机容量21 700部，仅比解放前增加10 000部，平均每百人拥有0.7部，而且设备陈旧，接通率低。以上情况都严重妨碍着城市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

城市公用事业也有一个组织结构合理化的问题。据广州市反映，广州地区的港口码头车站电讯等系统分别属于中央或省的不同部门垂直领导，市里没有自己的港口码头，也管不了邮电通讯，不能对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作统一的规划和管理，使各部门、各行业相互牵制，很不协调。这也是调整结构改革体制中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此外，很多大中城市还有人口失去合理调节和控制的问题。由于存在以上问题，加上一段时期内我们指导思想和工作上的失误，使得不少城市的经济效果很差，不能有效地促进技术改造，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带动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健康发展，因而也没有充分发挥城市作为经济中心应该发挥的作用。

发挥城市的作用，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怎样在调整经济结构中发挥城市的作用呢？这是一个要从多方面解决而且要不断解决的问题，当前主要应着手抓好以下工作：

第一，充分认识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过去城市作用发挥不够，是同人们缺乏认识有关的。长期存在着一种急于缩小城乡差别的主张。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是要消灭城乡差别的，但是并不认为可以用限制城市发展的办法来缩小城乡差别，正确的道路应该是充分发挥城市的积极作用来带动农村发展，在城乡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和最终消灭城乡差别。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时间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城市作用的发挥。

人为地限制城市的作用还由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意义缺



乏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存在商品生产，不重视发展商品生产，就难以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经济也就难以顺利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这一点并不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相反是发挥它们积极作用的有利条件。对商品生产的意义有了足够的估计，也就会重视城市的作用了。

长时期内我们忽视经济效益问题，这是忽视商品生产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导致我们忽视城市的作用。经济效益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大城市的经济效果一般高得多，并且有提高经济效果的有利条件。我们要足够重视城市这方面的作用，利用城市来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现在大中城市开始引起我们注意了，但同样要注意小城镇的作用。发展小城镇是我们今后的方向。小城镇对农村发展有重要作用。它能够通过销售农产品，进行农产品加工，给农民提供技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促进农业不断发展，并使农业生产纳入国家计划，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国城乡关系要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的特点之一是将出现大量小城镇。这种小城镇应该兼有城乡的优点，不是乡村，同时保持乡村的优越性。现在大城市规模失控，发展小城镇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制定有科学根据的城市发展规划。

为了制定有科学根据的城市发展规划，要求有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规划。城市不能离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除“一五”计划外，一直缺少有科学根据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或者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已有的规划。从现在起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为了制定城市发展规划，还要有地区的发展规划。绝大多数城市都是某一地区的经济中心，其发展依赖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地区发展规划也是制定城市发展规划的前提条件。

城乡发展规划要解决城市发展方向问题。城市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如有的是作为工业中心，有的是作为贸易中心，有的是作为外贸中心，有的是作为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也有的既是经济中心又是政治文化中心。同样的类型在具体要求上也会有区别。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要考虑以下条件：第一，全国的要求。许多城市在全国经济生活中有重要的



地位，必须考虑全国的要求。第二，地区的要求，要有利于地区的健康发展和发扬优势。第三，城市的特点。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自己的历史和现状。

规划中要处理好城市和周围地区的关系。城市要发展，周围地区也要发展，原有城市之间也会有矛盾，地区内还会出现一些新城市。这里有复杂的问题要解决。青岛市反映该市现有优势没有利用，发展了其他地区的轻纺工业而牺牲了青岛轻纺工业的优势。重庆市也有类似的反映。这些矛盾如何解决？要看怎样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果提高得快。像有些老城市某些工业原来的基础好，原材料就应首先予以保证。有些老城市扩大再生产有潜力，经济效果又好，也应该优先考虑发展。否则，就会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当然，除了发展老城市，也要发展一些新城市，有些加工工业还要在农村发展。但是，一定要防止以小挤大，以土挤洋，导致经济效果下降。

现在许多大中城市有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问题。如何处理轻重工业的关系，是规划中要解决好的问题。各个城市情况不同，要求也应不同，认为都要变成以轻工业为主的轻型结构，是没有根据的。像上海，轻重工业都要向高精尖发展。许多城市目前是有个多发展一些轻工业的问题，不发展轻工业难以解决比例失调，更难以发挥地区优势。但有些城市应该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要方向。当然，那些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都市，当前也要根据需求和可能努力发展一些轻工业。

城市规划中特别要注意支持农村的问题。大中城市还有个带动小城市的问题，但大中小城市都有带动农村的问题，不能仅就城市谈城市。离开了农村，城市难以顺利发展，不发挥城市对农村的作用，也难以说城市发挥了经济中心的作用。因此，应该重视研究各种类型的城市如何带动农村，应看到农村有大量的问题需要城市帮助解决。

第三，给大中城市必要的自主权，促进城市建设。

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综合体，城市内部、城市与周围地区都有着紧密的有机的联系，为了处理好城市内部外部的关系，使城市建设健康发展，必须给城市以必要的自主权。前面曾说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公用事业、住宅等欠债很多，这些都不利于发挥城市的作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加强城市建设，也要求给城市必要的自主权。

我国很多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也说明了自主权的重要性。例如上海



由于是直辖市，市的权力较大，所以经济发展得就快一些，好一些。再如常州、沙市等等，也都是有了比较多的自主权，加上市里对经济发展领导有方，经济才能迅速发展起来。重庆可以说明另一种情况，由于成都成了四川省会，重庆的权力相对小了，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不利的影响。

给城市必要的自主权是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完全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现在就应该研究并开始着手做一些迫切需要做而且有条件做的事情。有些同志建议现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扩大城市的自主权：（1）计划单列。这可以提高大中城市在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地位，在现行体制下也是做得到的。（2）适当扩大城市的财权。使城市的财政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经济上、财政上对国家作出更大贡献的城市，本身可以支配的财力也应该多一些。（3）赋予城市全面规划本地区内所有企业改组联合的权限。（4）赋予城市必要的调节经济活动的权力。（5）赋予城市进行必要的城市建设的权力。以上这几点当然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做，同时要采取必要的配套监督等措施，保证取得好的成效。做得好，将有利于发挥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并将有利于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要研究和正确处理扩大城市自主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关系。扩大城市权力绝不意味着使企业成为城市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城市行政机构无疑有必要的权力，要发挥应有的作用，但企业也必须有必要的自主权。城市有了必要的权力，才能有效地实行企业的改组和联合，为进一步改革企业管理体制创造条件。企业有了必要的自主权，城市经济搞活了、搞好了，城市也才能充分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

第四，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逐步解决城市经济结构中的问题。

目前我国城市之间经济效果差别很大。1980年每百元资金提供的利润税金，上海为74.3元，天津为37.93元，沈阳为27.98元，武汉为18.56元，西安为18.95元，重庆为19.41元；每个职工创造的利润税金，上海为6653元，天津为4534元，沈阳为2920元，武汉为3354元，重庆为2072元，西安为992元。差别如此悬殊，原因是很多的，但是说明城市提高经济效果的潜力是很大的。

从一些城市的情况看，建国以来经济效果有下降的趋势。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沈阳、哈尔滨等8个城市为例，1965



年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平均利润率为 34.5%，1978 年下降为 32%；1965 年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流动资金平均利润率为 33.5%，1978 年下降为 30%。城市基本建设投资效果也有下降趋势，表现为基本建设周期延长，新增固定资产占投资额的比重越来越低。“一五”时期新增固定资产占基本建设投资资金的比重，上海为 91.6%，天津为 88.1%，北京为 83.3%。“四五”期间上海下降为 53.4%，天津下降为 54.8%，北京下降为 67.3%。造成以上情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也说明提高经济效果有很大的潜力。

当前，城市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效果为中心，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逐步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1）进一步调整工业内部结构和工业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发扬地区优势，保证经济效果的提高。（2）按照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实行企业的改组和联合，包括城市范围内企业的改组联合以及城市和周围地区、其他地区企业的改组联合。（3）进行企业调整，对那些消耗高、质量差、亏损大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4）进行企业整顿，努力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5）有计划、有重点地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做好这些工作，城市的经济效果就能迅速提高，城市就能更好更充分地发挥作用，促进整个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几个问题*

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重大意义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充分考虑世界科学技术加快发展和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的趋势，着眼于全面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的调整。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和长期任务。江泽民同志说的经济结构调整包括很多内容，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产业结构调整。从各方面情况来看，我国正在进入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新阶段，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中国历来被视为短缺经济，但现在已出现了生产相对过剩的现象。1997年我国消费市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供过于求的商品所占比重明显上升，供不应求的商品所占比重急剧下降。据1997年下半年原国内贸易部对613种主要商品的供应情况排队，供不应求的商品仅有10种，占1.6%，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66.6%，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1.8%。值得注意的是供过于求的商品所占比重上半年只有5.3%，下半年猛增到31.8%，接近1/3，比上半年增加26.5%。这种急剧的变化，表现出商品供需结构矛盾、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已相当突出。

不仅消费品存在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而且生产资料也存在这个问题。事实上，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1997年以前就出现了。据第三次工业普查对94种主要工业产品统计，产品生产能力利用比较充分（80%

* 本文写于1998年5月，部分内容曾刊载《中国工业经济》1998年第7期。



以上)的有33种产品,占35.1%;生产能力利用不足,能力闲置 $1/3 \sim 1/5$ 的产品26种,占27.7%;生产能力利用严重不足,能力闲置一半左右的产品有17种,占18.1%;生产能力利用不足半数,处于半停产或停产状态的有18种,占19.1%。

导致当前生产相对过剩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这种说法没有充分根据,他们是把买方市场和生产过剩等同起来了,而它们是不能等同的。而且,如果说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那么当前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利用严重不足的现象就要被看成是常态,就要长期保持下去。但是这种现象绝不符合资源配置优化的要求,是必须按照资源配置优化的要求予以改变的。因此,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

有的同志对我国当前生产相对过剩的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主要原因有:(1)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工业速度偏高。(2)重复建设和盲目外延扩张。(3)进口大量增加,挤占了国内市场。(4)财政分灶吃饭,地方利益驱动盲目扩大生产建设。这些确实是重要原因。但是,绝不能忽视了我国当前正处在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向工业化的高级阶段转变的时期。这个时期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都会发生急剧的转变。如果条件具备,引导有方,产业结构的变化和需求结构的变化相适应,产业结构符合需求结构的要求,国民经济就能够保持健康迅速的发展。否则,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使国民经济和发展受到挫折。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现在国民经济中还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技术进步缓慢、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地区工业结构趋同等问题。以上这些问题,都要从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过程中加以解决。因此,调整和提高产业结构十分必要,其意义十分重大:

(1)这是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相适应的要求。当前,生产相对过剩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不相适应。由于居民已进入小康阶段或正在向小康阶段迈进,消费选择性增强了,不仅要求商品数量的满足,更要求质量档次的提高、品种花色的增加和商品服务消费的扩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步伐,使之与需求结构的变化相适应,才能解决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



(2) 这是加快技术进步的要求。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是互为条件的。一方面, 加快技术进步才能促使产业结构升级; 另一方面, 加快技术进步也要求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例如, 现在我国机械工业是虚胖子, 低档产品过剩, 高档产品产量少甚至不能生产, 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对先进机械装备的需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and 升级, 也是为加快技术进步提供基础和条件。

(3) 这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要求,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 我们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 它不仅存在于国际市场, 也存在于国内市场。它不仅是商品数量的竞争, 更重要的是技术、质量和效率的竞争。如果我们不努力调整和提高产业结构, 不提高我国产品和企业的竞争力,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产品被迫退出国内外市场。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 也要求加速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步伐。

(4) 这也是国有企业摆脱困境 and 深化改革的要求。现在很多国有企业面临着严重困难, 这主要是它本身的体制原因, 但当前生产相对过剩, 商品销售困难, 对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把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 and 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结合起来, 才能帮助企业克服困难, 从而为深化改革创造有利条件。这样, 也才能完成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

(5) 这也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要求。如果不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and 升级, 使产业结构 and 需求结构相适应, 当前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就难以正确解决, 国民经济也就难以持续快速地发展。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要求 1998 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 8%, 商品零售价格涨幅控制在 3% 以内。这体现了稳中求进的正确方针, 只有积极认真地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and 升级, 才能保证这个任务的完成。

20 世纪 90 年代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特点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面临的经济形势 and 体制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 所要完成的任务同过去相比也有实质区别, 所以这次产业结构调整有很多特点。正如有的同志所说: 这次调整



是买方市场条件下的调整,是结构升级的调整,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实现了两次产业结构调整。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加强轻工业,另一次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实行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政策,重工业增长大大快于轻工业和农业,因而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提高。1952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35.5%,1979年提高到56.3%。重工业优先增长虽然对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也导致了种种严重后果,诸如产业结构矛盾突出、消费品供应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等。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实行鼓励轻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整个80年代,经济增长的重心向轻工业倾斜,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快于重工业。到1990年,轻工业的比重提高到49.4%,重工业的比重下降到50.6%。到90年代初,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矛盾基本解决,市场供应大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另一个产业结构问题又突出起来。这就是由于加工工业增长过快,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能源工业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14.1%下降到1988年的9%,重工业中原材料工业同加工工业之比从1978年的1:0.96下降到1988年的1:1.67。许多加工企业缺电、缺煤、缺油、缺钢材,交通运输越来越紧张,通讯设施远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据估计,由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存在的严重“瓶颈”,全国加工工业有30%左右的生产能力不能发挥。为了解决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加工工业的结构失衡,国家加强了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并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促使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加快发展。尤其对能源、交通、通讯等“瓶颈”产业加大了投资强度,“八五”时期能源生产逐年加快,能源生产弹性系数由1991年的0.01增加为1995年的0.80,运输、邮电等供应情况也大为改善。1993~1995年各行业占全国工业的比重增幅最大的6个行业是: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煤炭采选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这6个行业基本上都属于基础产业。



以上两次产业结构调整都是以“补短”即弥补短线产业、克服供应短缺为目标的，主要任务是克服产业“瓶颈”或填补产业“空白”。当时产业结构的比例调整比产业结构的升级更为迫切和重要，所以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宏观平衡导向”性质。现在产业调整的目标已经主要不是“补短”而是“升级”。有的同志说得好：这次“调整是为了实现结构升级，结构升级是战略性产业结构调整的本质要求”；“如果脱离战略性调整的本质要求，产业结构调来调去也难以实现结构升级，不可能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提供具有充分活力的结构基础，经济增长的结构支持力度就得不到加强，甚至会产生经济增长滑坡的危险。”

正确处理“升级”和“补短”的关系

那么这次产业结构调整是否只是升级而完全没有“补短”的任务呢？当然不是。应当看到，就我国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而言，有些方面还是必须“补短”的。例如农业，尽管这几年农业连续丰收，但我国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短期内也不会改变，农业的基础地位还很脆弱，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再如第三产业，1996年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30.8%，在劳动力就业中的比重为26%，不仅大大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再如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尤其是技术水平低，基础工业的规模效益差。目前能源、原材料“瓶颈”约束的缓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产品的大量进口和消费类基建投资（如房地产）的压缩。我国城市化水平也低，1996年城市人口的比重为29.4%，而据世界银行《1991世界发展报告》，低收入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6%，中低收入国家为53%。所以，“补短”的任务还是有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九五”计划建议）中提出“大力振兴支柱产业”的同时，还指出要“切实加强农业”，“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党的“十五大”报告在提出“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时，也指出要“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和



基础工业”，“鼓励和引导第三产业加快发展”。

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处理好产业结构升级和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关系。我们必须抓住当前机遇，通过结构调整，使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产业结构升级和实现高加工度化奠定稳定持久的基础和支撑。因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应当继续加强这方面的投资力度，争取比较彻底地解决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瓶颈”约束问题。同时也要看到，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尽管在国民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现代产业的关联和发展序列看，它们毕竟是为主导产业服务的。在资金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过多地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倾斜，就难以保证主导产业尤其是以机电工业为代表的装备工业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设备投资又主要依赖进口来实现，从而无异于把相当规模的设备制造市场交给外国。这就要求处理好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关系，看到它们既是统一的，又存在矛盾。要研究在经济发展一定阶段上，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建设的合理规模，根据需求和可能，统筹规划，有计划地实施，不要盲目高攀，搞不切实际的超前建设。还要提高技术起点，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尤其是高技术，实现集约化经营，贯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总之，要在它们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关系，使它们在技术进步、效益提高的基础上相互促进。

主导产业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

选择主导产业即未来的支柱产业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在研究产业结构演变时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往往存在一个或几个主导产业或主导部门。对于主导产业或主导部门的概念，曾有过一些不同的定义，这主要是因为人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以及对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理论解释不同。不过，就其一般的涵义而言，主导产业或主导部门就是指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产业结构特征及其演变趋势的产业或部门。

主导部门理论的萌芽可以追溯到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他运用创新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分析。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是指企业家将



新的生产函数引入生产过程。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是一系列创新活动的更替历史。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也是由“创新”浪潮的起落所引起的。例如，他用三次“创新”浪潮的历史事实解释三个长波周期：（1）18世纪70年代产业革命时期的纺织工业“创新”。（2）1842~1897年蒸汽和钢铁时代。（3）1897~1950年的电气、化学、汽车工业时代。在这里，熊彼特实际上论及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创新活动的此起彼伏导致主导产业部门更替变换的现象。

在20世纪20、30年代，库兹涅茨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行动态考察以及研究经济周期时，通过对美、英、德、法、比利时等国从19世纪初、中叶到20世纪初期60种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和35种主要产品价格的系列分析，发现各产业均存在增长率递减的规律，即各产业的发展具有与技术创新相联系的生命周期，特定产业的产量增长先是加快，后是放慢，主导产业部门不断地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部门，构成不同主导部门依次更替的动态序列。他还用丰富的资料拟合了几十条不同部门产品的长期趋势曲线。当然，他所讲到的主导部门更替还仅仅是从各自增长速度的角度来考察的，而没有从部门间的带动作用来考察。

对主导部门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罗斯托把经济成长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追求生活质量六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演进是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特征的。主导部门理论成为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他认为经济成长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相应的起主导作用的产业部门。经济成长总是由某个主导部门采用先进技术开始；该部门降低了成本，扩大了市场份额并扩大对其他一系列部门产品的需求，带动整个经济发展。主导部门对其他部门的带动作用是通过后顾、旁侧、前瞻三重影响实现的。后顾影响主要是指主导部门对向自己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影响；旁侧影响是指对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如交通、生活、文化、基础设施等；前瞻影响则是指对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能源等的诱导。与六个经济成长阶段相对应，罗斯托列出了五种“主导部门综合体系”：（1）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主导部门体系主要是食品、饮料、烟草、水泥、砖瓦等部门。（2）起飞阶段。非耐用消费品生产的综合体系，如纺织工业。（3）成熟阶段。重型工业和制造业综合体系，如钢铁、煤炭、电力、通用机械、肥料等部门。（4）高额群众消费阶



段。汽车工业综合体系。(5) 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生活质量部门综合体系, 主要指服务业、城市建筑等部门。

关于产业发展过程中结构演变的规律性, 经济学家还提出过其他意见, 从其他分类角度进行过实证描述。例如, 有的从农、轻、重三个部门的比例关系及其演变来说明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 有的从基础部门(或基础设施, 也称“社会资本部门”)与直接生产部门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产业发展的“途径”; 也有的把产业结构的演变描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依次为主导的过程; 还有的把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与经济国际化过程联系起来, 将产业发展描述为从封闭型过渡到进口替代型, 再过渡到出口替代(或出口导向)型, 或从封闭型过渡到初级外向型, 再过渡到进口替代型、出口主导型等等。

根据这些研究成果, 我们认为,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描述和说明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性, 就某一特定时期来看, 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总是有这样几个部分: (1) 构成产业体系主体的部分, 这些产业提供了一个国家大部分的国民收入, 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 为此, 我们可以称之为支柱产业, 支柱产业的构成及其技术水平决定了产业结构在演变过程中所处的阶段。(2) 在产业发展中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的产业, 它代表了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或趋势, 为此, 我们可以称之为先行产业。先行产业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 可能成长为未来的支柱产业, 特别是成为带动整个产业结构走向高度化的主导产业。(3) 已高度成熟并达到了发展的极限, 因而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渐趋下降的产业。这类产业过去可能是支柱产业, 甚至可能超过主导产业的作用, 但如今已开始衰老, 为此, 我们可以称之为衰退产业。在国外, 有人把先行产业叫作“朝阳产业”, 与之相对应, 衰退产业叫作“夕阳产业”, 这样, 我们也可以把支柱产业叫作“盛阳产业”。“朝阳产业”、“盛阳产业”、“夕阳产业”可以大致勾画出一国产业结构演变过程各个阶段的轮廓, 作为我们选择重点产业的依据。

选择哪些产业作为主导产业

当前应该选择哪些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呢? “九五”计划建议中曾提



出：今后 15 年必须振兴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使之尽快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支柱产业。不过，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如何使这些产业成为支柱产业以及这些产业能否成为支柱产业还要进一步研究。1997 年国家信息中心主持讨论中国跨世纪的十大产业，有人提出，在选择重点发展的产业时，应该坚持以下几个原则：（1）考虑产业发展对社会资源的吸纳程度。（2）考虑产业发展与市场经济成熟的关联程度。（3）考虑产业发展对其他关联产业的支持程度。（4）考虑产业自身规模及其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这几个原则出发，他们选择以下十个产业为跨世纪中国的十大产业：农业、金融、交通、能源、建筑、汽车、教育、信息、知识和环境。也有人提出今后 10 多年发展较快的十大产业是：电子信息产业、纺织服装业、建筑业、汽车业、旅游业、农业、金融业、家电产品、咨询服务业、广告业。另外一种意见认为走向 2010 年的我国十大产业是：农业、基础产业、建筑和建材业、汽车工业、电子信息业、石化工业、金融保险业、旅游业、家庭服务业。还有人预言，2010 年我国十大新兴产业是：信息产业、微电子产业、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旅游服务业、沙漠资源开发、海洋资源开发、生态农业、宇航业。

1997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强调“要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结构优化升级”。他指出：从当前的经济形势看，在买方市场条件下，要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纪战略部署，实现“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有新的增长点来支撑。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700 多美元，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已达到 4 000 美元，发达国家已在 2.5 万美元以上。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发展的潜力很大。从这些年快速增长的实践看，我国经济增长拉动因素中，国内消费约占 50% 多，投资占 30% 多，出口占 10% 以上。这个需求结构表明，经济增长主要靠国内市场和投资拉动，但出口也越来越重要。只有启动合理需求，开拓市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也才能为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创造条件。他提出要把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城镇居民住宅建设、环保产业、农业机械和适合农村的消费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装备制造业、海洋经济等作为经济增长点。在 1998 年 3 月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上，他又提出当前可以培育和形



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业和产品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高技术产业（重点是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传统产业改造，城镇居民住宅建设，环保业，装备制造业，农村需要的农业机械和消费品，海洋经济。他还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各自的资源特点、市场情况和产业基础，合理地选择和培育增长点，发展特色经济。这些意见都非常重要。

介绍几种选择重点产业的理论

现阶段中国如何确定和落实主导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这里把它们统称为重点产业），看来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和讨论，因此下面介绍几种选择重点产业的理论。

1. 收入弹性基准理论。所谓收入弹性是指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前提下，某一产品的需求增长率与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之比。凡是收入弹性大于1的产业。其增长速度高于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凡是收入弹性小于1的产业，其增长速度低于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很显然，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收入弹性高的产品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将逐步提高，选择这些产业为重点产业，符合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收入弹性基准的政策含义是很明显的，即政府应重点支持那些能提供尽可能多的国民收入的产业。

2. 产业关联度基准理论。所谓产业关联度是指各产业之间的相关程度。产业关联度高的产业对其他产业会产生较强的后顾影响、前瞻影响和旁侧影响，选择这些产业为重点产业，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产业关联度基准的政策含义也很明显，即政府应重点支持那些能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产业，也可以说就是要优先发展主导产业。

3. 生产率上升基准理论。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以先行产业为发展重点，相应提出选择重点产业的“生产率上升基准”。这里所说的生产率是指全要素生产率（或称综合要素生产率），即产出对全部投入要素之比，而不仅仅是对某一种投入要素（如劳动）之比。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所以，以生产率上升为基准选择重点产业，就是要优先发展代表先进技术的产业。



4. 比较优势理论。也有经济学家从另一些角度提出过选择重点产业的理论。例如，有的提出要以比较优势产业为发展重点。这种理论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从资源禀赋条件进行论证，认为资本丰裕的国家应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发展重点；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则应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发展重点。另一种情况是从产业发展顺序来进行论证，认为在产业发展的早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中期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重点，后期以技术（或智力）密集型产业为重点。

5. 边际储蓄率基准理论。有的经济学家主张，发展中国家选择重点产业不能仅仅优先考虑收入的增长，而要特别重视收入增长过程中有多大比例可用于形成积累。因为，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任务是要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因此，选择重点产业要考虑边际储蓄率基准，即把收入弹性高且边际储蓄率也高的产业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

上述有关选择重点产业的理论及其选择基准，无疑都有借鉴意义。但也要看到，它们都是撇开了很多因素抽象出的理论模式，或者只是从某些国家特定情况下概括出来的。因此，这些理论模式都有其局限性，未必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有些理论和选择基准也受到过经济学家的批评。例如，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认为：收入弹性、生产率上升以及关联度基准等理论在日本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么大，政府并不是真正按照上述理论来选择重点产业的；而且，即使政府是按上述理论来确定重点支持的产业，结果也可能是一些受到政府支持的产业并未发展起来，而有些没有受到政府支持的产业却高速增长，成为支柱产业。他说：“基准”只不过是人们事后才加上去的理论而已。

应该承认，有些选择重点产业的理论在逻辑上还是能够成立的。至于在实践中能否有效，即理论所描述的主观逻辑是否能成为现实中的客观逻辑，关键之一是理论逻辑所假定的前提条件是否在现实中存在。例如，收入弹性、生产率上升和关联度基准等理论是以具备下面这些条件为基本前提的：（1）基础产业相当完善，不存在“瓶颈”约束。或者即使存在一定程度的“瓶颈”约束，但要素具有充分的流动性，资源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向“瓶颈”部门转移，尽快缓解“瓶颈”状态。（2）产业发展中不存在技术约束。这些基准都把任何产业部门发展所必需的技术条件看作是已经具备的或可得到的。（3）不存在资金约束。



如果实际上不存在这些条件,那么这些理论就未必能够成立,应用这些理论也就会遇到困难。例如,在基础产业的“瓶颈”状态十分严重时,简单地优先发展任何高收入弹性和生产率上升较快的产业以及关联度较大的产业只能进一步恶化“瓶颈”状态。当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还很低时,不适当地强调生产率上升较快的产业部门,就可能扩大重点部门与一般产业部门间的技术断层,人为地割断技术相关程度较高的产业之间的联系。

选择重点产业要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

一个国家要正确选择重点产业,除了要考虑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选择重点产业的基准外,还要着重考虑本国的具体情况。除了考虑需求状况以外,还要考虑产业现状、技术、资金、资源状况等等。

1. 现有产业状况,包括现有产业的发展水平与结构。这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资源配置状况的综合反映。由于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现有产业状况是未来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是选择重点产业的决定因素之一。这种决定作用首先表现在,现有产业的结构状况影响着下一步产业发展重点的选择。其次,不同的产业现状决定着当时的贸易条件,积累能力,产业间实现良性循环的具体方式以及向新的结构转化的途径与过程。也就是说,现有产业的协调发展是启动结构转换的前提。

2. 技术状况。后进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技术因素,或者说它要在较短的时期内通过引进吸收创新走完发达国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走过的技术发展道路。这样,后进国家在寻求发展时,面临的技术选择条件是大范围和多层次的,即必然是先进的现代技术与落后的传统技术并存和协调组合的局面。因此,作为重点产业选择基准之一的“生产率上升”基准必须被赋予新的含义,即“生产率上升”较快的,技术吸收能力较强(或较大程度地采用先进技术)的产业必须与国内其他技术相关程度较高的产业在技术衔接上大致协调。从而一方面保证先行产业的发展得到其他技术相关产业的支持,另一方面先行产业也把它先进技术有效地传递到其他产业中去。相反,如果某些生产率



上升较快的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存在较大的技术断层，就不仅不能起到相应的带动作用，而且先行产业本身也会由于缺少相关的技术保证而难以有效发展。

3. 资金状况。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是普遍现象。这可能会与单纯根据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作出的重点产业选择产生种种矛盾。如果现有的产业结构向新的结构转换过程中的资金积累问题没有解决，就会使得近期内确定什么产业为重点产业的选择余地很小，就只有致力于现有产业结构本身的良性循环，来扩大积累能力，为后续的经济创造资金条件。因此，选择重点产业就不能仅考虑收入弹性和技术先进性，还要充分考虑边际储蓄率的高低，以及各产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量等实际问题。

4. 资源状况。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影响着进出口贸易结构以至本国的产业结构。一般地讲，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条件的制约，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的轻纺工业具有相对优势，可以通过这些产业的产品出口换取外汇，进口先进技术、设备以及高档的原材料支持本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即使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着各种资源禀赋和开发程度的差别，进出口结构也不相同，从而对本国选择重点产业具有各自特殊的影响。

总之，由产业现状、技术条件、资金条件、资源禀赋等国情因素构成一国选择重点产业的约束条件，各国只能在这些约束条件下，现实地选择现阶段应该重点发展的产业。具体讲就是：①要在现在产业结构和水平的基础上，实现结构协调，产业水平升级，提高整体技术水平，为后续经济发展扩大市场提供积累。②消除不同技术层次之间的断层，形成技术发展的整体能力。③根据资源禀赋状况确定进出口贸易结构，在经济合理条件下实行过剩资源对短缺资源的替代。

当然，产业结构的选择也是动态的。随着一国产业的整体规模和内部结构、技术水平及其结构、国内需求结构、国际贸易条件和竞争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变化，国内产业的关联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重点产业的选择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重点产业及其倾斜程度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作相应的变化。



建立产业结构升级的保障机制

当前,实现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还有不少困难,有一份研究报告列出了六个困难:(1)由于长期走和现在还在走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道路,重速度轻效益的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大量生产能力和经济存量短期内难以调整到位。(2)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协调难度加大。地方利益主义抬头,全局观念削弱,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根源在此。(3)体制转换时期,以市场为导向的调节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在调节机制上存在差别,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竞争。(4)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加大了结构调整的难度。(5)科技开发能力薄弱,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靠引进,自主开发能力不强,科研力量比较分散,科技协作意识淡薄,引进硬件多、软件少,消化吸收推广工作做得不够。(6)市场行为不规范,一些地方从本位利益出发,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控制重要原材料的流出和外地产品的进入,干涉企业的正常活动,甚至怂恿制假、贩假和走私活动。具体困难还可列出一些,如资金不足、劳动力过剩等等。

如何克服这些困难?这需要采取很多具体措施,而概括起来则是要建立起产业调整和升级的保障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证克服资源不足,在各部门合理分配资源,并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使人民得到最好的福利。这个机制包括哪些内容,很值得研究,我想主要应该包括合理的经济体制、优秀的企业家群体、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经济体制又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合理的所有制结构。(2)有活力的企业。(3)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4)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优胜劣汰机制。(5)合理的投融资体制和企业并购行为。建立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保障机制要在所有这些方面努力,而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经济体制,包括要改革所有制。因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合理的经济体制必须建立在合理的所有制基础上。

在谈到影响产业结构演变的因素时,人们经常谈到的有需求结构、消费倾向、技术进步、投资结构、生产要素价格、国际贸易等等因素。重视这些因素是必要的,但是绝不能忽视经济制度、企业家、产业政策



等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决定性作用。关于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的作用，不仅从日本战后发展的历史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从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中也是可以看到的。关于企业家的作用，应该看到现代经济中促使产业结构变动的主体是企业 and 企业家，而不是政府 and 政府官员。从经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产业结构变动 and 升级主要是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的结果。因此，必须把产业结构升级 and 企业家创新结合起来研究。我们尤其不能忽视经济制度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决定性的作用。就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一样，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下进行的，经济制度是促进产业结构的健康发展，还是阻碍产业结构的健康发展，或者是既促进又阻碍产业结构的健康发展，对产业结构的演变 and 升级关系极大。产业结构的变动当然受产业结构现状的影响，但是一个好的经济制度能够弥补原有经济结构的缺陷，一个坏的经济制度则会限制甚至扼杀原有产业结构的优点。

经济体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保证产业结构能够健康发展顺利升级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 信息机制问题，就是要使社会 and 经济主体及时得到准确的信息，了解产业结构发展的趋势，便于经济主体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2) 决策机制问题，就是要使经济主体能够自主地正确地进行决策，顺应产业结构发展的趋势而不是过于偏离正确的方向甚至逆方向而行。(3) 动力机制问题，就是使社会 and 经济主体有发展经济、实行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优化的强大动力 and 能力，这也是保证决策正确 and 正确决策得以贯彻的必要条件。(4) 约束机制问题，就是使社会 and 经济主体不仅能正确决策，而且能通过监督检查等措施，建立各种自我约束 and 外部约束制度，保证决策的贯彻落实，得到预期的结果。解决以上问题，建立起各种必要的机制，是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整个经济制度的任务。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是通过不同的经济主体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解决以上机制问题的，其结果也有区别。

实现以上要求，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理论上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一种是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一种是市场经济体制模式。



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有几个假定：（1）计划的科学性，无论是生产计划或投资计划都能通过科学预测和决策，反映需求结构的变动。（2）计划的权威性，即生产与投资单位都能迅速执行决策机关的指令，而且执行结果与计划所要求的相符。（3）决策层次利益的一致性。高层次决策者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各级决策层次间具有无差别的利益。在这几个假定下，理论上可以承认计划经济体制能够解决信息机制、决策机制、动力机制、约束机制等问题，从而能够建立起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保障机制。但是，这些假定只能在很特殊的条件下才能成立。例如，在社会生产力不很发达，需求比较简单，最高决策层威信很高，群众政治热情和政治觉悟极高的情况下，才能成立。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一定保证计划的科学性和正确的计划能不打折扣地贯彻执行，而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假定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人们的需求千变万化，认识能力在一定时期又总是有限的，更何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同时排斥市场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难以建立科学计划所必要的信息机制和决策机制，从而也难以维持计划的权威性。而且各个决策者也必然存在利益差别，这不仅影响计划的制定，也影响计划的执行，使得难以建立保障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各种必要的机制。

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也有几个假定：（1）完全竞争的市场，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价格都是外在的，生产者根据既定的价格决定生产规模，消费者根据既定的价格决定消费数量，同时商品和资本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动。（2）真实的价格信号。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导致价格变化的主要是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变化，其中需求的关系更是主要的方面。（3）决策主体是所谓的“经济人”。他具有合理的行为，行为目的是增加利润或避免损失。在以上假定下，产业结构的形成与变动过程，就是在价格信号的导向下，通过生产资源的流动与重组，使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尽可能与需求结构相吻合的过程。现实生活也不完全符合上述假定，例如竞争可以导致垄断，价格并不能完全和及时反映供求变动，决策者总会出现失误，因此，产业结构变动的市场机制也并非尽善尽美的机制。不过，由于经济发达国家长期实践的结果，已经积累了很多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的经验，只要正确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实行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机制比计划经济体制有更大的适应性和更多的优越性，可以成为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保障机制。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也曾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起过积极作用，但后来其缺点越来越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党的“十四大”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轻工业的迅速发展和90年代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迅速发展，都是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分不开的。不过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立过程之中，还很不完善。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曾提出：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这也就是建立产业结构升级保障机制任务的具体化。当前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如生产不适应需要，重复建设严重，技术进步缓慢，以及产业结构转变的困难，如国有企业缺少活力、集体企业增势减缓、私营企业受到束缚、政企不分、市场秩序混乱等等，说明距离完成这个任务还远。

改革所有制是建立产业结构升级机制的一个关键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全面深化经济改革，包括进一步改革所有制。为了保障产业结构升级，也要进一步改革所有制。从当前情况看，甚至可以说，改革所有制已成为深化经济改革、建立产业结构升级保障机制的关键。

从历史看，西方国家产业结构的大调整都是伴随着所有制变动的。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优先发展轻工业向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转变，由着重发展原材料工业到实现产业高加工度化的转变，以及由产业高加工度化向知识技术更加密集化产业的转变，无不同时发生所有制结构和资本组织形式的变化，所有制结构和资本组织形式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所要求的，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也是产业结构变化得以实现的保证。至于由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在西方是优先发展轻工业的阶段，更是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中实现的，所有制的剧烈变动可想而知。我们很难设想在封建社会内部能够实



现现代产业结构的种种变动。

我国改革前得以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也是同当时的所有制状况分不开的。改革以后优先发展轻工业，更是由于进行了所有制改革，即在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情况下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正如有人所分析的：国有工业与非国有工业的轻重工业结构存在着较大差别。从工业总产值结构看，1984年国有工业的轻工业比重为41.3%，而集体工业和其他类型工业的轻工业比重为61.9%和62.6%，分别比国有工业多20多个百分点。虽然非国有工业的重工业比重逐步上升，轻工业比重有所下降，但到1995年，集体工业的轻工业比重为50.3%，“三资”工业的轻工业比重为58.6%，分别比国有工业多18.5个和26.8个百分点。因此，在工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动中，随着非国有工业比重的上升，就使整个工业中轻工业的比重上升，重工业比重相应下降，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得以实现轻工业优先发展的主要原因。^①

同一作者根据对统计资料的分析，还指出：改革前，我国各个省市区的工业所有制结构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国有工业占最大比重，集体工业的比重较小，其他类型工业的比重几乎为零。目前各个省市区之间工业所有制结构存在较大差异，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各个省、市、区工业所有制结构变动趋势不同的结果。工业所有制结构变动会引起工业产业结构的变动，原因在于各种所有制工业的产业构成不同。由于各个省市区的工业所有制结构及其变动幅度存在着差别，省市区之间工业产业结构的变动也就表现出差异。

我们曾经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不触及所有制，实践证明这种看法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在国有制在国民经济中一统天下或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是建立不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因为，国有制一统天下或占主体，不仅政企难以分开，国有企业难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真正的企业，也难以形成发达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政府也不能进行正确而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

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明确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明确国有经济是主导。把国有经济放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既不同于那种不重视国有经济，主张把国有经济放在国

^① 郭克莎主编：《工业增长质量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国民经济中一般地位甚至取消的意见，也不同于那种不从实际出发，主张把国有经济放在国民经济主体地位上的意见。提出国有经济是主导，这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符合国有经济的功能和特征。

在改革以前，除了农业，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可以说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在这种国有经济不仅是主导而且是主体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中国是在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以后，才出现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的。

但是，一直到现在，我国国有经济仍存在战线过长、范围过宽、分布过散即布局不合理的问题。据统计，1995 年底，我国国有经营性资产约为 4.5 万亿元，扣除军工、邮电、铁路等特殊部门，分布于工商业中的国有资产大约为 3.6 万亿元。在这些工商业的资产当中，又有大约 20% 左右属于“企业办社会”的非生产性资产。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国有资产不足 3 万亿元，它们分布于几十万户工商企业之中。据 1994 年情况，从工业内部 39 个行业看，行行都有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行业国有资产比重是 99%，最低的是 11%，平均为 61%。在一些国有经济不一定要进入的领域，如第二产业中食品、服装、家具、文体用品，第三产业中的理发、浴池、饭馆、旅店、日常用品店，都有相当比重的国有经济。如食品加工工业中国有企业产值比重为 56.5%，资产比重为 66.2%。

国有资产的广泛分布，表面看似乎加强了国有经济的地位作用，实际上是使国有企业承担着不应该由它承担的功能，使它难以完成任务。这种状况产生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也限制了国有经济优势的发挥。一是阻碍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导致单个企业规模过小，难以形成大批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三是使得企业技术水平低下，产品老化，无力进行重大的技术开发；四是使得国有企业负债率高，蕴涵着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五是增加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度。例如，不少国有企业因无力筹措足够的资金来解决负债率过高、冗员过多等问题而改革进程缓慢。

我在 1994 年 10 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



用首先要有合理的产业构成，即经营范围、经营内容合适；现在国有经济在有些产业和企业应该加强，却没有加强，在有些产业和企业可以退出，也没有及时退出。因而我提出要把“调整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和内容”作为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一项“战略措施”。^①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九五”计划建议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形成兼并破产、减员增效机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以资本为纽带，联结和带动一批企业的改组和发展，形成规模经济，充分发挥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形式，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改组步伐。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方针，同时提出：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

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贯彻抓大放小的方针。据统计，按总资产、净资产和实现利税三项指标排在前面的1 000家国有大型企业，其数量不到国有企业总数的0.3%，而它们的总资产占全国国有企业总资产的40%，净资产占51%，上缴的销售税金占52%，提供的利润占66%。另据统计，全国5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的资产占国有企业总资产的37%，销售收入占46%，实现利润占63%。由此可见，只要抓好关键的500~1 000家国有大企业，50~100家大型企业集团，就可以把握住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而对于一般国有小企业，则可以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的步伐。

对于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认识上一直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认为，国民经济是主导，就是国有经济要在国民经济中占稳定的绝对的优势。例如，有人说，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能低于4/7。事实

^① 《怎样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载于《光明日报》1994年10月28日。



证明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什么是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我体会，一是指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二是指通过对大企业和大企业集团的控股以及对有些企业的参股发挥作用；三是指做那些非国有经济不能做或不能让它们做的事情；四是国有经济能够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说：“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党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还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有资产在社会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为进一步调整所有制结构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

除了调整所有制结构，改革所有制还包括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允许的各种所有制企业都成为真正的企业，并增强它们的活力，使它们都成为有活力的市场竞争主体，在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中也都能发挥应该发挥的积极作用。这就是不仅要通过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也要通过改革，使集体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并继续鼓励、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健康发展。这些都是建立产业结构升级保障机制的重要任务。

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改革所有制显得越来越迫切。实践表明，所有制改革要以思想解放为前提。党的“十五大”对深化所有制改革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指导思想，要认真学习，取得共识，进一步解放思想，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改革所有制结构涉及非公有制经济是不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在党的“十五大”前对这个问题就有争论，有人认为私营



经济和公有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人则认为只有公有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反对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提法。按理这个问题在党的“十五大”之后可以解决了。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我们讨论非公有制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是讨论它是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既然作为主体的公有制和必须共同发展的多种经济成分（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当然它们也就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如果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这个道理是容易明白的。

但在党的“十五大”之后，有的人还是坚持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他们的主要根据是：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因此不能把私营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诚然，我们常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设想生产资料私有制最终是要消灭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当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问题在于，现在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说：“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样，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经济一样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即成为经济基础，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有人认为，一个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经济成分才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他们引马克思如下的一段话为根据，这段话是：“在一切社会形态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形态，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他们认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方式一元论思想”，“公有制实现形式以及所有制成分多样化，并不等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可以多元化”，甚至认为由于“别有用心的人任意曲解”，才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看成是多元的。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9页。



是，只要联系前后文认真读一读马克思的这段话，就能知道马克思这里讲的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如何处理经济范畴，讲的是一些经济范畴的地位和关系，这里并不涉及什么是经济基础的问题。至于什么是经济基础，马克思曾有明确的界定。例如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① 马克思说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非公有制也是同生产力相适合的，又怎么能否认它是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呢？

也有人认为“把私营经济说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将导致理论上混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否定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必要性”。这个说法也难成立，因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分清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同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说的是不同的问题。而且，我们早已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因而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把多种经济成分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的。所以，如果有这种顾虑，也是不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提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范畴，首先是为了说明历史是发展的。例如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② 后来斯大林则强调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问题，强调上层建筑要“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斯大林说：“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③

我认为，无论是从说明历史发展（以及说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角度看问题，都应该把在公有制为主体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6页。

③ 《斯大林文选》，第521页。



件下共同发展的多种经济成分看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从前一个角度看，只有把公有经济、私有经济都看成是经济基础，才能全面深刻的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和现实。从后一个角度看，现在非公有经济也还有一个继续发展的问題，为了使之健康发展，也需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即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在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显然不属于已经过时的旧基础，而应该和公有制经济一样属于上层建筑为之服务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包括支持、扶植、鼓励、引导，也包括监督、管理以及某些情况下必要的限制。如果不把非公有制也看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势必要把它看成是已经过时的旧基础，重蹈为消灭它“而积极斗争”的错误覆辙。

我们记得，20世纪50年代曾经有过“综合经济基础”论的争论。当时杨献珍同志主张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都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他的观点受到了批判，造成了很多消极后果。现在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已有根本区别。但是，在要求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一个基本点上，它们是相同的。我们应该吸取50年代那次争论的教训，承认非公有制经济也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怎样认识公有制及其优越性

改革所有制还要明确怎样认识公有制及其优越性。1997年一篇广为散发的文章曾说：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一定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观点。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一定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观点，用来宣传是可以也是常见的。但这篇文章却是以某个理论刊物编辑部的名义写的，文章还说必须坚持这个观点，才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该文完全离开生产力来谈所有制，而正是由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适合于我国当前的生产力状况，我们才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公有制是否优越，也要以它对生产力的作用来说明和检验。离开生产力来比较公有制、私有制的优越性，完全是一



种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该文也可说是运用历史唯心主义研究公有制问题的典型。

最近又看到一篇题为《什么是公有制》的论文，一个主要内容也是说明公有制的优越性的。文章也没有联系生产力来研究公有制，但是说明了公有制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文章是这样说的：“公有制的建立，意味着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可以直接结合起来，无需通过像资本家这样的中介来实现，因而它使得少数人凭借占有生产资料来压迫和剥削劳动者成为不可能的了，从而为消灭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劳动者之间在生产全过程中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在分配过程中的消灭了剥削的按劳分配关系”。读过40多年前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人对这段话会感到很熟，因为其出处就在该书。该书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时不是具体分析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然后得出这种公有制的性质特征，而是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名义”出发，推导出“劳动者之间”必然是“平等互助合作关系”和“在分配过程中”消灭了剥削。按照该书的逻辑，只要有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名，那就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也就必然有优越性。而按照马克思关于所有制是生产关系总和的观点，人们必须具体分析了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即生产关系总和，才能得出这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因此，“名义”上叫社会主义公有制，“事实”上却可能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更不一定适合生产力的状况。这种“事实”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大量存在过的，但是用上述《教科书》肤浅的贴标签的办法，除了说些大话，空话，是难以认识和纠正这些“事实”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方法和理论上的失误，探讨如何改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想不到还有人在把这种方法及其结论当成真理来宣扬和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这篇文章也有典型性。

这篇文章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批判所谓的模糊公有制和私有制界限。不久前有的同志分析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时提出了“共同所有制”、“公众所有制”等概念，有的同志提出要在思想上冲破动辄问姓“公”姓“私”的束缚，这篇文章对这些都扣上了“私有化”的大帽子。文章说：提出“共同所有制”、“公众所有制”这一类新概念，把它们称之为公有制，其实质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主义公



有制之间寻找某些形式上的共同点，以此来模糊和抹杀两种关系的本质区别，从而为在坚持公有制的旗下实行私有化提供依据。这比公开主张私有化更能迷惑人。又说：无论历史和现实，明明客观上公有制与私有制有着原则的区别，主观上却拼命要去冲破两者的界限；这种哗众取宠、大唱高调的做法，其目的是昭然若揭的。文章作者扣帽子的本领不小，但说理的能力却差。

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是：“公有制的内涵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第二个小标题是：“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所有制才是公有制”。这就是把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排除在公有制之外。用作者的话说，这岂非也是“杂七杂八的一笔糊涂账”。

文章还说：“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界限能够冲破吗？不能。这是因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体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生产关系，其界限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人们想冲破就能冲破的。”作者的结论是：公有制与私有制有根本区别，其界限是不能冲破的。我认为，说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生产关系，在思想上不能抹杀它们的界限，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面向现实，着眼于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实际问题，那就不能回避以下这些问题。（1）在我国现阶段，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2）从理论上说，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是不是可以冲破，或者它们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3）考虑到人们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凡事要问个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问题，使得改革迈不开步子，是不是在思想上也有一个冲破姓“公”姓“私”束缚的问题。

关于现阶段我国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关系。当然它们之间存在矛盾，但总的来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统一的关系，即矛盾的统一。要看到个体私营经济是我国社会所有制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经济的兴起，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家实力上发挥了积极作用。1990年至1994年，个体私营经济每年吸纳了近600万人员就业。据全国个协统计，到1997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2 850.86万户，从业人员5 441.85万人；私营企业96.07万家，从业人员1 349.26万人。两者合计吸纳6 790多万人就业，占全国社会劳动者总数的10%以上。加上其他非公有经济安排的就业人员，数目就更可观。另据报道：1997年，全国个体私营



经济共纳税 540 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7%，省级财政收入的 10%，地市级财政收入的 12% ~ 15%，县级财政收入的 20% ~ 30%，部分县甚至高达 50% 以上。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现阶段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异己，不是公有制经济的对立力量。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所有制经济的排斥，其作用恰恰体现在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之中。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解决下岗职工就业问题等方面，都要进一步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

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界限是存在的，否认和抹杀它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也要看到这种界限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界限是可以打破的。历史的大趋势是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当然这需要条件，也有一个转变方式方法的问题。例如，社会主义改造中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有成功的方面，也有不成功的方面。但确实说明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打破它们的界限的。公有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向私有制转变。这不仅在苏联、东欧等国家可以看到，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也可以看到。有些公有制企业由于领导腐败等原因蜕变为私有制，即使名义上还是公有制，实际上也冲破了界限完全变成或部分变成私有制了。不过这几种情况的后果将有区别，对它们的评价也应不同。也正是由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是相对的，所以在我国现阶段才会出现以上所说的那种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矛盾统一关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些资本主义企业在经营管理收入分配乃至产权安排上也发生新的变化，不能否认出现了一些公有制的因素，这也说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是相对的。

关于在思想上冲破姓“公”姓“私”问题上的条条框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很必要的。前面已经说过不能抹杀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界限，但是要对公有制、私有制及它们的界限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保持一致。由于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深刻地剖析了姓“社”姓“资”的问题，有些人不能再在姓“社”姓“资”上做文章，但依旧坚持错误的立场观点，把文章做到了姓“公”姓“私”上。如果不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经济改革尤其是所有制改革很难顺利进行，有些同志正是据此提出要冲破姓“公”姓“私”的束缚，应该看到这方面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复杂的。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调整 经济结构的任务（读书笔记）*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十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同时强调：必须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为了解“十五”时期的经济发展任务，有必要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调整经济结构要注意的问题。

一、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特征

中国现在还处于工业化时期，问题是处于什么阶段。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复杂。它首先涉及工业化划分几个阶段以及划分阶段的标准。

关于划分几个阶段，有人认为分四个阶段，有人认为分三个阶段。关于划分工业化阶段的标准，则有人均收入水平，一、二、三产业产出比重，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工业内部结构等指标。

按人均收入水平（GDP），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认为工业化可分为三个阶段。以1998年美元为标准，各阶段人均GDP为：

初级阶段	1 200 ~ 2 400 美元
中级阶段	2 400 ~ 4 800 美元
高级阶段	4 800 ~ 9 000 美元

以上是按汇率计算，还有一种方法是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则三个阶段的人均GDP值为：

* 本文是作者2000年底学习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决议的读书笔记。曾载拙著《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问题》（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



初级阶段	3 010 ~ 5 350 美元
中级阶段	5 350 ~ 8 590 美元
高级阶段	8 590 ~ 11 530 美元

1998 年中国按现行汇率计算人均 GDP 为 750 美元，按 1980 年汇率计算人均 GDP 为 1 173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均为 3 220 美元。按现行汇率计算，中国还不到初级阶段。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进入初级阶段。按 1980 年汇率计算，离初级阶段还有点小距离。总的看是处于初级阶段。

按一、二、三产业的产出构成计算，1997 年中国初级产品、制造业、社会基础设施、服务业的增加值构成为 24%、38%、13%、24%。制造业的比重已超过工业化中级阶段所要求的 25%，甚至超过了工业化高级阶段以后的发达经济初级阶段所要求的 35%。从工业的比重看，中国可以说已到了高级阶段。

按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构成计算，1997 年中国初级产品、制造业、社会基础设施、服务业的就业构成为 53%、15%、9%、15%。制造业的就业比重还不到工业化中级阶段所要求的 13%，服务业的比重也低于工业化中级阶段所要求的 28%，甚至低于工业化前阶段的 18%。从初级产品的就业比重看则高于工业化中级阶段所要求的 50%。总的看是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再看工业的内部结构，据此工业化可分为四个阶段：（1）以工业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发展阶段。（2）以原材料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发展阶段。（3）以高加工度为主的发展阶段。（4）技术集约化发展阶段。中国现在大概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的过程中。

由于中国长期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与世界上工业发展的一般模式相比有不少特点。尤其是工业比重大，服务业相对落后，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大。这就增加了判断工业化处于什么阶段的困难。一般认为，现在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究竟处于中级阶段前期还是后期，也有争论。多数人认为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上半期向下半期过渡的阶段。

中国国内工业化水平也很不平衡，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差别就很大。1998 年人均 GDP（以人民币计），东部为 9 522 元，中部为 5 252 元，西部为 4 031 元。工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全国为 15%，东部为 19.6%，中部为 13.4%，西部为 9%。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全国为 40.3%,东部为 42.2%,中部为 39.6%,西部为 34%。一般认为,东部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后半期,中部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前半期,西部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有如下十个方面的特征,我认为这个看法比较全面:

1. 人均收入低。人均 GDP 水平在世界上排位很落后,仍然属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1998 年,按汇率法计算,人均 GDP 为 750 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5.3%,在低收入国家之列(低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 GDP 低于 760 美元),排在世界第 149 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 GDP 为 3 220 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51.9%,在中低收入国家之列(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人均 4 080 美元),排在世界第 129 位。

2. 社会物质财富不丰裕。报告认为,人均能源消耗当量和人均电力消耗量可以集中反映社会财富的丰裕程度,也可以反映居民的生活水平。1996 年我国人均石油消耗当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人均 1 684 千克)的 53.6%,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均 5 346 千克)的 16.9%;人均电力消耗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人均 2 027 千瓦时)的 33.9%,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均 8 121 千瓦时)的 8.5%。

3. 产业结构层次低,结构升级任务重。从三次产业的构成看,1998 年第一产业比重为 1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13 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比重仅为 31%,低于世界平均 30 个百分点。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来看,消费品制造业的份额为 36%,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3.2 个百分点;资本品制造业的份额为 32.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8 个百分点。1997 年,在发达国家中,美国资本品制造业的比重为 48%,消费品制造业的比重为 29%,前者比后者高 19 个百分点;日本资本品制造业的比重为 50.3%,消费品制造业的比重为 24.1%,前者比后者高 26.2 个百分点。

4. 近一半的劳动者在初级产业就业,劳动力需要大规模转移。在经济发达国家中,一次产业就业份额一般都低于 10%,1998 年美国为 3.1%,日本为 5.4%。而 1997 年中国为 48.7%,与印度尼西亚水平(45.7%)相当。

5. 居民消费结构层次低。1998 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为 44%,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为 53.4%,整体上中国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当在 44% 与 53.4% 之间,处于很低的层次上,与人均



GDP 小于或等于 1 000 美元（PPP）的国家组别相当。在这个组别，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平均为 48%。

6. 收入分配不平等，并有扩大的趋势。改革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等呈扩大趋势。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由 1984 年的 0.3 上升到 1989 年的 0.35，并进而上升到 1995 年的 0.415。另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6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 0.424，1997 年是 0.425，1998 年是 0.456。目前，中国尚有 3 000 多万农村居民没有摆脱贫困，城市贫困阶层也在扩大。必须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消除绝对贫困，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7. 城市化水平低。1997 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 3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14 个百分点，尚未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2%），低于高收入国家 78% 的平均水平 46 个百分点。

8. 成人文盲率高。1995 年，中国男性成人文盲率为 10%，女性为 27%，接近于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男性为 12%，女性为 27%）。普及教育、消除文盲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9. 资本劳动比例低。1995 年，中国每个劳动者的资本劳动比例仅为 2 200 美元，不及美国人均 115 600 美元的 1/50，欧盟人均 144 200 美元的 1/60，日本人均 281 900 美元的 1/120，甚至低于印度尼西亚（人均 4 600 美元）和菲律宾（人均 7 300 美元）的水平。不断增加资本积累，并用先进技术装备劳动者，是长期的任务。

10. 贸易结构不发达，国际竞争能力需要大力提高。目前，在中国的出口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高，而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机械及运输设备）的比重较低；在进口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高。这说明中国的贸易结构仍处于不发达阶段。

二、中国经济还处于高速增长时期

中国经济还能不能以较高速度发展？对这个问题看法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能以过去那样的高速度发展，一种意见认为不能迅速发展只能低速发展，一种意见认为能以较快速度发展。“十五”计划的建议中提



的是较快发展,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1. 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市场经济条件下制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是需求,即市场的大小。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当前尤其是农村市场很有潜力。国家统计局的一份研究报告曾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市场的潜力,我认为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1) 中国居民尤其农村居民整体生活质量还很差,市场需求潜力很大。中国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占我国人口总数 70% 以上的农村居民,有的还处于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也比较大,1997 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是 3:1。因此,中国的消费市场尤其是农村消费品市场前景广阔,需求潜力很大。

(2) 中国居民家用电器和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还相当低,市场需求潜力很大。据调查,中国城镇中微波炉和吸尘器的普及率分别只有 5% 和 10%,电冰箱和照相机的普及率不到 73% 和 34%,空调器的普及率为 12%,中国农村的家用电器普及率更低,洗衣机拥有率为 22%,彩色电视机拥有率为 27%,家用电冰箱的拥有率仅为 8%。这一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是相当低的,日本 1995 年城乡家庭微波炉、吸尘器、电冰箱和空调器的普及率就已分别达到了 88.4%、98.4%、98.4% 和 77.2%;单就农户而言,空调器和微波炉的普及率就达到了 47% 和 81%,电冰箱、洗衣机和彩色电视机的普及率达到了 100% 和 98%。

(3) 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仍然很低,住房配套设施也比较落后,市场需求潜力很大。1997 年,中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仅为 8.8 平方米,房屋设施不健全,取暖制冷设备不足,煤气液化气普及率还只有 75.7%。

(4) 中国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水平仍然很低,市场需求潜力很大。1997 年,中国人均邮电业务总量仅 0.395 元;城市每万人拥有邮电局所为 2.2 个;每万人拥有医院病床和医生数分别为 23.5 张和 16.1 人。目前中国的服务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

(5) 中国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还很落后,市场需求潜力很大。1997 年中国拥有地铁营运线路长度总共只有 57 公里;人均铁路营业里



程只有 0.05 米，人均公路运输线路里程为 1 米；铁路和公路网密度分别为 60 公里/万平方公里和 1 278 公里/万平方公里；平均每万人拥有铺装道路长度和面积分别为 7.1 公里和 7.8 平方米；平均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 8.6 辆；1997 年平均每百人拥有电话机 8.1 部。

2. 从投入要素看，中国维持一个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也是可能的。

中国有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同时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也很高。改革以来，中国的投资率一般都在 35% 左右。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有些年份的投资率甚至超过 40%。近年来，中国的储蓄率已经超过投资率：1995 年超过 2 个百分点，1997 年超过 5 个百分点。中国现在也不存在外汇“缺口”。据计算，改革开放以来，除个别年份外，中国的资本—产出系数一般在 3~5 之间，估计未来一段时期内，可能维持在 4.2~5.0 之间。如果储蓄率能维持在 35% 左右，那么，GDP 的增长率就有可能维持在 7.0%~8.3% 之间。这个速度低于前 20 年的平均水平，但仍是比较高的增长速度。

3. 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看，中国人均 GDP 水平还很低，产业结构层次也低，就业结构层次更处于较低阶段。

这些都说明经济发展潜力还很大。再从产业技术水平看，中国产业整体上仍属于低技术产业，发展潜力也很大。尤其是中国一、二、三产业间劳动生产率差别很大，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得多。如 1997 年中国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 5.5 倍，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 4.3 倍。而且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要大批转移到第二、三产业，这是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因此，人们把一、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看成是判断经济是否进入成熟阶段和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性指标。

根据以上三方面的分析，中国今后一二十年内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可能的。当然，也要看到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1) 市场需求的制约。与过去相比，中国经济已由短缺经济变成相对过剩经济，绝大多数产品供过于求，尤其是农民收入增加较慢，限制购买力提高，使需求约束成了经济发展速度的最大制约因素。

(2) 自然资源的制约。由于人口多，中国人均资源拥有量比较低，很多资源的质量与品位也较低。中国的耕地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



8.89%，林地面积占13.39%，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8公顷，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0.26公顷/人）的1/3，人均水资源为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自然资源存量下降，人均占有量还会下降，如人均淡水、耕地、森林、草地和矿产资源等均是如此。资源供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约因素之一。

(3) 保护环境的制约。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环境污染在加剧，环境治理的任务十分艰巨。例如，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炭占70%以上，这种状况在较长时间内不会根本改变，大气污染的压力仍在继续加重。在水资源方面，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在下降，地区分布不平衡加剧，废水排放量在增加。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也不容忽视。

(4) 人口老龄化的制约。中国即将面对老龄化的挑战。到2002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将达10.15%以上（《中国发展报告，1996》），将进入老龄化社会。按国际通行的标准（按65岁以上人口比重计），2020年前后，中国也将迈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中低收入阶段进入老龄化社会的。

(5) 国际竞争力的制约。中国经济经过20年的对外开放，已越来越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参加WTO以后，国际竞争力的制约更不容忽视。

尽管存在以上制约因素，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只要政策正确，社会稳定，不断深入改革，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是会变成现实性的。

有关部门估计，21世纪前1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保持在7%~8%左右，到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21世纪第二个10年经济增长速度在6%~7%左右，在世界上仍处于高速增长之列。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估计2010年中国GDP总量居世界第二位，到2020年可居世界第一位。但在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发展质量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三、调整经济结构的必要性和任务

为什么“十五”计划时期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我体



会，主要是因为，虽然我国经济存在着比较高速度发展的可能性，但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要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从当前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看，调整和提高产业结构也已是当务之急。

这首先是产业结构适应需求结构发展的要求。当前，生产相对过剩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不相适应。由于居民已进入小康阶段或正在向小康阶段迈进，消费选择性增强了，不仅要求商品数量的满足，更要求质量档次的提高，品种花色的增加和商品服务消费的扩大。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步伐，使之与需求结构的变化相适应，才能解决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

这也是加快技术进步的要求。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是互为条件的。一方面，加快技术进步才能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加快技术进步也要求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例如，现在中国机械工业是“虚胖子”，低档产品过剩，高档产品产量少甚至不能生产，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对先进机械装备的需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也是为加快技术进步提供基础和条件。

这也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要求。加入 WTO 以后，中国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它不仅存在于国际市场，也存在于国内市场。它不仅是商品数量的竞争，更重要的是技术、质量和效率的竞争。如果我们不努力调整和提高产业结构，不提高我国产品和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产品被迫退出国内外市场。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也要求加速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步伐。

这也是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和深化改革的要求。很多国有企业面临困难，主要是体制问题，但生产相对过剩，商品销售困难，对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把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结合起来，才能帮助企业克服困难，从而为深化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总之，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要求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否则，国民经济是难以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

事实上，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中的规律性现象。经济结构变动既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又是经济顺利发展的条件和要求。各国的实践表明，经济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在世界历史



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正是由不同产业部门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不断消长变动而实现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改革开始以后,通过对以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反思和调整,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以轻纺工业为重点的产业发展。80年代后期,出现了能源、交通通讯、原材料等“瓶颈”制约,增长速度放慢。90年代经过调整,中国经济进入了以家电等新一代消费品、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房地产和证券等为重点的高速增长时期。可以说,是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的两次大的结构调整,为我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前,世界的分工格局和资源配置方式正在发生重要转变,中国经过长期高速增长以后,也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到了一个不经过结构调整升级就难以使国民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关键时期。一般认为,新一轮结构调整将有以下主要特点:(1)它是在短缺经济结束,传统产业普遍供过于求条件下进行的产业结构升级型调整。(2)它是在技术进步加速,正在对经济全局产生革命性影响下进行的加快技术结构升级的调整。(3)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基本形成,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进行的旨在形成结构调整新机制的调整。(4)它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中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进行的战略性调整。这些特点也决定了这次结构调整应该成为“十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主线。

这次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同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一篇研究报告中说的:研究目前的结构问题,首先要找出那些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的矛盾。这份研究报告列举了如下十个主要结构性矛盾:

(1)三次产业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产出结构中的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问题未能得到根本扭转,尤其是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过高。

(2)城乡之间的矛盾。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个突出问题。

(3)地区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人员、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更多地流向东南沿海地区。在省、市、自治区内部,也存在着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同时,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存在着产品与生产要素市场分割、对外封



锁、对内自我保护的现象。

(4) 产品和生产能力结构的矛盾。主要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产品和生产能力过剩，而社会所需要的许多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品和生产能力则供给不足，有些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

(5) 产业组织结构矛盾。中国产业和企业组织结构中存在着低水平过度重复、分散、小规模等问题，也存在着过度竞争与行政性垄断并存的现象。

(6) 消费结构矛盾。中国城镇居民吃、穿、部分用的需求基本满足，正在向住、行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性消费发展，但需求结构升级中遇到困难，出现了“消费断层”现象。在农村，也存在着由于收入水平低、收入增加慢、基础设施不配套从而使某些消费难以实现的问题。

(7) 金融结构矛盾。在资本市场发展、国有银行体制商业化改造、引入新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等方面都存在着改革滞后、不适应经济改革、经济发展需要的现象。

(8) 所有制结构矛盾。中国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但是，国有经济战线过长、功能错位的问题在某些领域仍很突出，所有制结构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任务仍很艰巨。

解决以上这些矛盾，是这次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

四、调整经济结构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十五”时期调整经济结构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怎样做好这次结构调整工作呢？经济界和理论界正在进行讨论。归纳起来，至少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 正确处理发展和调整的关系。以发展带动调整，以调整促进发展。如果缺少必要的增长速度，结构调整将会遇到极大困难。而只要方针和措施得当，完全可以在较长时期内维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2. 正确处理改革和调整的关系。结构调整要求深化改革，又将为深化改革创造有利条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要建立起产业调整升级的保障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证克服资源不足在各部门合理分配资源，



并且提高资源利用的利用效率，使人民得到最好的福利。这个机制包括合理的经济体制，优秀的企业家群体，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建立起这种保障机制。

3. 正确处理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关系。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基础，正确发挥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指导、协调、服务职能。结构调整中究竟以谁为主体？现在仍旧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政府置于主体位置，由政府规定产品如何调整、企业如何重组、如何进行技术改造等现象。这种情况亟待改变。

4. 正确处理产业进入和退出的关系。消除退出障碍，是结构调整中一个重要而又困难的问题，要在这个难题上有所突破。产业结构升级，要求一批高科技产业迅速成长，为此要求放松管制，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专营的领域外，应拆除不合理不必要的进入限制，给各种类型的合法企业以公平进入和竞争的机会。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也应该允许国内非公有制企业进入。

5. 正确处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关系。要在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有重点地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即高科技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基于我国国情的正确选择。因为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短缺，在国际分工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而且中国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就业问题将是长时期内的突出问题，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而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是长远发展的战略需要，是国家强大的物质基础。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即高科技产业也要注意发扬优势，突出重点，防止全面铺开和重复建设。

6. 正确处理装备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的关系。制造业在中国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总量会进一步增加。在资本品制造领域，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要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如数控机床、大型发电设备、交通设备、科学仪器设备等。在消费品制造领域，既要重视发展新兴的消费品产业，如高清晰度电视制造业、智能家庭服务设施制造业，也要重视发展一些有广阔市场的传统产业，如食品和纺织业。

7. 正确处理为生活服务的服务业和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的关系。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展第三产业一方面是吸纳就业、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发展工农业生产、提高制造业竞争能力的需



要。因此，既要继续发展为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又要大力发展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如金融、电信及法律、资信评估等各类中介服务。很多为生产服务的新兴服务业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发展第三产业面临着培养合格劳动者的艰巨任务。

8. 正确处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为了克服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矛盾，中国必须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为此，要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要形成大中小合理布局的城市群落。既要积极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也要对大城市、特大城市给予足够重视，它们是城市群落的核心。小城镇发展要与乡镇企业的改造、集聚结合起来，在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9.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关系。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既有制度建设问题，也有筹集资金问题。有人建议，可以通过国有企业股权减持、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发行国债或专项债券、财政列支、征收社会保障税等短期和中长期的办法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使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有效运转。

10. 正确处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关系。要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加快非国有经济发展。按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有进有退，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还要进一步发展多种类型的非国有经济，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混合和融合，促进多种类型民营企业的规范和提高，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三部分

提高经济效益和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



提高经济效果是当务之急*

我国“一五”时期的经济效果是比较好的，但从“二五”开始，除1963~1965年调整时期外，经济效果有下降的趋势。

首先是投资效果下降情况严重。主要表现为：

第一，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一五”时期平均为83.7%， “二五”时期平均为71.4%，1963~1965年平均为87.1%， “三五”时期平均为59.5%， “四五”时期平均为61.4%，1952~1978年平均为68.5%。我国1952~1978年基建投资共6 000亿元，仅形成固定资产4 000亿元。如果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维持在“一五”水平，则可多形成固定资产1 000亿元。

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低意味着交付使用财产占用资金多，在建工程多。各个时期情况如表1。

表 1

	每百元交付使用财产 占用资金（元）	在建工程占用资金 占投资额（%）
“一五”平均	126	53.8
“二五”平均	183	87.5
1963~1965年平均	286	167.7
“三五”平均	358	176.2
“四五”平均	289	160.6
1952~1978年平均	264	142.1

第二，建设周期拖长，造价提高。大中型项目建设周期“一五”时期平均不到6年，“四五”以来平均为11年半，延长近1倍。1979

* 本文原载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编：《经济问题研究资料》第8期（1980年8月7日出版）。



年全国在建的大中型项目中，已经施工 10 ~ 15 年的有 300 多个，15 ~ 20 年的近 50 个，20 年以上的有 100 多个。

建设周期拖长，工程造价必然相应提高。试举表 2、表 3 说明。

表 2 几种重要产品新增生产能力的综合投资 单位：元

	“一五” 平均	“四五” 平均	1976 ~ 1978 年平均	1976 ~ 1978 年增长	
				“一五” ±%	“四五” ±%
每吨钢的综合投资	1 360	2 431	3 497	+157	+44
每吨煤的综合投资	56	119	179	+220	+50
每枚棉纺锭的综合投资	684	1 004	1 250	+83	+25
每公里新建铁路的综合投资	57 万	150 万	167 万	+193	+11

表 3 每平方米房屋造价对比 单位：元

	1957	1978	1978 比 1957 上升%
厂 房	101.6	153.0	50.6
仓 库	42.4	91.6	116.0
办公室	58.9	98.0	66.4
住 宅	46.7	89.2	91.0
学 校	51.0	78.5	53.9

造价提高包括建筑材料涨价等合理的因素。但剔除这些因素后，投资效果也是大大降低的。根据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典型调查，1978 年民用工程比 1966 年以前同类工程增加的造价中，合理部分占 56%，不合理部分占 44%。

第三，投资系数^①增加。我国每增加 1 元国民收入需要的投资数：“一五”时期为 1.68 元，“二五”时期为 73.70 元，1963 ~ 1965 年为 0.92 元，“三五”时期为 2.32 元，“四五”时期为 3.76 元，1976 ~ 1978 年为 3.20 元。由此可见，近年来增加 1 元国民收入，投资比“一五”时期增加近 1 倍。我国 1953 ~ 1978 年平均投资系数为 3.18，而 1956 ~ 1976 年美国为 3.12，日本为 3.1，联邦德国为 3，英国为 2.8，法国为 2.9。我国技术装备水平比这些国家低得多，投资系数按理也应

^① 投资系数是投资和增加国民收入之比，也就是每增加 1 元国民收入需要的投资数。



该低。

第四，投资回收期拖长。据一机部典型材料，“一五”时期的大中型项目，建成后平均3年半收回投资。“三五”时期投产的15个项目，有10个平均7年半收回投资，有5个到现在还未收回。1970年以后建成的项目，到现在没有一个收回投资。估计投资回收期至少延长了1倍。另据计算，1952~1978年我国工业投资3500亿元，实现利润和税收共8000亿元，投资回收期大体是10年，而日本为3年，美国为4年，苏联为5年。

如果我们把投资效果逐步提高到“一五”时期的水平，例如把投资系数由1976~1978年的3.2降低到“一五”的1.68，依靠现有的投资，就能使新增国民收入增加1倍。

其次是“一五”以后我国工业企业的生产效果下降情况也极为严重。

先看固定资产的使用效果。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润，“一五”时期都在20元以上，最低是1955年的21.1元，最多是1957年的23.6元。“四五”时期除1971年为20.9元，其他年份都在20元以下，最低的1974年仅14.4元。1976~1978年分别为12.1元、13.3元、15.9元。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工业产值，“一五”时期都在130元以上，最低是1955年的131元，最高是1956年的151元；“四五”时期都在130元以下，最低为1974年的101元，最高为1971年的123元。1976~1978年分别为96元、99元、103元。一般比“一五”时期减少1/4。

再看流动资金的使用效果。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一五”时期除1953年在20元以上（22.2元）外，其他都在20元以下，最低为1956年的17元，“四五”时期最低为1971年的29.4元，最高为1974年的36.2元。1976~1978年分别为36.9元、34.2元、32元。一般比“一五”时期增加50%。

再看各个时期全民所有制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金和利润。这方面的情况是：



表 4 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金、利润 (元)

年 度	国营企业合计	其 中	
		工业	商业供销企业
“一五”平均	29.4	34.1	29.1
“二五”平均	29.4	34.9	23.0
1963~1965年平均	16.6	25.1	13.5
“三五”平均	18.9	27.1	14.7
“四五”平均	19.1	27.0	14.2
1976	13.6	20.1	12.6
1977	16.1	21.9	13.5
1978	18.2	24.8	12.3
1952~1978年平均	19.7	26.5	16.2

1978年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利比“一五”时期减少11.2元。当然，由于价格及其他一些条件的变化，现在要达到那时的水平是有困难的。但是当前的利润率显然太低了。1978年底国营企业共有资金6095亿元，如果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利增加1元，全国1年就可以增加收入60多亿元。

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也有下降趋势。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一五”时期为8.7%，“二五”时期为-5.4%，1963~1965年为23.1%，“三五”时期为2.5%，“四五”时期为0.3%。1976~1979年分别为-8.6%、8.1%、12.3%、6.4%。

为什么长时期来经济效果出现下降的趋势？这与积累率过高和建设规模过大关系密切。因为：

第一，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必然使建设项目不能及时得到所需的资金、设备、材料和劳动力。过去几年，木材、钢材、水泥一般只能满足需要量的60%~80%。这种情况，势必拖长工期，增加造价。据估计，全国基本建设项目的工期拖长1年，仅工资就要多支出50亿元。

第二，建设规模过大势必影响原有企业的生产，这就是扩大再生产挤掉简单再生产，结果两败俱伤。由于基本建设挤掉了生产用的原材料和燃料动力，许多原有企业开工不足，停三开四或停四开三非常普遍。据统计，全国33个重点城市1979年10月份全部用电设备利用率仅为55.1%，1978年机械工业重点企业的机床利用率仅为55.5%。

第三，基建规模过大必然导致国民经济大起大落，使得许多工程被迫下马。1958年和1959年我国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54.8%和36.1%，



1961年和1962年每年下降38.2%和16.6%，1961年基本建设投资比1960年减少2/3，1962年又比1961年减少1/2，这种情况造成了大量的损失和浪费。

第四，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必然影响人民生活。“一五”时期全国居民个人消费水平每年平均提高6.1%，大家心情舒畅，干劲很大。“二五”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改善不多，有的时期甚至下降。全国居民个人消费水平，1969~1977年期间每年只递增2.5%，职工名义工资由618元下降到602元。1966~1977年每个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每年只增加一元钱。群众生活中很多困难得不到及时解决，势必影响劳动积极性，降低劳动效果。

投资方向不合理也是经济效果下降的重要原因。过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过分突出重工业，忽视轻工业。

“一五”时期工业投资中轻重的比例是1:8，“二五”计划曾要求提高到1:7，实际上，轻工业投资比重却逐渐下降，“二五”为1:10.8，1963~1965年为1:12.8，“三五”为1:14。“四五”以后轻工业投资中包括生产原料项目的投资，比重稍有提高。“四五”为1:10.1，1976~1978年为1:8.3，仍低于“一五”的水平。

轻工业的经济效果比重工业高得多。表5是1978年轻重工业经济效果的比较。

表5

	每百元固定资产 实现的产值(元)	每百元资金实现的 利润和税收(元)	每百元产值占用的 流动资金(元)	资金回收年限
全部工业合计	102.6	24.2	32.0	4年2个月
轻工业	265.0	54.1	19.0	1年10个月
重工业	74.0	18.0	39.0	5年7个月

如果能适当地多发展一些轻工业，将有利于提高经济效果。

第二，工业布局不合理。

建国以来在加强内地工业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三线建设浪费很大。“三线”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一五”为30.6%，“二五”为36.9%，1963~1965年为38.2%，“三五”为52.7%，“四五”为41.1%。1952~1975年共投资1944亿元。特别是在林彪“山、散、



洞”谬论的干扰下，许多建设项目布局很不合理，不仅浪费了大量投资，而且成为沉重的包袱。

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效果很不相同。例如：1978年全部资金回收率全国平均为24.2%，上海为75.5%，天津为41.8%，江苏为34%，贵州为7.7%，内蒙古为5.9%；产值利润率全国平均为15.5%，上海为23.1%，天津为17.4%，江苏为11.9%，贵州为8%，内蒙为5.9%。我们当然不能以利润率为投资的惟一标准，但在各地区之间分配投资时必须考虑这个因素。

第三，在发展五小工业时不注意经济效果。

根据我国情况，在因地制宜、讲求经济效果的前提下适当发展一些五小工业是必要的，但过去违背了这个前提。试以小钢铁、小化肥的经济效果同大中企业相比为例：

表 6 1978 年大中小钢铁企业经济效果比较

	每百元固定资金 提供的利润（元）	每吨生铁 成本（元）	每吨生铁 耗焦（吨）	每吨焦耗 煤（吨）
重点企业	14.99	138	0.575	1.45
中型企业	-3.04	192	0.86	1.44
小型企业	-3.8	304	1.128	1.85

表 7 1978 年大中小合成氨厂经济效果比较

	大型企业平均	中型企业平均	小型企业平均
每吨合成氨成本（元）	167.85	300.41	491.68
每吨合成氨耗电（度）	16.66	1516	1765

第四，过分重视新建，忽视原有企业的改造。

我国原来工业基础薄弱，在一定时期把基建投资的主要部分用于新建，这是合理的，但当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就应该重视原有企业的改造。然而长时期来我国用于新建的投资所占比重有增无减。

表 8

年 度	新 建	改建扩建
“一五”合计	46.4	52.3
“二五”合计	57.6	36.7
1963~1965 合计	52.2	42.6
“三五”合计	54.6	39.9
“四五”合计	57.0	37.3

注：以投资总额为100%。



同新建企业相比，改造现有企业一般可以节省投资 2/3，设备材料可以省 60%，投产时间快得多，见效较快。我国忽视原有企业的改造，也对经济效果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从“二五”时期开始，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后来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国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水平不是不断提高而是不断降低，这是经济效果显著降低的根本原因。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的管理工作不断有所改进，但是至今仍很落后。

例如，1978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中还有 19.3% 的企业亏损，亏损总额达 42.1 亿元。其中轻工业亏损面为 11.5%，亏损总额 4.8 亿元，重工业亏损面为 25.7%，亏损总额 37.3 亿元。冶金工业亏损面达 42.8%，亏损总额 11.7 亿元。

又如，1979 年工业中不少经济技术指标还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例如钢铁工业的高炉利用系数、生铁合格率、平炉钢锭合格率、顶吹转炉钢锭合格率；煤炭工业的商品煤灰分、洗精煤回收率、洗精煤灰分；机械工业的铸铁件废品率；建筑材料工业的回窑运转率，水泥磨运转率等指标，1979 年都还不如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历史最好水平。

再如，1979 年重点企业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量也有不少指标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如冶金工业的每吨生铁耗铁矿石、每吨平炉钢耗钢铁料、每吨转炉钢耗钢铁料、每吨电解铝耗直流电；电力工业的每千度电耗标准煤；化学工业的每吨合成氨耗焦炭、白煤，每吨电石耗电；交通运输的载货汽车每百公里耗油等指标，1979 年都没有达到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最好水平。

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以来，提高经济效果已出现了好的苗头，但当前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必须下大决心，花大力量改进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尽快地提高经济效果。



论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是根据当前情况制定的英明决策。调整国民经济要求克服盲目追求速度，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果。两年多来，我们在调整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调整的任务还远未完成。究其原因，固然由于调整工作比较艰巨，同时也是由于认识上还不一致，有些同志仍然热衷于追求高速度和扩大基本建设规模，没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效果上。从1981年开始，我们还必须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要求在克服比例失调的同时，使各方面的经济效果有一个大的提高。研究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果的关系，对于完成这一任务，是极为必要的。

用实践来检验我们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

为什么在调整时期有些同志只重视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效果？我认为这是同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有关的。这种理论的核心是把速度问题无条件地看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首要问题和政治问题，认为经济发展速度快，经济效果一定好，并且认为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这种理论过去被认为完全正确，指导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早在建国之初，就流行着社会主义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高速发展的理论。当时在我国作为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对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保证国家独立的根本任务，要求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工业化”。该书引用斯大林的话说：“我

* 原载《群众论丛》1981年第5期。



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但我们还是不满足于这种速度，搞起了大跃进。

1958年以后，为了给大跃进创造理论依据，理论界进一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必须高速度发展，形成了一套相当系统的高速度、大跃进的理论。当时有些同志提出大跃进造成了比例失调，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这本来都是事实，但却被说成是右倾观点，受到批判。发表了大量文章论证高速度和按比例是完全统一而没有矛盾的，用速度快来证明经济效益好。值得注意的是，从那时开始，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增加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发展规律。有的文章把这个规律概括为：第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必然要远远地超过资本主义经济；第二，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发展是全面的综合的；第三，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度是连续不断的。很多书籍、文章说：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必然高速度发展，从而产生了高速度发展的规律。很多文章还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人类已经由必然的王国进入自由的王国，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客观经济规律一经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就必然导致“大跃进”，“大跃进”使比例更加协调了，效果更加提高了。从此人们把高速度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把低速度同修正主义等同起来。

大跃进的结果是我国经济严重衰退，我们被迫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时期，有些理论问题得到了澄清，例如强调了经济比例、经济效益的重要性。但由于受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并未得到解决，高速度和大跃进的理论继续完全得到肯定。当时虽然也曾对“大跃进”的缺点进行过总结，但主要是从工作方法、思想方法上检查缺点错误，理论界并没有对高速度理论提出怀疑。而且“十年动乱”中又把已经澄清的一些问题弄得更加混乱了。正确的又被说成是错误的。

粉碎“四人帮”后，按理应该立即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头两年我们却继续搞大干快上，加剧了国民经济中的某些比例失调。理论界在批判“四人帮”反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谬论时，继续宣传高速度理论，本文作者也曾在文章中片面强调工业发展的高速度。这样做除了由于对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后果估计不足，还由于长期流行



的高速增长理论仍在支配或影响我们的思想行动。现在有些同志仍无条件地把高速度当做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因而不很注意甚至很不注意经济效益问题，对调整方针产生种种不应有的疑虑，也正是这种传统理论在发生作用。

应该指出，这种传统理论并不是没有正确的内容，有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例如认为经济发展速度是个重要问题，具备条件时应该努力使速度快一点，等等。但有不少内容则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内容和正确的内容交错在一起，使得人们难以识别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难以清除它的影响。现在为了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并使今后不再重犯盲目追求高速度忽视经济效益的错误，有必要弄清楚这种传统的理论。为了弄清楚这里的问题，不应该采用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的简单化办法，而应该看到问题的复杂性，进行全面的、具体的、科学的分析研究。由于这几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我们也已经具备条件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要求，来科学地认识这种传统的理论。

增长速度快经济效益未必一定好

发展速度快经济效益一定好的观点曾经是一种流行于很多国家的经济学观点。印度拉达克里希纳在《从发展中国的角度来观察科学技术和全球问题》一文中说：“千方百计地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以取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传统的发展战略，曾被视为普遍运用的法则。这种战略的倡导者认为，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度增长带来的好处，会自动分摊到社会最下阶层的头上。在这种战略指导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往往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以便早日实现工业化。”我国的发展战略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当然是有原则区别的，但在处理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上又是有共同点的。

经济增长速度快经济效益是不是一定好呢？当然不一定。因为，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发展趋势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我国通常用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来衡量经济增长，而经济效益则是指经济活动中劳动占有量和劳动消耗量同劳动成果的比较，显然，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远不能反映经济效益的好坏。当然，经济增



长还可以用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以及每人平均工农业产值、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国民收入等指标来反映，这些指标反映了经济效果的某些内容，但也不能完全反映经济效果的情况，例如单位产品成本、工资利润率、成本利润率、资金利润率、投资回收期以及劳动者收入状况、消费水平等就不能从这些经济增长指标反映出来。

我国长期的建设实践也表明，增长速度快经济效果未必一定好。

建国以来，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看，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即使“十年动乱”时期，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速度也达7%左右，同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也名列前茅。但是，“一五”时期以后，除1963~1965年调整时期外，经济效果是比较差的。

从生产过程看，经济效果首先表现为消耗大，浪费严重。我国很多企业在原材料、燃料、动力以及劳动力方面浪费十分严重。1978年按全国主要工业产品的38项消耗指标考核，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的有17项，占45%，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我国能源利用率很低，1978年我国能源的有效利用率只有28%，而日本为57%，美国为51%，西欧国家为40%。1975~1977年，我国每万吨能源所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08美元，比日本的1299万美元低76%，比美国的664万美元低54%。能源使用的经济效果曾大幅度下降。“一五”时期每亿元工农业总产值消耗的能源为7.28万吨，1965年为9.62万吨，1978年上升为10万吨。1978年多数工业产品的成本也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一些中小企业的成本更是高得惊人，如每吨生铁的成本，重点企业平均为134.6元，其中本溪钢铁公司只要102.5元，而中小钢铁企业高达313元。我国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润，1957年为23.6元，1976年下降为12.1元，减少49%，每百元资金的利润和税金，1957年为34.7元，1976年下降为19.3元，减少45%，这是能反映“一五”以后我国生产中经济效果下降的情况的。

生产中经济效果差还表现为产品质量差。有些产品花了很大代价生产出来，计算了产值和利润，但由于质量差，不具备应有的使用价值，有的甚至完全没有使用价值，成了废品。1978年全国主要工业产品的30项质量指标，有19项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占43.3%。一些中小企业产品质量差的情况尤其突出。据化工部门统计，在1099个县以下磷肥企业中，有51%的企业生产的是不合格品。1979年上半年一机部



重点企业铸铁件废品率为 8.24%，铸钢件废品率为 4.37%，比历史较好水平分别高出 1.54% 和 1.12%，农机部重点企业铸铁件废品率为 16%。据了解，日本机械工业的铸铁件废品率一般小于 1%。产品质量差，使用寿命也就短。汽车轴承，我国只能用来行车 10 万公里，美国可用来行车 40 万公里；航空轴承，我国只能用来航行 1 000 小时，英国却达 7 000 小时；农机的缸套、活塞的使用寿命，我国一般只有 2 000~4 000 小时，国外普遍达到 6 000~8 000 小时。质量差也是有些产品积压的重要原因，例如目前大量积压的机电产品中，据估算质量太差、需要报废的约有 5%~10%，虽然勉强使用但要削价处理的约有 40%。

从流通过程看，经济效果差的表现，一是流通过程迟缓，物资积压严重。1980 年 6 月底全国机电产品库存 619 亿元，库存周转天数 587 天，比上年增加 56 天，库存中超储的约有 200 亿元，占 32.3%。同年 10 月底全国钢材库存 1 925 万吨，可供使用 8 个月，超过国家规定周转期近 3 个月，约超储 700 万吨，折合金额 53 亿元。物资积压不仅使产品不能及时利用，长期积压还使有些产品完全失去使用价值。1980 年 9 月末商业系统批发单位的五金、交通、化工商品库存总额 93.4 亿元中，滞销和变质的约占 30%，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库存中，冷背呆滞的约占库存 7.5%。10 月末外贸出口商品库存中，不适销和质量规格不合格的估计占 10% 以上。

流通过程中经济效果差的集中表现是资金占用多。1964 年国营企业年末流动资金占用额是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 42%，1965 年为 40%，而在 1975 年到 1978 年四年中，国营企业年末占用流动资金都超过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比正常年份高出 10% 多。如 1965 年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 28.1 元，1978 年达到 33.6 元，如果维持在 1965 年水平，1978 年可以少占用流动资金近 200 亿元。再从商业部系统看，1978 年每百元销售额占用流动资金 51.54 元，比 1965 年多 7.4 元，按当年销售总额计算，估计多占用流动资金 80 亿元。仅此两项，就比历史较好水平的年份多占用流动资金 280 亿元。我国流动资金周转速度同国外相比差距更大。日本芝浦厚钢板加工中心的资金每年周转 38.3 次，京阪水泥制品厂的资金每年周转 32.5 次，一般物资供销企业的资金每年周转近百次。1978 年我国国营工业流动资金仅周转 2.96



次，商业流动资金仅周转 1.94 次。当然这里有不可比的因素，但从中也可看出我国流通过程中经济效果存在的问题。

从基本建设看，经济效果差主要表现为：（1）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一五”时期平均为 83.7%， “二五”为 71.4%， 1963~1965 年为 87.1%， “三五”为 59.5%， “四五”为 61.4%， 1976~1978 年分别为 58.9%， 71.4%， 74.3%。我国 1952~1978 年基建投资共 6 000 亿元，仅形成固定资产 4 000 亿元，如果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维持在“一五”水平，则可多形成固定资产 1 000 亿元。（2）建设周期延长，造价提高。大中型项目建设周期“一五”平均 6 年，“四五”以来平均为 11 年半，延长近 1 倍。钢、煤、棉纺锭和铁路等新增生产能力的综合投资，1976~1978 年比“一五”一般增加 1~2 倍以上；每平方米房屋造价，1978 年比 1957 年增加 50% 到 1 倍以上。（3）投资系数增加。我国每增加 1 元国民收入需要的投资数，“一五”为 1.68 元，“四五”为 3.76 元，1976 至 1978 年为 3.2 元，可见近年来增加 1 元国民收入，投资比“一五”时期增加近 1 倍。如果使投资系数维持在“一五”水平，依靠现有的投资，就能使新增国民收入增加 1 倍。（4）投资回收期拖长。据一机部 1979 年典型材料，“一五”时期的大中型项目，建成后平均 3 年半收回投资，“三五”时期投产的 15 个项目，有 10 个平均 7 年半收回投资，有 5 个仍未收回投资。1970 年以后建成的项目，到调查时没有一个收回投资，估计投资回收期至少延长了 1 倍。另据计算，1952~1978 年我国工业投资 3 500 亿元，实现利润和税收共 8 000 亿元，投资回收期大体是 10 年，而日本为 3 年，美国为 4 年，苏联为 5 年。

马克思曾引用李嘉图的话说：“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① 由于经济效果下降，虽然 20 多年来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不慢，但真正的社会财富并没有相应地增加。加上积累率高，人口增加多，人民生活也就难以迅速改善了。从 1957 年到 1978 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9.7%，而广大职工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相应改善，反而下降了。扣除物价因素后的职工实际工资，1978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Ⅲ，第 281 页。



年平均为 557 元，比 1957 年的 583 元下降 26 元，平均每年下降 0.2%。农民社员每人从集体分配的收入 1978 年为 73.9 元，比 1957 年增加 33.4 元，平均每年增加 2.9%，但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也没有增加那么多，相当一部分农民还比较贫困。生活改善的情况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效果的主要标志，我国近 20 多年来人民生活改善慢，是经济效果差的集中表现。

综上所述，可知经济增长快经济效果未必一定好。过去我们在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中重视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效果，甚至有时只考虑增长速度不考虑经济效果，因而长时期来经济效果很差，这种错误的做法，以后应该引以为戒。

关键在于使经济结构合理化

那么经济增长快经济效果是不是一定低呢？当然也不是。从我国历史看，“一五”时期增长速度很快，经济效果也比较好。这一时期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 10% 以上，很多经济效果指标都保持在较好水平。“一五”期间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润都在 20 元以上，最低的 1955 年也达 21.1 元，国营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平均为 29.4 元，其中工业企业为 34.1 元，商业供销企业为 29.1 元。国营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达 8.7%。1952 ~ 1957 年，国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由 446 元增加到 637 元，增加 43%，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 76 元增加为 102 元，增加 34%。1963 ~ 1965 年我国经济增长也很快，经济效果也较好。这个时期经济发展带有恢复的性质，但也说明经济增长快和经济效果好并不是完全排斥的。

再从国外情况看，有些国家战后一段时期内也在经济增长快的同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例如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1951 ~ 1960 年为 6.9%，1961 ~ 1970 年为 10.7%，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 1952 年为 189 美元，1975 年增加为 3 842 元，年平均增长率为 14%。按人口平均的工业产量 1951 ~ 1960 年平均增长率为 15%，1961 ~ 1970 年为 11.5%。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 1951 ~ 1960 年为 11.2%，1961 ~ 1970 年为 10.1%。1950 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日本为美



国的14%，1977年已达44%。

因此，既不能认为经济增长快经济效果一定好，也不能认为经济增长快经济效果一定差。盲目追求高速度是不对的，结果会导致低效果，但是认为速度愈低愈好也是不对的。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也难以取得一定的经济效果，人民的收入也难以增加，生活难以提高。我们要争取既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又有较好的经济效果。

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既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又有较好的经济效果呢？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从我国经验看，除了确定增长速度时要考虑客观可能性和进行综合平衡外，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处理好经济结构问题，也就是要使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化。这里所说的经济结构主要是指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及其内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及其内部，社会再生产各个方面及其内部的量的和质的关系。它包括各种经济比例关系，但不等于这些比例关系的总和。十分明显，经济结构既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也对经济效果有重要影响，经济结构合理才能保证经济顺利增长和提高经济效果。同时经济结构也受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的制约，并且是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相互发生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过去我们曾重视过经济比例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的关系，通过这两年对于经济结构的研究，认识到还应该重视整个经济结构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的关系和作用，这是理论研究工作上的进步。

根据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到经济结构问题对于处理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的关系极为重要。解放前我国经济结构极不合理，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改造和调整，情况有所好转，“一五”时期进一步朝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既保证了有较快的增长速度，又保证了有较好的经济效果。1958年起盲目追求速度，不仅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而且重工业中也是钢铁工业孤军突出，使重工业内部结构也遭到破坏，因而导致严重比例失调，经济效果急剧下降。经过三年调整，经济结构又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才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经济效果迅速提高。但以后又盲目追求高速度，经济结构又趋恶化，虽然表面看来增长速度不慢，但经济效果又继续下降，使我们不得不又一次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调整。

从其他国家看，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的影响也极为明显。日本战后经济增长快和经济效果好，就同它根据本国情况处理好经



济结构有密切关系。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分析日本经济发展得出结论说：“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是迅速的，而且这与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高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①人们通常把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称之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既以经济增长快、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前提，又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保证经济效果的提高。日本的经济结构固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是也不能否认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是比较适应本国的具体情况的。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一个以各国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过程，由于日本产业结构高度化比较适应本国的情况，因此它才能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起积极作用。

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还表明，盲目追求高速度必然带来如下一些结果：

第一，工业挤农业。过去曾错误地把经济增长看成就是或者主要是工业增长。因为忽视农业，盲目追求高速度主要也是追求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并用牺牲农业的办法来加快工业的发展，这样，虽然也说重视农业，实际上农业一直处于被挤的地位。我国是一个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在国民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据1979年统计，农业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73.8%，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29.7%，农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38.8%。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值占轻工业产值的69.3%，农村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54.5%，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6%。毛泽东同志曾分析过农业对于发展轻工业、重工业和提高人民生活的作用，这些分析是完全正确的。不处理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使农业迅速发展起来，我国国民经济很难健康发展，经济效果也难以迅速提高。

第二，重工业挤轻工业。为了追求高速度，过去一直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成教条，不顾条件地盲目推行，结果重工业又挤了轻工业，不仅使人民生活需要的轻工业品得不到及时满足，而且直接降低了经济效果。轻工业的发展是受农业和重工业制约的，但它也制约着农业和重工业的发展。轻工业需要的能源比重工业少，利润率高，资金周转快。据计算，重工业每亿元产值耗能比轻工业多4倍，耗电多2倍。1978年轻

^① 《现代日本经济》，第99页。



工业和重工业相比，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产值分别为 265 元和 74 元，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分别为 54.1 元和 18 元，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分别为 19 元和 39 元，资金回收年限分别为 1 年 10 个月和 5 年 7 个月。

第三，基本建设挤生产和维修。由于盲目追求高速度，我国曾多次出现基本建设投资过度增加和基本建设规模恶性膨胀。陈云同志早就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进，就会出现经济混乱”。长期来我国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其结果，一是使建设项目不能及时得到所需的资金、设备和材料，拖长了工期，增加了造价。二是挤掉了生产和维修所需的资金、物资和能源，使现有企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扩大再生产和简单再生产都不能顺利进行。三是导致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多次使得大批工程被迫下马，造成极大浪费。四是难以及时调整投资方向，使能源、交通、住宅以及文化教育等基础结构得不到必要的投资，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

第四，积累挤消费。为了实现生产和基建的高速度，势必大幅度增加积累，而由于积累的经济效果下降，达到同样的增长速度就需要更多的积累。1958 年以后我们基本上处于这种恶性循环中。“一五”时期我国积累率为 24.2%，比较合理，以后有上升的趋势，如“二五”为 30.8%， “三五”为 26.3%， “四五”为 33%，1976~1978 年分别为 31.1%、32.3%、36.5%。伴随着积累率的提高，积累的经济效果则大幅度下降。“一五”时期我国每百元积累增加国民收入 31 元，“四五”仅为 16 元，减少近一半，增加同样数量的国民收入要多花近一倍的代价。

由上可知，盲目追求高速度所以导致经济效果下降，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违背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从而破坏了合理的经济结构或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不能再走经济效果差的路子了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今后经济建设中我们绝不应该再把增长速度放在第一位，而应该切实地重视经济效益并把它放在重要的地位上。我



们要根据取得最佳经济效果的要求来确定合理的增长速度，而不应该用降低经济效果作为代价来取得所谓的高速度。增长速度优劣的标准主要在于能否保证最佳的经济效果。换句话说，宁肯增长速度慢些，但要经济效果好些。还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关系，速度指标应有利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这样才能保证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现在经济科学把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效果三者结合起来研究，这是很有道理的，目的就是要使经济增长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效果。

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的关键是要对我国的国情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我国是一个有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大国，不仅底子薄，而且现在生产力水平很低，尤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农产品商品率很低。我国人民生活还有不少困难，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生活相当贫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有我国这么多人口，这么多农民。这种情况给我们经济建设带来特殊的困难，一方面制约着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决定了更要重视提高经济效果，更要重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长时期来我们是靠多发展重工业、多搞基本建设维持高速度的。也就是用紧缩人民消费、保持过高的积累率来维持高速度的，这是一条代价高、效果低的路子，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因而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and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后我们再不能走这条路子了。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陈云同志就指出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必将造成浪费。当时追求高指标被说成是积极平衡，即所谓按长线搞平衡。陈云同志说：按长线搞平衡不可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结果只能是材料和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当时陈云同志还提出了克服高指标的办法，指出：“拟定计划指标，要看各方面的条件，有多少能力，就搞多少，不能凭主观愿望。”他强调要搞好综合平衡，指出：“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这些意见现在也是适用的。

应该指出，过去那种以降低经济效果为代价的所谓高速度的路子现在也不可能走了。因为经济增长毕竟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的制约。由于经济效果差和比例失调，到一定时候必然发生生产建设下降，基建被迫下马。我国 1958 年搞“大跃进”，第二年农业就大幅度减产，连续下降 3 年；1961 年工业生产也大幅度下降，连续下降 2 年；“二



五”时期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0.6%，国民收入则每年递减3.1%，这就是大跃进的直接结果。近几年我国工业（不包括队办企业）增长速度也是下降趋势，1977年为14.3%，1978年为13.5%，1979年为8.5%，1980年又低于1979年的速度，这也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事实证明，如果计划指标不切合实际，即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高速度也只能是暂时的而不能是持久的。在经济效果下降的情况下，增长的高速度绝不能长期维持。

在确定当前经济发展速度时，尤其要注意经济增长在以下一些方面受到的限制。首先是资金方面的限制。过去两年我国连续发生较大的财政赤字，造成赤字的重要原因是基建投资过多。显然，我们不能再依靠财政赤字扩大基建规模，否则将会带来极为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有些同志企图依靠借外债搞基建，我们认为，适当利用外资是必要的，但如果不顾本国财政经济状况盲目地借外债，必将使我国陷于被动和困境。其次是能源方面的限制。近期内我国能源难以大量增长，有些能源甚至可能减产，这显然也限制着增长速度，尤其是限制着耗能多的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再次是原材料方面的限制，现在不少加工工业的发展受到原材料的限制。此外，有些生产还受着市场的限制，例如很多农机产品就缺少销路。

由于以上情况，过去那条依靠优先发展重工业、多上基本建设项目、大量增加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的路子现在也走不通了。我们必须坚决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争取尽早消灭赤字，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必须大力节约能源，适当减少有积压的或需要不很迫切的重工业产品的生产，节省出能源来加快发展耗能少的轻工业生产；同时必须压缩过长的加工工业战线，使生产规模和原材料供应以及市场需要相适应。总之，我们不能再盲目追求高速度，再无条件地把速度放在第一位。在处理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的关系时，要把经济效果放在第一位，实事求是地确定合适的增长速度，争取最佳的经济效果。

调整时期我们的增长速度会慢一点，但是提高经济效果的潜力却是很大的。我国现有30多万个工交企业，其中不少企业的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经济效果很差。例如1979年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金实现的利润为16.2元，仅为1957年23.6元的68%，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为16.1元，仅为1957年24元的67%，每百元产值占用



的流动资金为 31 元，比 1957 年 19.4 元增加 60%。其他如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提高投资效果等方面的潜力也都很大。

当前我们的任务是要把现有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这就要求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来一个转变，即由过去以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变为以内含的扩大再生产为主。马克思曾说：“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① 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依靠新铺摊子，新建项目，增人、增投资、增设备。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则依靠改善生产要素的质量，依靠提高劳动效率和生产资料的效率，依靠提高技术和改进经营管理。我们通常说的依靠挖潜、革新、改造扩大再生产，就是指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它比建设新项目经济效益好得多。据一些典型材料，改造现有企业比新建同样的企业，投资可以节省 2/3，设备材料可以节省一半以上，短时期内就可以有收益。我国过去工业基础薄弱时，主要依靠新建来扩大再生产是有道理的，但当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继续主要靠这种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就不妥当了。今后除能源和交通等基础结构方面有些要新建外，一般的扩大再生产，主要依靠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我们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改进管理，提高技术，降低消耗，提高质量，提高效率，把经济效果的潜力充分发掘出来，使经济效果显著提高起来。

有的同志担心现在放慢速度会延缓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认为，只要实事求是地确定增长速度，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现在速度放慢一点，符合实际，留有余地，将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效果。当然，经济效果的提高还要进行其他许多工作，要有一系列具体工作、具体措施跟上来。但当前放慢重工业的速度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确是提高经济效果的前提条件。这样做，才能使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效果相互促进，在它们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为将来在一定时候有较快的经济增长打下基础。

^① 《资本论》第二卷，第 192 页。



经济效果问题是经济建设的核心问题*

经济效果差是当前我国经济建设中很多困难的根源，妨碍着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要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最近召开的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又指出：把经济工作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是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关键。因此，提高经济效果是我国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中心任务。

我国建国以后的不同时期，经济效果的情况很不相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即 1952 ~ 1957 年，经济效果是比较好的，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1952 年为 25.4 元，1957 年增加到 34.7 元。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即 1958 ~ 1962 年，经济效果大大下降，1962 年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只有 15.1 元，不到 1957 年的一半。1963 ~ 1965 年三年调整时期经济效果又提高了，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 1962 年为 29.8 元，1966 年为 34.5 元。就是说经过三年调整，经济效果又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最好水平。1966 年以后的“十年内乱”中，经济效果又大大下降了，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1975 年只有 22.7 元，1976 年进一步下降到 19.3 元，1976 年比 1966 年下降了 1/3 以上。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效果才又开始好转，1979 年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已恢复到 24.8 元，但是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差距还不小。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消灭了剥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

* 原载《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1982 年第 2 期。



划经济，经济活动完全可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有些同志看到现在经济效果差，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下能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上述情况也表明，只要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一定可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的。以上说的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是反映企业经济效果的综合性指标，不仅从这个指标可以看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效果是比较好的，从其他指标也可以看到这段时期的经济效果是比较好的。例如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1952年为134元，1956年提高到151元；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1952年为23.1元，1957年降到19.4元。“一五”时期我国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为35元，这个指标说明投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1963~1965年三年调整时期，经济效果也是相当好的。但是，不能否认，长时间来我国经济效果是比较低的。在最近几年的经济调整中，多年形成的经济效果差的状况已经有所改进，但还没有根本改变过来。例如，生产中消耗大，浪费严重。这几年我国工业在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方面成绩是不小的，1980年在能源生产下降1.3%的情况下工业生产仍然增长8.7%，然而有些企业在原材料、燃料、动力和劳动力方面的浪费仍然十分严重，据一些工业部门重点企业74项物质消耗指标的统计，1980年1月到11月平均比1979年同期降低的占68%，上升的占32%。每吨能源生产的国民收入，1979、1980年两年平均为551元，比“一五”时期的1167元降低53%。又如，产品质量差。这几年我国多数主要产品质量有所提高，但是1980年还有40%左右的质量指标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再如，流通过程迟缓，物资积压严重。1979年全国国营工业企业平均每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31元，比历史最好水平1956年的17元多占用14元，如果达到历史最好水平，1年就可以节约流动资金500亿元。目前全国钢材库存约2000万吨，机电产品库存约600亿元。有不少是超储积压的。再如，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差。钢、煤、棉纺锭和铁路等每单位新增生产能力的综合投资1976~1978年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般增加1~2倍以上。我国每增加1元国民收入需要的投资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1.68元，1976~1978年为3.2元，近年来增加1元国民收入所需投资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加近1倍。

经济效果差当然是一件坏事，但是也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



潜力，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想方设法提高经济效果，改变经济效果差的状况。为了提高经济效果，必须找到经济效果差的原因，同时要研究制约经济效果的因素，找到提高经济效果的办法和措施。

制约经济效果的因素是很多的，我国经济效果差的原因也很复杂。一个主要原因是盲目追求生产建设的高速度而忽视了经济效果。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生产建设速度虽然较高，但是比较切合实际，经济效果也较好。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追求不切合实际的高速度，例如搞钢铁一年翻番，经济效果就急剧下降。这些事实表明追求不切合实际的高速度就会导致经济效果下降。

多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存在着一种速成论思想，背离了中国的国情，希望过快地实现工业化。主要表现有：第一，提出过高的工业生产指标，使工业挤了农业，导致工农业比例失调。第二，片面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使重工业挤了轻工业，造成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加上实行“以钢为纲”，又导致工业内部比例失调。第三，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使基本建设挤了维修和生产，导致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比例失调。第四，积累率过高，积累挤了消费，造成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失调。由于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社会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经济效果也就难以提高甚至难免下降。

在经济比例和发展速度的关系问题上，我国长期来存在着争论。曾经流行过一种观点，强调速度而忽视比例，认为计划工作中比例应该服从速度，这是一种为追求不切合实际的高速度辩护的理论。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生产发展速度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具备可能性时，我们要力求使生产速度快一点。但是，高速度要以按比例为前提条件。没有按比例，也就不会有持久的和经济效果好的高速度。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速度和比例的关系，把调整经济结构，克服比例失调作为当前调整时期的首要任务，同时实事求是地确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生产发展速度，这样才能为提高经济效果提供有利条件。

我国经济效果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管理体制上存在着缺陷，例如，管理权限过于集中，企业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和必要的自主权，经营管理听命于上级。这就可能产生以下一些弊端：首先，由于按行政系统和行政区划管理经济，各个部门、各个地区自成体系，难免破坏国民经济的内在联系和比例关系，引起比例失调。其次，限制了企业发挥积



极性和主动性，企业吃“大锅饭”，职工捧“铁饭碗”，缺乏改善经营管理的强大动力和必要压力。再次，不利于正确利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使人民的需要得不到及时的反映，从而导致生产和需要脱节。这一切都不利于经济效果的提高。

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来探讨，就是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如何提高经济效果。如前所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1963~1965年调整时期的经济效果是比较好的。这就说明，在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下经济效果并不必然很差。那么，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怎样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有意义的问题。看来，这种体制取得好的经济效果至少要具备如下几个条件：第一，它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和经营管理水平；第二，它有比较健全的机构，能够正常地、顺利地运转；第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正确。第三点是特别重要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后，经济效果下降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前面说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现在我们已经彻底清理了错误的指导思想，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端正了。同时，我们正在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采取措施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也是提高经济效果的有利条件。当然，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很艰巨的，但是，从这几年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并摸索到了一些经验。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前一段改革的经验，争取经济改革更健康地发展，促进经济效果的提高。

我国经济效果差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经营管理差，不少企业的经营管理甚至相当混乱。例如有些企业劳动纪律松弛，出勤率低，或者出勤不出力；有些企业定额、计量、统计等基础工作很差，没有严格的成本核算制度；有些企业技术管理薄弱，产品质量很差；有些企业不正之风严重，甚至存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现象。企业经营管理差同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缺陷有关，但也还有其他原因。首先是“十年内乱”的影响。我国不少企业原来是管理得比较好的，在企业经营管理上我国也有自己独创的一些经验，如实行民主管理加强思想工作等等。但是“十年内乱”中企业管理受到了严重破坏，尤其是林彪“四人帮”散布种种谬论，从根本上否定企业经营的必要性，搅乱了思想，混淆了理论是非。彻底肃清其影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次是企业增加了大批新职工，他们缺乏企业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缺乏遵守社会化大生产



所要求的严格纪律的习惯和必要的生产知识和操作技能。再次是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要求。为了帮助企业提高经济效果，除了创造外部条件，如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改进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等等，还必须对企业进行全面整顿，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过去长时期内，由于我们重视新建，忽视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使得相当一部分企业设备老化，工艺落后，产品陈旧，技术力量薄弱。这也是我国经济效果差的一个原因。现在我国已经决定改变扩大再生产主要靠新建厂的做法。今后扩大再生产主要靠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有重点有步骤地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可以为发展轻工业打下比较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可以带动重工业的调整，促使重工业内部结构合理化，可以节约能源，可以改善我国企业的技术状况，这些都将是有益于经济效果的提高。吸取过去忽视经济效果的教训，现在技术改造要以提高经济效果为目标，并且要有一系列措施保证技术改造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有的同志会提出问题，为什么经营这几年的调整改革等工作，经济效果差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我认为，目前经济效果所以还比较差，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过去追求不切合实际的高速度留下的后遗症。

由于长期追求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导致产业结构很不合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妨碍经济效果的提高。要把这种后遗症完全改变过来，需要一个过程。

第二，对企业的关停并转抓得不够。

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那次调整，坚决关停了一批落后企业，对保留的企业，则认真地严格地进行了整顿。这样，就使得企业的经济效果迅速提高。这几年调整中关停并转不够有力，有许多消耗高、亏损大的企业继续打消耗战。

第三，对调整重工业的产品结构和服务方向抓得不够。

在经济调整时期，为了改善工业内部结构，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适当放慢一部分重工业增长速度是难以避免的和必要的。但是去年有些应该增产的行业也下降了，有些下降的幅度过大，因此也影响了经济效益。

第四，企业整顿工作抓得不够。因此，不少企业经营管理很差。



经过“十年内乱”，要使企业恢复和健全一套必要的经营管理制度，也需要有一个过程。

第五，体制改革的一些措施办法没有跟上。

近两三年来，我国体制改革方向对头，成绩很大，对于搞活经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有些具体措施和办法没有相应跟上。例如企业的经济责任制还不健全，妨碍经济效益的提高，有些企业职工福利补贴和奖金过多，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

第六，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方针提出来不久，贯彻这个方针并发挥作用也要有一个过程。

此外，有些企业政治思想工作薄弱，职工缺乏主人翁态度，也是经济效益差的原因。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我们要认真执行《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十条方针，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当前要着重抓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强和改进计划工作，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基本建设规模问题。1981年我国基本建设规模开始得到控制。今后几年，还要严格控制基本建设，同时要努力缩短建设周期，提高投资效果。按照现在的建设规模计算，如果工期缩短一年，就可以节约工资50亿元，为国家多创造利润税金50亿元，两者合计达100亿元。

第二，关停一批消耗高效益低的企业。

当前我国能源和重要原材料满足不了全国现有工业企业的需要，只有择优供应，腾出原料、燃料满足优质低消耗企业的需要，才能提高经济效益。这是一条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第三，整顿企业。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对企业进行全面整顿。

整顿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整顿完善经济责任制，目的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搞好企业经营管理，把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益，同他们承担的经济责任和实现的经济效果联系起来，使广大职工以主人翁的态度，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创造最好的经济效益。

第四，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要积极地同时又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改变一部分现有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的状况，为提高经济效果创造有利条件。

其他如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继续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提高



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等等，也都是很重要的。

提高经济效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只要大家共同努力，我们是一定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我国不仅过去有几段时间经济效果比较好，现在有些地区和企业的经济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例如，上海市的经济效果就比较好，1980年每百元资金提供的利润税金，上海市为74.3元，比天津市多1倍，比武汉市高2倍。浙江省这几年也取得了好成绩。首都钢铁公司由于推行权责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广大职工当家作主的积极性，经济效益十分显著。1981年在产量减少的情况下，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9.42%，上缴利润比上年增长8.8%，产值利润率由1980年的34.3%提高到38.2%，销售利润率由31.1%提高到33.7%，资金利润率由17.06%提高到17.86%，都是同行业的最好水平，有的技术经济指标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我们要开展学先进赶先进，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努力提高经济效果。



论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

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从 1981 ~ 2000 年，我国要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争取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我体会，这就是把提高经济效益和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都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我们要努力争取国民收入增长得快一点。本文准备谈谈这个问题。

国民收入能不能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

我们应该争取国民收入有怎样的增长速度呢？很多同志提出，应该争取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按照党的十二大规定的战略目标，20 年平均每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为 7.2%。据此，每年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应接近 7.2%。这个要求比较明确，而且是有根据的。提出这个要求，可以使广大职工了解提高经济效益的具体目标，防止单纯追求产值的偏向，动员大家为提高经济效益而努力。

但是，有些同志认为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不可能同步增长。他们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来说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必然慢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并从理论上证明目前要求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是不现实的。我认为，这些同志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先看看历史情况。建国以来，总的来看，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慢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但也有些年份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或者接近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如 1952 年国民收入和工农业

* 原载《湖南经济研究》1984 年第 2 期。



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分别为 22.3% 和 20.9%，1953 年分别为 14% 和 14.4%，1955 年分别为 6.4% 和 6.6%，1963 年分别为 10.7% 和 9.5%，1966 年分别为 17% 和 17.3%，1978 年都为 12.3%，1981 年分别为 4.8% 和 4.9%，1953~1978 年的 26 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国民收入为 6%，工农业总产值为 8.2%，两者之比为 0.73: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有所接近，两者之比为 0.86:1。

苏联近 20 年来，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是同步增长的。1976~1980 年累计和 1961~1965 年累计比较，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6.3% 和 6.2%，其中 1966~1970 年累计比 1961~1965 年累计分别增长 7.5% 和 7.3%，1971~1975 年累计比 1966~1970 年累计分别增长 6.4% 和 6.4%，1976~1980 年累计比 1971~1975 年累计分别增长 5% 和 5%。在东欧一些国家中，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接近同步。1955~1980 年平均，匈牙利分别为 5.4% 和 5.5%，罗马尼亚分别为 8.4% 和 8.5%，捷克斯洛伐克分别为 5% 和 5.4%。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慢于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但有几个时期也很接近。如民主德国 1971~1975 年平均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分别为 5.4% 和 5.9%，1976~1980 年分别为 4.1% 和 4.4%；保加利亚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速度 1971~1975 年分别为 7.9% 和 7.7%，1976~1980 年分别为 6.1% 和 5.8%。

西方国家没有我们工农业总产值这样的指标。它们用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包括服务业的价值，两者的差别在于国民生产总值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和间接税，而国民收入则不包括。它们服务业的价值增长很快，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工农业增加价值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如美国 1960~1970 年国民生产总值中服务业的比重由 33% 增加到 39%，而工农业则由 38% 减少为 33%，这就使它们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工农业增加价值的增长速度。据统计，1971~1978 年美国国民收入 and 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同步增长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前者为 3.18%，后者为 3.34%。1950~1978 年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还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两者之比为 1.012:1。除英国外的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期间也都表现出同样的发展趋势。



一些国家国民收入所以能和工农业总产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同步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工农业净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有上升的趋势，换言之，即工农业总产值中物质消耗部分的比重有下降的趋势。有些同志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工农业净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有下降的趋势。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由于机械化劳动取代手工劳动，工业产品中物质消耗的比重确曾有增加的趋势。如美国加工工业总产品中物质消耗的比重，在1849~1919年间从54.5%增加到60.4%。但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营管理的改善，这一比重虽然有一定的波动，但总的来说是有所下降。如1929年为55%，1939年为56.6%，1958年为56.5%，1965年为54%，1967年为53.9%，1970年为52.8%。^①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农业总产品中物质消耗的比重也不是只有上升而没有下降。美国农业总产品中物质消耗的比重1900年为20.9%，1950年为35.6%，1960年为43.2%，1971年为46.4%。^②这是上升的趋势。而日本1955~1968年农业部门劳动对象的费用（包括播种的种籽、肥料、农药、灌溉用水、机用燃料等）占产品成本的比重则是下降的趋势。如1955年为28.1%，1965年为24.1%，1966年为23.9%，1967年为23.3%，1968年为23.5%。14年内劳动对象费用的比重下降4.6%^③，可见这一时期农业净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也是增加了。有人计算，日本1954~1968年间，最终社会产品中，原料和辅助材料费用减少40.5%，固定资本费用增加42%，总起来，全部物质消耗费用减少30.7%。^④这也足以说明，这一期间日本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最终社会产品中，净产值的比重是增加的。

有些同志认为工农业总产值中净产值比重将是降低趋势。他们所持的理由，一是工农业的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二是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的比重会不断上升，农业的比重会不断下降，而工业的装备消耗比重高于农业。这两条理由也需要分析。

第一，工农业有机构成提高并不一定导致净产值比重下降。因为，有机构成提高和单位产品中物质消耗增加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生产

①② 《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册，第342~343、344页。

③④ 《日本经济效率问题》，第114、303页。



中占用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比例增加，后者是指单位产品所消耗的生产资料增加，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机构成提高并不一定使物质消耗的比重增加。这一点，上面列举的数字已足以证明。马克思也曾说过：“使不变资本量同可变资本相比相对增加的同时发展，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不变资本各要素的价值减少，从而使不变资本的价值不和它的物质量，就是说，不和同量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物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虽然不变资本的价值会不断增加。在个别情况下，不变资本各要素的量，甚至会在不变资本的价值保持不变或甚至下降的时候增加。”^①

还要指出，说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也不确切。资本主义虽然曾经存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但 20 世纪以来已出现了和这种趋势相反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价格的变动。如美国在 19 世纪，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本价值构成曾表现出持续增长趋势，而在 20 世纪则呈稳定状态，有时甚至呈下降趋势。美国加工工业中资本对工资之比是，1909 年为 4.12，1919 年为 3.26，1929 年为 3.67，1937 年为 3.51，1948 年为 2.49，1953 年为 2.36，1968 年为 2.45。美国主要物质生产部门中资本对工资的比重，20 年代以来也是下降趋势，1929 年为 4.06，1937 年为 4.15，1940 年为 4.06，1950 年为 3.41，1958 年为 3.61，1968 年为 3.6。^②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提到过：“当五个工人生产的商品为以前的十倍时，固定资本的支出并不因此为以前的十倍；虽然不变资本中这个部分的价值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但它远不是按同一比例增加。”“来自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部分，必然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少，因为就这些材料来说，这种生产率正好表现在：它们的价值已经下降。”^③

第二，工农业结构变动对工农业净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影响也比较复杂。我们建国 30 年来农业中物质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在 20.9% ~ 30.5% 之间，工业中物质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在 62.9% ~ 67.1% 之间。由于工业中物质消耗的比重比农业高得多，在其他条件不变，而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比重增加的情况下，诚然是不利于工农业净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尽管我国还存在工业比重增

^{①③} 《资本论》第三卷，第 262、290 页。

^② 《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册，第 387 ~ 388 页。



加的趋势，但是也要看到，并非任何年份工业的比重都要增加。从1978~1981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农业的比重基本上没有变化，1981年比1980年农业比重还有所上升，1982年农业的比重也是上升的。而且，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动也会影响上述两种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例如我国轻工业中物质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一般在64.1%~70.7%之间，重工业中物质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一般在59%~64.5%之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中重工业比重的增加将有利于工农业净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而今后我国也是存在重工业增长速度快于轻工业增长速度的趋势的。当然，也不能把这理解为任何年代重工业都要比轻工业增长得快。考虑到这里的复杂情况和其他情况，也不能说工农业比例的变化一定会妨碍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

前面说过，西方一些国家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同步增长的重要原因是服务业的价值增长很快。苏联近20年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也是由于商业等部门发展得比工业、农业快。苏联1960~1980年间国民收入中农业的比重由21%下降为15%，工业的比重由52%下降为51%，建筑业的比重由10%上升为11%，运输业的比重由5%上升为6%，商业的比重由12%上升为18%。因此，建筑业、运输业、商业等部门净产值的增长速度对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能否同步增长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我国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服务业等的发展趋势能否有利于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呢？有些同志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例如有的同志说：我国20世纪80年代面临能源资金缺乏的困难，这将使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只能有一个较低的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期望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有较高的发展速度是不现实的。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缺乏充分根据的。我国目前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服务业很不发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很不相称。在国民收入中，建筑业的比重1981年为3.9%，稍高于1952年的3.6%，低于1957年的5%；运输业的比重1981年为2.9%，低于1952年的4.3%；商业的比重1981年为7%，低于1952年的14.9%。和苏联相比，我国这些部门的比重也过低，和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就更低了。尽管我国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受工农业发展速度制约，但即使在



80年代,我国工农业也能维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使这些部门发展得更快一些,使它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有所增加。事实上,我国在发展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服务业方面有着不少有利条件。从这方面看,也有充分理由说,我国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怎样实现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

虽然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实现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又是相当困难的。因此,这几年虽然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接近了,但还未达到同步增长的要求。我们既要看到两者同步增长的可能性,又要充分估计这里的困难,努力设法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为此,要研究过去所以没有同步增长的原因,探索如何实现同步增长的途径。

从1953年到1982年,我国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1%,两者之比为0.74:1,没有实现同步增长。这里是有客观原因的。主要的客观原因,一是过去30年我们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原来经济发展水平低,农业比重大,伴随着工业化必然出现工业比重上升农业比重下降。1949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70%,工业占30%;1982年农业下降为32%,工业上升为68%。这在客观上是不利于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二是我国正处于手工劳动向机械化转变的过程中,随着工农业生产中有机构成的提高,单位产品中物质消耗比重有可能增加,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必然增加。马克思曾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要大于所增加的去劳动。”^①我国农业总产值中物质消耗的比重由1957年的20.9%增加到1980年的30.5%,工业总产值中物质消耗的比重由1957年的63.1%增加到1980年的65.4%,就反映了这种可能性甚至必然性,而这也是不利于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

^① 《资本论》第三卷,第290页。



产值的同步增长的。此外，我国原来文化技术水平低，经营管理基础差，也是导致国民收入没有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客观原因。

过去没有实现同步增长也有主观上的重要原因。一个长时期内，我国经济工作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盲目追求工业总产值速度而忽视经济效益的提高。主要表现为：不讲经济核算，导致财力物力人力的严重浪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再生产不能顺利进行；基建规模过大，忽视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妨碍技术进步；政治运动冲击经济建设，经济管理水平低，企业素质差；等等。这就使得有利于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因素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利的因素却日益增多。这种主观原因造成的消极后果，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尤为明显。

现在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利于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因素，但是也存在着极为有利的条件。最主要的有利条件和保证是，党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正在领导全国人民，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同时提出了实现这条新路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提出了本世纪内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我们要按照经济建设新路子的要求，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使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一些，以实现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

第一，努力减少物质消耗。

国民收入是总产值扣除物质消耗后的部分。在总产值既定的情况下，物质消耗少，国民收入就多，物质消耗多，国民收入就少。我国物质生产部门物耗比重过高是导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工业总产值中物耗的比重，1970年为62.9%，1975年为64.4%，1978年为65.4%，1982年为67.5%。1982年与1978年相比，由于物耗比重提高，使工业净产值减少约100多亿元。导致工业物耗比重高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消耗过多、浪费严重。因此，现在工业中减少物质消耗的潜力是很大的。我国农业总产值中物质消耗的比重也增加很快，1970年为24.9%，1980年提高到30.5%。这几年由于方针政策对头，农业经济效益提高较快。1982年农村人民公社总收入中，各项费用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39.8%下降为34.7%，平均每百元费用提供的纯收入由1978年的151.5元增加到



188.4元，增长24.4%。很多地方的经验表明，现在农业生产中节约物质消耗潜力也是很大的。建筑业、运输业、商业也要努力减少物质消耗。例如商业，1979~1982年我国社会商品零售额平均每年增长10%，商业净产值增长5.4%，两者增长速度之比为1:0.54，而1953~1978年两者增长速度之比为1:0.70。1979~1982年国家财政用于各种物价补贴超过1000亿元，占同期国民收入的7%。有些被补贴的部门不仅不增加国民收入，反而消耗其他部门的国民收入，因而不能不影响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克服当前一些地区、部门和企业普遍存在的严重浪费现象，减少社会总产品中的物质消耗部分，是加强国民收入的重要任务。

第二，进一步改善产业结构。

鉴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有重要影响，今后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时，应该认真考虑合理加快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要求。根据我国国情，一是要真正把农业作为战略重点。这几年我国农业发展很快，但要看到农业这个基础还很薄弱。按当年价格计算，1982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总产值只有882元，创造的净产值不到600元，主要农产品产量按人口平均，粮食约700斤，棉花约7斤，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只有40%。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也较差。历史表明，我国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对农业的依赖性很大，我们一定要以农业为基础，使工农业协调发展。二是要处理好工业内部结构。从今后长时期看，重工业仍需要优先增长，这也是有利于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但一定要处理好轻重工业的关系，在近期内力争轻工业发展得相对快一点，使轻重工业结构进一步合理。目前轻工业面临着重大的转变，就是要在产品的新、美、好、廉上下工夫，以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重工业要解决能源工业长期落后的问题，解决更好地为农业、轻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服务的问题。三是要在20世纪内使建筑业有个大发展。建筑业在西方曾经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我国有必要也有可能使它发展得更快些，使它创造的净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有较快的增加。四是使运输业有较快的发展。我国运输业一向是薄弱环节，运力的增长与社会生产建设的增长差距很大。党的十二大把大力加强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的建设作为战略重点，这样做，将从多方面加快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五是使商业服务业发展得更快些。我国国民收入中来自流通领域的部分增长缓慢，所占比重下降，这是影响国



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而且也是有条件改变这种状况的。现在我国服务业一般不计算国民收入，事实上有些服务业的劳动者是创造国民收入的。如何如实地反映他们的劳动成果，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

第三，充分利用劳动力。

我国劳动力富裕，只要充分、合理、有效地利用，是加快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极其有利的条件。现在劳动力利用上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工商企业中人浮于事、劳动力浪费的现象相当严重。这几年工业中安排了大量待业人员，加上调整过程中有些企业任务不饱满，使得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1978~1982年平均每年仅增长1.3%，低于前26年平均每年增长5.6%的水平。有人估计，现有工业企业中的工人一般只发挥了60%~70%的能力，至少有30%的劳动能力没有很好利用。这个估计不一定很准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把现有职工的劳动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将能使工农业净产值大幅度增长。利用劳动力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结合起来考虑，目前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在地区、企业之间差距很大，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是很低的。如水泥的全员劳动生产率，1974年联邦德国为2180吨，美国为2530吨，我国1981年只有245吨；煤炭生产人员效率，1977年苏联为3.88吨，我国统配煤矿1981年全员效率只有0.87吨。提高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既要求改善经营管理和进行技术改造，也要求重视智力开发，努力提高职工的文化和科技水平。城镇现有待业人员和新增加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另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时要避免单纯为了增加就业而妨碍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国民收入增长。我国农村中也有富裕的劳动力，如何把这些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也是争取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应该研究解决的问题。

第四，合理积累和充分利用资金。

资金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条件，对国民收入增长有重要影响。上面说的劳动就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资金问题，基本建设和现有企业技术改造也需要资金。过去长时期内积累率过高，今后应防止重犯这种错误，但是必须有一定的积累率同时有较好的积累效果，才能保证国民收入有合适的增长速度，使之与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我国1979~1982年平均每百元积累增加国民收入27元，高于前26年平均20元的



水平，但1978年以后一度有下降的趋势，1978年为34元，1979年为29元，1980年为29元，1981年23元，1982年为25元。必须进一步设法扭转这种下降趋势，提高积累效果。值得指出的是，当前要努力设法充分利用现有资金，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1982年全民所有制每百元资金提供的利润和税金为13.6元，比1978年的18.3元降低26%，比前26年平均的19.4元降低30%，主要原因是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经营管理不善，成本升高，亏损增加。1982年全民所有制企业亏损达190亿元，比1978年增亏75亿元。这些问题不解决，现有资金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难以积累更多的资金，从而将给国民收入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第五，提高产品加工深度。

提高产品加工深度是增加工业净产值的重要途径，既有利于充分利用原材料，又有利于充分利用劳动力。这方面我国潜力很大。以食品工业为例，1981年我国居民消费的食品中，经过食品工业加工的只占32%，而农业的初级产品占68%。经济发达国家则相反，食品主要来自食品工业，直接来自农业的初级农产品比例很小。如1972年美国居民消费的食品中，前者占92%，后者占8%，1975年日本居民消费的食品中，前者占82%，后者占18%。经济发达国家注意提高食品的加工深度，开展多层次加工和综合利用，这样既可以增加食品品种，又可以增加收入。日本生产方便食品的能力达到可供5000万人食用的规模，占全日本人口的43%。我国的面粉大部分没有进行多层次加工就消费了。1982年我国食用农产品与食品工业产值之比为1:1.6，1972年美国为1:3.5，1975年日本为1:2.4。我国提高食品工业的加工深度，将使食品工业的净产值比总产值增加得更快。我国纺织工业提高加工深度的潜力也很大，目前出口纺织品中原料和半成品占出口总额的63%，成品只占37%。棉布中坯布和漂白布占50%以上。如果提高加工深度，增加色泽布、针织内衣外衣和服装的出口，价格可以提高一半甚至几倍。我国重工业的加工深度也有必要和可能提高。如目前石油化工生产用油（包括合成纤维厂用油）仅占全部石油产量的1.4%，加上化肥生产用油也不过2.3%，而经济发达国家占6%~10%。我国烧原油每年近1000万吨，占原油产量的10%。如果减少烧油，用来发展石油化工，就可以增加效益，而在石油化学工业中发展精细化工产品，则经济价值



可以提高几十倍。

第六，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

如前所述，技术革命对于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影响比较复杂。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加快技术改造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要认真研究如何使技术改造有利于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我们要注意利用已有的科学技术成就，特别是注意利用当前“世界新的工业革命”的成就，来实现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要求。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技术改造首先应该有利于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现在不少企业由于生产设备陈旧使得能源和原材料大量浪费，把节约能源和原材料作为技术改造的重点，对加快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必要的。我国相当一部分产品技术标准低、性能落后、品种单调、样式陈旧，因而缺乏竞争力，缺少销路，有的甚至长期积压在仓库里。这也同技术落后有关。因此，技术改造也要把提高产品质量作为重点。技术改造可以分为节约资金型和节约劳动型，今后长时期内我国技术改造应该主要是节约资金型，这是符合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要求的。为此，我们要多采用先进的适用技术，建立既适应世界技术发展趋势又符合国情的技术结构，同时要在技术改造规划中，在技术改造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贯彻这个要求。

第七，提高企业素质。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层组织，争取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有赖于每个企业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当然，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益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效益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微观经济效益好未必就是宏观经济效益好。但是，没有企业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也就不会有整个国民经济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现在我国企业一般素质比较差，这是经济效益差的重要原因，我国企业素质差不仅表现在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上，而且表现在经营管理落后上，长期来我们重生产，轻经营管理，企业的基础工作薄弱，规章制度不健全，生产组织不合理，信息反馈能力、应变能力、竞争能力、发展能力都比较差，跑、冒、滴、漏相当严重。据1982年太原、石家庄、保定、辽阳、重庆、济南等城市对近800个亏损企业的调查，因企业管理混乱造成的亏损占76%。过去由于原材料和农副产品价格低，工资水平低，一些落后企业也能赚钱，



现在调整了一些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工资，很多赚钱企业不赚钱或者赚钱少了，企业素质差的问题日益暴露。随着国内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国际贸易日益发展，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企业素质，就难以迅速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

第八，加强和改进宏观经济管理。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这是我国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也决定了国家经济管理工作对于完成经济任务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实现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就是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和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关系，这涉及到一系列极其复杂的国民经济问题，要求大力加强和改进宏观经济管理。以上述处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技术结构等问题来说，就要求有关领导部门做好计划、组织、控制、监督等工作。提高企业素质也要求改革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同时要求领导部门改进领导方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现在国务院已经决定，从1984年起，我国将采用国民收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情况的一个综合指标。这是我国经济管理工作的一项重大改革。只要计划工作和其他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跟上去，我们在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是一定能够使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



再论国民收入和工农业 总产值的同步增长*

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能不能同步增长，是一个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对此一直有不同看法。最近，报刊上开展了这个问题的讨论。有的文章赞同这个提法，认为它“是促进我国宏观经济决策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重要一环”。^①有的文章认为这个提法“不很科学”，“今后20年实现同步增长很难做到”。^②读了这些文章很有启发，下面再谈谈我的不成熟的意见，向这些文章的作者和其他同志请教。

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意义

有些同志不赞成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提法，所持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认为我国今后20年不可能实现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二是认为没有必要提出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对于前一条理由，我准备在后面讨论，这里先谈谈后一条理由。

有的同志说：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并不总是符合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的，即使实现了同步增长，也未必一定提高了经济效

* 原载《经济与管理研究》1984年第3期。

① 张曙光：《试论国民收入与社会总产品、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载于《经济研究》1983年第10期。

② 郑家亨、杜铁章、李铁军：《从长期看我国难以做到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荀大志：《我国国民收入社会总产值近期很难实现同步增长》。均见《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益。他们举我国“一五”时期和“三五”时期的情形为例^①，认为“三五”时期要比“一五”时期更接近同步增长，但实际上“一五”时期的经济效益要好于“三五”时期。他们由此认为没有必要提出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要求。

我认为，这些同志似乎忽略了我们提出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背景和前提。大家知道，长时期来我国经济工作中存在着一种过分重视速度而忽视效益的倾向，这是经济效益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为了克服这种倾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今后要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经济的新路子，并提出要在“六五”时期争取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从这个背景看，我们提出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就是要求它们都要有一定的增长速度，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工农业总产值速度高而国民收入速度低，经济效益不好。

党的十二大规定了今后2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任务，按照这个规定，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应为7.2%。这个速度是不低的，同时又是可能的。要求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就是说国民收入也要争取达到相等于或接近于7.2%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要求国民收入达到这个速度就更不低了，因为1953~1982年我国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6%。由此可见，在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已经规定的前提下，提出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实际上也就规定了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有的同志提出要把国民收入增长率作为提高经济效益指标体系中的一个指标，却反对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提法，这在逻辑上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这个提法的背景和前提。

如果明确了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包含着对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要求，那就不会仅仅根据“三五”时期比“一五”时期两者更接近同步增长，得出“三五”时期经济效益比“一五”时期好的结论，而还要看一看这两个时期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事实上，“一五”时期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为8.9%，而“三五”时期只有8.3%，前者高于后者，只是“一五”时期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10.9%）比“三五”时期（9.6%）更高，才使得“一五”时期两者的差距比

^① 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同国民收入增长的比例，“一五”时期为1:0.82，“三五”时期为1:0.88。



“三五”时期更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应该全面理解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提法。这样做，也就不会从“一五”、“三五”时期经济效益的比较中得出否定这个提法的结论。也就是说，由于这个提法是以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都有较高的增长率为前提的，因此这个提法是符合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并能够反映客观经济效益提高的状况的。

争取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它要求工农业生产努力减少物质消耗，节约物化劳动。国民收入是社会总产值扣除物质消耗后的部分，在社会总产值既定的情况下，物质消耗少，国民收入就多，物质消耗多，国民收入就少。我国国民收入中，工业和农业提供的净产值加起来占85%以上。因此，在工农业生产中减少物质消耗，使它们提供的净产值增长得更快一些，对加快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有重要作用。现在，一些地区、部门和企业原材料和能源等使用上仍存在着严重浪费现象，工农业中节约物化劳动的潜力是很大的。应该看到，工农业净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或接近同步增长，将为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提供有利条件。如果工农业总产值有较快的增长速度而工农业净产值增长速度很慢，那么即使建筑业、运输业、商业等提供的。国民收入有较快的增长，实现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也会非常困难。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要求工农业净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或接近同步增长，实现了这个要求，就意味着工农业净产值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努力节约物质消耗则是其必要条件。

第二，它要求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意味着有比较合理的产业结构。因为，就工农业关系而言，由于农业总产值中净产值所占比重大于工业总产值中净产值所占比重，农业相对于工业增长得快一些将有利于工农业净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从而将有利于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当然，农业长时期快于工业是不可能的，但要使它保持一定的速度，不要过慢。这样才有利于工农业净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或接近同步增长。就轻重工业的关系而言，由于重工业总产值中净产值所占比重大于轻工业总产值中净产值所占比重，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增长得快一些将有利于工业净产值和工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从而将有利于国民收入和工农业



总产值的同步增长。当然，重工业也不能脱离轻工业片面发展，它的优先发展应该有合理的限度，保证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这样也才能使工业净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或接近同步增长。国民收入中还包括建筑业、运输业、商业等部门提供的净产值，实现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也要求这些部门和工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如果这些部门提供的净产值的增长速度快一些，那么即使工农业净产值增长速度低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也还是有可能实现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所以，争取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不仅要求农轻重之间有协调的比例关系，而且要求农业、工业和建筑业、运输业、商业之间有协调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要求有合理的产业结构。

第三，它要求有较好的积累效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增长率决定于积累率和积累效果。积累效果可以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或增加单位国民收入需要的积累来表示。假定积累率为29%，如果增加1元国民收入需要5元积累，那么国民收入增长率将为5.8%。如果积累效果提高了，增加1元国民收入只要4元积累，那么国民收入增长率将提高为7.25%。可见，积累率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越高；积累效果越好，国民收入增长率也越高。当前我国积累率不宜过高，提高积累率的余地较小，但是提高积累效果的潜力则很大。例如基本建设中浪费严重，工期拖长，造价大幅度提高，投资效果很差。我们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改善这种状况，而争取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提高积累效果和投资效果，是实现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条件。我们做到了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也就意味着积累效果和投资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

第四，它是实现生产、税利、财政收入同步增长的前提条件。我们知道，产品价值可以分为C、V、M三个部分，其中C是消耗的物化劳动，V是劳动报酬，M是剩余产品的价值。企业的税利相当于M，其中上交给国家的部分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只有净产值（V+M）和总产值（C+V+M）同步增长，才有可能在劳动报酬适当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生产和税利的同步增长，也才有可能在企业留利适当增加的情况下，实现税利和财政收入的同步增长。如果净产值的增长比总产值的增长慢得多，实现生产税利财政收入三者同步增长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或者只能在劳动报酬和企业留利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种同步



增长，或者根本不可能实现这种同步增长。最近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在安排今年工业生产时，明确要求生产、税利、财政收入三者要同步增长，这是非常必要的，实现这个目标，也就要求在工业中做到净产值和总产值同步增长。

有的同志不赞成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提法，认为应该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包括国民收入增长率、社会物质消耗率、积累效果等等，来全面反映经济效益的状况。我认为，全面反映经济效益确实不能单凭某一个或某几个指标，建立一套以国民收入为中心的经济效益指标体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建立这套指标体系同争取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并不矛盾。事实上，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这个提法是反映了这些同志提出的很多指标的要求的。建立这一套指标的必要性并不能否定争取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重要意义。鉴于以上分析，有的同志说这个提法“是促进我们宏观经济决策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重要一环”，“为我们提出了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正确途径”，我认为还是有足够的根据的。

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是可能的

有些同志认为，我国今后 20 年不可能实现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理由是：第一，今后我国资金有机构成将继续提高，在此情况下，物化劳动比活劳动增加更快，从而会使工农业总产值比国民收入增加得更快。这可以称之为资金有机构成变动的的原因。第二，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物耗比重高的工业将比物耗比重低的农业增加得快，这也会使国民收入的增长慢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这可以称之为产业结构变动的的原因。他们还提了其他理由，但是这两点是主要的，值得认真分析。

我们先看资金有机构成变动对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影响。不容否认，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工农业生产的资金有机构成是有提高的趋势的。但是，资金有机构成提高是否必然导致产品价值中物化劳动比重增加呢？不一定。因为，资金有机构成和产品价值构成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生产中占用的物



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比例，后者是指生产中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比例，它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有机构成提高可能导致产品价值中物化劳动比重增加，也可能导致物化劳动比重不变甚至减少。例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由于机械化劳动取代手工劳动，工业产品中物质消耗的比重确实曾有过增加的趋势，但后来情况就变化了。美国在1947年以后，英国在1958年以后，联邦德国在1960年以后都呈现出物质消耗比例降低的趋势。它们的详细情况如下：^①

表 1 美国加工工业产品中物质消耗所占的比重 (%)

年 份	比 重
1929	55.1
1947	60.2
1954	58.2
1958	56.2
1963	54.2
1967	52.9
1972	53.8

表 2 英国、联邦德国工业总产值中物质消耗所占的比重 (%)

年 份	英 国		年 份	联 邦 德 国	
	全部工业	加工工业		全部工业	加工工业
1935	54	58	1950	51	62.7
1948	58	65	1955	—	63.5
1958	59	62	1960	61	62.0
1963	55	58	1964	59	60.0

在日本加工工业中，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段时期内，物质消耗在产品价值中所占比重实际上是稳定的，1950年占68.2%，1955年占68%，1960年占68.4%，1961年占68%。^②

农业产品中物质消耗的比重也不是只有上升而没有下降。美国农业总产品中物质消耗的比重1900年为20.9%，1950年为35.6%，1960年为43.2%，1971年为46.4%。^③这是急剧上升的。而日本1955~1968年农业部门劳动对象（包括播种的种籽、肥料、农药、灌溉用水、机用燃料等）的费用占产品成本的比重则是下降的趋势。如1955年为

①② 《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再生产比例》，第194~195页。

③ 《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册，第344页。



28.1%，1965年为24.1%，1966年为23.9%，1967年为23.3%，1968年为23.5%。14年内劳动对象费用的比重下降4.6%。^①

马克思曾把商品价值中物化劳动比重的增加看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直接表现，但他也曾预见到，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物化劳动的比重也有可能减少。他曾指出：“使不变资本量同可变资本相比相对增加的同一发展，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会使不变资本各要素的价值减少，从而使不变资本的价值不和它的物质量，就是说，不和同量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物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虽然不变资本的价值会不断增加。在个别情况下，不变资本各要素的量，甚至会在不变资本的价值保持不变或甚至下降的时候增加。”^②他还说过：“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原料的价值会在商品产品的价值中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原料会全部加入商品产品的价值，而且因为在总产品的每一部分中，由机器磨损形成的部分和由新的追加劳动形成的部分会越来越来。由于这种下降运动，另一个由原料形成的价值部分就相应地增长起来，除非由于制造原料本身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的提高，使原料价值相应减少，以致这种增长被抵销。”^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抵销作用，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其实，工农业中资金有机构成也不是不断提高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存在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但20世纪以来已出现了和这种趋势相反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价格的变动。如美国在19世纪，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本价值构成曾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在20世纪则呈稳定状态，有时甚至呈下降趋势。美国加工工业中资本对工资之比是：1879年为2.38，1889年为2.51，1899年为3.62，1909年为4.12，1919年为3.26，1929年为3.67，1937年为3.51，1948年为2.49，1953年为2.36，1968年为2.45。美国主要物质生产部门中资本对工资的比重，20年代以来也是下降趋势，1929年为4.06，1937年为4.15，1940年为4.06，1950年为3.41，1958年为3.61，1968年为3.6。^④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提到过：“当五个工人生产的

① 《日本经济效率问题》，第114页。

②③ 《资本论》第三卷，第125、262页。

④ 《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册，第387~388页。



商品为以前的十倍时，固定资本的支出并不因此为以前的十倍；虽然不变资本中这个部分的价值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但它远不是按同一比例增加”；“来自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部分，必然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少，因为就这些材料来说，这种生产率正好表现在：它们的价值已经下降。”^①

有人会说，以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现象，未必会在我国现阶段出现。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绝对了。这些现象至少表明，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并不必然导致产品价值中物耗比重的提高。就工业而言，既然欧美日本很多国家从20世纪40、50年代或50、60年代就出现产品价值中物化劳动比重下降的现象，现在我国工业生产力状况和它们那时的状况很多是相仿的，因此出现类似现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里还要注意以下情况，一是当代科学技术进步使得有更大的可能性多采用节约物化劳动的技术；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巨大的优越性，而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现在工业生产中节约物化劳动的潜力很大。所以，工业中我们实现净产值和总产值同步增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农业而言，由于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很低，在现代化过程中，资金有机构成提高和产品价值中物耗比重增加的可能性更不可低估。但是，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已展现了一条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它更多地利用生物科学的成就，包括利用遗传工程、生物固氮、生长调节剂、生物防治、无翻耕法等等，有可能既大量增加生产，又节约物化劳动的投入。特别是我国农业有精耕细作的传统，加上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农业的优越性日益发挥出来。因此，今后我国农业实现净产值和总产值同步增长或接近同步增长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至少我们可以争取农业净产值的增长速度不比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低得太多。

现在来看农业结构变动对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影响。正如有些同志所说，从我国今后长时期看，工业将比农业增长得更快。目前我国农业中净产值占总产值的70%，工业中净产值占总产值的30%。由于工业比农业增长得快，即使农业净产值和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工业净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同步增长，工农业净产值的增长速度

^① 《资本论》第三卷，第290页。



也将慢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这种不利于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影响，我们是必须看到的。但是，由此也不能得出结论，说国民收入不可能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我认为，以上只是产业结构变动所引起影响的一个方面，而从产业结构变动的全部影响看，实现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里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产业结构的变动并不仅仅是工业比重增加农业比重减少。就工农业比重说，我们也可以通过计划安排，根据需求和可能，使农业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和工业增长保持合理的对比关系，不使它们的速度相差过大，从而使这方面结构变动对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有可能从别的方面的有利影响得到弥补。

第二，轻重工业比重的变化也是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方面，而其变化趋势是有利于工农业净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从而有利于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目前我国重工业中净产值约占总产值的 35% ~ 40%，轻工业中净产值约占总产值的 30% ~ 35%。1982 年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 50.2%，重工业占 49.8%。今后一段时期内重工业将比轻工业增长得更快一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重工业优先增长的趋势是有利于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这将可能弥补前面说过的那些不利影响。当然，我们不能由于重工业优先增长有利于同步增长，就盲目地加快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必须规定得合理。但今后一定时期内重工业优先增长的趋势是不能否认的，也不能否认这是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有利条件。

第三，今后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将有较快的增长，它们会比工农业发展得更快，这是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非常有利的条件。长时期来，我国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发展较慢，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是过去国民收入不能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1982 年我国国民收入中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所占比重分别为 4.6%、3.1%、5.5%，而 1957 年分别为 5%、4.3%、15.6%，三者的比重都下降了，商业的比重下降尤多。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国民收入中建筑业、运输业、商业的比重更显得过低，如 1980 年苏联国民收入中建筑业的比重为



11%，运输业为6%，商业为18%。现在大家都同意我国建筑业、运输业应该更快地发展，提高它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而对于商业，有些同志强调它受直接生产物质产品部门的限制，认为不能更快地发展。事实上，现在商业不发达不仅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而且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我们也有必要和可能使商业发展得更快一些，例如使它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步提高到“一五”时期的水平。如果我们使建筑业、运输业、商业的发展速度比工农业更快一些，较多地提高它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也将能抵补上面说过的那些不利于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的影响，有利于同步增长。

一些其他国家的情况也说明现代化过程中实现这种同步增长是可能的。例如苏联近20年来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就是同步增长的。苏联1976~1980年累计和1961~1965年累计比较，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6.3%和6.2%，其中1966~1970年累计比1961~1965年累计分别增长7.5%和7.3%，1971~1975年累计比1966~1970年累计分别增长6.4%和6.4%，1976~1980年累计比1971~1975年累计分别增长5%和5%。有的同志说，苏联虽然实现了同步增长，但是经济效益并不理想。这话有道理。苏联经济效益不理想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都是下降趋势，而我们要求的同步增长则是以较高的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为前提的。实现了这个要求，我国的经济效益将比过去有很大的提高。

对于其他一些否定同步增长提法的理由，也要稍作分析。

例如，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国现行价格体系很不合理，今后要适当提高原材料工业和能源工业产品价格，这会使物耗比重上升，不利于同步增长。其实，提高原材料和能源工业产品的价格，首先将减少这些产品中物耗的比重，说它的影响只是使物耗比重上升，是并不全面的。而且，正如有的同志所建议的，调整价格引起的问题可以用不变价格来解决。

再有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产品的加工深度将要不断提高，相应地社会产品中物质消耗的比重就要相对上升，也不利于同步增长。我认为，提高产品的加工深度将使我国充裕的劳动力得到更加充分合理的利用，这将加快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在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既定的条件下，这样做不是不利于而是有利于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



长的。

再有一种说法，认为在专业化协作发展中有可能增加工业总产值重复计算的次数，扩大国民收入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差距。这种说法也要斟酌。我们发展专业化协作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如果专业化协作的结果仅仅是或主要是增加工业总产值重复计算的次数，那确是会扩大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差距的。但这是违背我们发展专业化协作的原则的。如果专业化协作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这才是我们需要发展的专业化协作），其结果，就不是扩大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差距，而是有利于它们的同步增长了，至于统计方法的问题，那是完全可以改进的。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国现行的固定资产折旧率过低，今后应当提高折旧率，这也会使物耗上升，不能实现同步增长。我认为，从表面看，提高折旧率是会使物耗上升的，但既然这是由于过去折旧率太低，实际上，那就不是现在提高折旧率增加了物耗，而是过去把老本当做收入，现在纠正了这个错误。其实，这里的问题通过正确的换算也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在折旧率规定得合理以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今后 20 年我国实现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是可能的。说可能，当然不是说没有困难。应该说，从主客观看，困难是很多的。这也正是迄今我们还未实现同步增长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由于困难而否定同步增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要在正视困难的同时，认真研究克服困难和实现同步增长的办法。



税利要和生产同步增长*

党的十二大制定了 20 世纪内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要求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现在我们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是不算低的，经济效益也在不断改善。但是，经济效益的状况还不理想，一个重要问题是企业上缴税利没有和生产同步增长，因而使得财政收入不能和生产同步增长。从 1979 年到 1982 年，平均每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7.3%，国民收入增长 6.3%，但财政收入（不包括国内外借款）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平均递减 1.9%。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提出税利和生产同步增长是非常必要的。

税利增长速度和生产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是我们评价经济效益的重要标志。除了一些特殊行业和特殊情况，一般来说，工业企业实现的利润和上缴的税利起码应该和生产同步增长，甚至还应该超过生产的增长。商业企业实现的利润和上缴的税利起码应该和流通同步增长。甚至应该超过流通的增长。而且这应该在更好为消费者和顾客服务的情况下做到，即不应该以损害消费者和顾客的利益来增加盈利，这是提高经济效益的要求，也是经济效益提高的标志。

首先，税利和生产同步增长意味着努力降低物质消耗，使净产值和总产值同步增长。国务院领导同志早就指出：“六五”期间，要求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等于或接近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做到这一点要从多方面努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企业的净产值应相等于或接近于总产值的增长，企业上缴税利和生产同步增长是以做到净产值和总产值的同步增长为前提的。我们知道，商品价值可以分为 C、V、M 三个部

* 原载《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1984 年第 1 期。



分。其中 C 是消耗的物化劳动， V 是劳动报酬， M 是剩余产品的价值。企业上缴的税利是 M 中的一部分。只有净产值 ($V + M$) 的增长速度和总产值 ($C + V + M$) 的增长速度同步增长，才有可能在不影响劳动报酬和企业留利适当增长的情况下，使上缴税利和生产同步增长。换言之，如果净产值没有和总产值同步增长，也就较难实现税利和生产同步增长的要求。前几年工业税利没有和生产同步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工业总产值中物质消耗比重增加，工业净产值的比重慢于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1978 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物质消耗的比重为 65.4%，1982 年提高到 67.5%，按当年价格计算，1982 年比 1978 年工业总产值增长 35.4%，工业净产值仅增长 27.3%。不少商业企业也是由于消耗过多而使实现利润和上缴税利不能和流通同步增长。

其次，税利和生产同步增长意味着正确处理企业和职工的关系，使职工平均收入增长的幅度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在净产值和总产值同步增长的前提下，还要处理好 V 和 M 的关系，才能使实现利润和上缴税利同生产同步增长。这也就是要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积累。而如恩格斯所说：“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① 如果 V 的增长速度过快，即使 $V + M$ 和 $C + V + M$ 同步增长，也可能导致税利增长速度慢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因此，实现税利和生产同步增长，还要求处理好净产值在 V 和 M 之间的分配问题，实行“职工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只能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这个基本原则。1979 ~ 1982 年我国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3.6%，而居民消费水平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7.2%，居民消费水平增加得远远超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虽然有偿还过去欠债的合理的因素，也有滥发奖金之类的不合理因素。这也是企业上缴税利低于生产增长速度的重要原因。现在滥发奖金等现象仍然存在，据统计，1983 年 1 ~ 8 月人民银行对全民所有制单位和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支付的奖金比 1982 年 1 ~ 8 月增长 16.7%，远远超过劳动生产率和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人民银行支付的奖金仅仅占实发奖金的 70% ~ 80%，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233、350 页。



另外还有 20% ~ 30% 的奖金是坐支或发实物奖。有些企业承包基数太低，职工个人收入增加过多。实现利税和生产同步增长是要以克服这些不合理现象为前提的。

再次，税利和生产同步增长还意味着正确处理企业上缴税利和留利的关系，贯彻新增利润中国家得大头的原则。事情很清楚，即使 M 与 $C + V + M$ 同步增长，但如果 M 中企业留利过多，上缴国家的部分过少，也仍难以保证企业上缴税利与生产同步增长。这几年上缴税利落后于生产的增长速度，除由于物质消耗过多、工资奖金福利过多等因素使得 M 减少外，也由于 M 中企业留利过多，影响上缴利润税收的增长。据初步统计，1982 年与 1981 年相比，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总产值增长 7.1%，净产值增长 4.2%，职工工资增长 5.8%，职工劳动福利增长 14.1%，企业留利增长 17.4%，上缴税利增长 1.5%。在工业净产值中，企业留利所占比重增加了，加上职工收入比重增加，企业上缴税利的比重因而下降了。需要指出，一部分职工收入也是来自企业留利，这就说明，企业留利过多也是这几年上缴税利没有和生产同步增长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国务院领导同志说：“我们对企业不能再回到过去统收统支的老路上去。但是，企业新增加的利润中，必须主要通过税收和规定合理的税后利润留交比例的办法，保证国家得大头。”实现税利和生产同步增长，也就意味着做到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提出和贯彻税利和生产同步增长的要求，将从多方面促进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现在一些部门、地区和企业仍存在着盲目追求总产值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效益提高的偏向，这可以说是经济工作中的一种顽症。明确要求税利和生产同步增长，将是治愈这种顽症的一帖良药。

那么实现税利和生产同步增长是否可能呢？有的同志怀疑这种可能性。他们的理由是，随着经济发展，生产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产品中物化劳动的比重会增加，从而净产值比重将减少，因而不可能使上缴税利和生产同步增长。他们还引用马克思关于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商品价值中物化劳动比重将增加的论述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按照这些同志的看法，我们提出税利和生产同步增长就没有理论根据。但是这些同志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情况，就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商品价值



中物化劳动部分的比重增加，活劳动部分的比重减少。马克思分析这种情况时，曾把商品价值中物化劳动比重的增加看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直接表现。例如马克思说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要大于所增加的过去的劳动。”^①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惟一可能的情况。很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品价值中物化劳动部分的比重也可以呈减少的趋势。这种减少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等国家可以明显看出来。美国加工工业中按现行价格计算的物资消耗比重的动态是：1929年为55.1%，1947年为60.2%，1958年为56.8%，1963年为54.2%，1967年为52.9%。1947~1967年间物化劳动的比重下降7.3%；英国加工工业产品中物质消耗的比重，1948年占65%，1963年占58%；联邦德国加工工业产品中物质消耗的比重，1955年占63.5%，1967年占60%，也都是下降趋势；日本加工工业中物质消耗的比重一度是稳定的趋势，如1950年占68.2%，1955年占68%，1960年占68.4%，1961年占68%。^②

在劳动生产率增加的情况下，商品价值中物化劳动比重所以呈不同的趋势，是同技术进步的性质和作用不同有关的。技术进步可以分为主要节约活劳动、主要节约资金和节约活劳动与资金并重三种类型。主要节约活劳动的技术进步，一般会导致商品价值中物化劳动比重增加的趋势；主要节约资金的技术进步和节约活劳动与节约资金并重的技术进步，则一般导致商品价值中物化劳动比重趋于下降或趋于稳定。马克思也曾指出过商品价值中物化劳动比重保持不变或趋于下降的可能性。他说：“总之，使不变资本量同可变资本量相比相对增加的同一发展，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会使不变资本各要素的价值减少，从而使不变资本的价值不和它的物质量，就是说，不和同量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物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虽然不变资本的价值会不断增加。在个别情况下，不变资本各要素的量，甚至会在不变资本的价值保持不变或甚至下降的时候增加。”^③这就表明，有人说随着经济发展商品价值中物化劳动比重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这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应该看到，现代技术

①③ 《资本论》第三卷，第29、262页。

② 《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再生产证例》，第194~195页。



进步越来越有可能做到更多地节约资金或者使节约资金与节约活劳动并重，这也正是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工业生产中物化劳动比重趋于下降或稳定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使得马克思在世时的个别情况成了一种可能普遍出现的情况。还要看到，我们进行技术改造的指导思想就是技术进步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从我国国情出发，更要重视节约资金包括节约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

我们还应该把有机构成变动的趋势和商品价值中物化劳动变动的趋势区分开来。前者反映生产中占用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比例关系，后者反映产品中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比例关系，它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在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即使单位产品中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的比重增加了，但如果原材料费用减少得更多，产品中物化劳动的比重仍有可能减少，净产值的比重因此仍会增加。例如日本1954~1968年间有机构成是提高的，单位最终社会产品中固定资产费用由10%增加为14.2%，但原料和辅助材料费用由31.6%减少为18.8%，物化劳动消耗加起来由41.6%减少为33%。活劳动创造的净产值相应地由58.4%增加为67%。^①日本这一时期经济效益的提高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原因，一是科学技术进步，二是经营管理改善。这就说明，即使在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只要善于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并不断改进经营管理，也是完全有可能提高生产中净产值的比重的。

对于有机构成变化的趋势也要进行分析。因为如上所说，技术进步对有机构成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有人计算，美国加工工业中资本对工资之比，1879年为2.38，1889年为2.51，1899年为3.62，1909年为4.12，1919年为3.26，1929年为3.67，1939年为3.51，1948年为2.49，1953年为2.36，1968年为2.45。20世纪以来是下降趋势。^②我国目前还处于手工劳动向机械化劳动转变的过程中，有些行业的有机构成是有提高的趋势的。但是，现代技术进步也有延缓这种趋势的作用甚至相反的作用，加上我们将注意采用先进的适用技术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故此，也没有理由说，产品中物化劳动的比重必然增加，税利和生产一定不能同步增长。

^① 《日本经济效率问题》，第303页。

^② 《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册，第387~388页。



从我国历史看,30年来财政收入和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很相近的。1953~1982年间财政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2%,国民收入为6%。分时期看,“一五”时期财政收入中有债务收入,故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多。“二五”时期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国民收入下降,故而财政收入几乎没有增加。“三五”、“四五”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1%以上。“五五”时期两者速度又比较接近。1953~1982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1%,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较多,因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虽然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相近,却低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今后我们力争国民收入和工农业生产同步增长,这样经过努力,也就有可能做到财政收入和工农业生产同步增长。

需要强调指出,我国增加税利的潜力是很大的。这是实现税利和生产同步增长的极为有利的条件。

例如,工业中物耗过多,浪费严重,使净产值增长快一点的潜力很大。我国每百元工业净产值的能耗比国外经济发达国家高得多,据估计,我国目前能源利用率约为30%左右,而日本达到57%,美国为51%,联邦德国、苏联等国家也在40%以上。1982年我国机械工业重点企业的钢材利用率只有65.4%,铸铁件废品率达8.6%,铸钢件废品率达5.1%,低于历史较好水平。发电厂的线路损失和厂自用电率15%,比经济发达国家高出1%~5%。据12个工交部门51项耗能指标统计,1983年上半年与1982年同期相比,能耗下降的20项,占39%;持平的14项,占28%;上升的17项,占32%。另据对75项质量指标统计,质量提高的20项,占27%;持平的37项,占49%;下降的18项,占24%。改变消耗增加、质量下降的局面,就可以使净产值较快地增长。

又如,商业部门减少流通费用的可能性也很大。原商业部系统的商业企业每百元销售额的费用,1979年为8.1元,1982年为9.01元,增加11.2%;外贸企业的费用水平1979年为7.7元,1982年上升为8.6元,增加11.7%。1979~1982年我国商品零售额平均每年增长10%,商业净产值增长5.4%,两者速度之比为1:0.54,而1953~1978年的26年间则为1:0.7,苏联1961~1980年的20年间为1:1.21。我国商业增加净产值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又如，从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税利上的悬殊状况也可以看到巨大潜力。在同类型城市之间，相同条件的部门之间，同一部门的企业之间，经济效益十分悬殊。据七个 2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的资料，1982 年每百元资金提供的税利，最多的上海达 73.4 元，而最少的城市只有 15.4 元，前者为后者的 4.76 倍；每一职工提供的税利，最多的上海为 8 167 元，最少的城市为 1 934 元，前者为后者的 4.22 倍。这里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但是效益高低很大程度上是同经营管理水平有关的，因而通过努力是可以把潜力挖掘出来的。而且，经济效益差的地区、部门和企业固然有潜力可挖，经济效益好的地区部门和企业也同样是有潜力可挖的。

再如，我国现在有不少亏损企业，只要做好扭亏增盈工作，也能加快税利的增长。1982 年全国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达 20.8%，比 1978 年扩大 1.5%，亏损金额达 47.6 亿元，比 1978 年增加 13.1%。企业亏损除客观原因外，主要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据太原、石家庄、保定、辽阳、重庆、济南等城市对近 800 个亏损企业的调查，因企业管理混乱造成的亏损占 76%。1979、1980 年对扭亏增盈工作抓得比较紧，企业亏损逐步减少，近两年不少地区部门对扭亏工作有所放松，以致企业亏损逐年回升。这说明只要抓紧这项工作，就可以取得成绩。

再如，现在存在着利润转移、财力分散的现象，也存在着浪费基金失控的现象，这些现象在有些地区和部门还比较严重，有必要也有可能采取措施加以克服。而克服这些现象，也能使企业上缴税利增长得更快些，有利于税利和生产同步增长。

当然，实现利税和生产同步增长也是有很多困难的，我们要足够重视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但是，只要真正在思想上认识这项任务的重大意义，坚决贯彻经济工作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方针和措施，这项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现在不少地区、部门和企业已经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产流通同步增长的要求。据 1983 年前 10 个月统计，已有山西、内蒙古、吉林、山东、湖南、广东、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 13 个省区的工业利税增长速度超过产值增长速度，这些省区工业产值比 1982 年同期增长 6.7% 到 22%，而实现利税则增长 7% 到 59.7%，有些政策性亏损企业由于经营管理好也做到了转亏为盈，如河北省南皮县粮食部门所属企业由于购销粮食价格倒挂，属于政策性亏损



企业，过去每年亏损近百万元，1983年努力把经营搞活，1~9月已盈利180万元。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已把扭亏增盈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并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我们要坚决贯彻这些措施，争取及早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税利和生产同步增长。



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

提高经济效益是经济发展中的根本问题。针对我国当前的情况，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把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为了使经济效益迅速提高，下面谈几个问题。

正视我国经济效益差的现状

对于我国经济效益的现状，曾经有过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把经济效益和产值增长速度（特别是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等同起来，认为产值增长速度快就是经济效益好。这是不正确的。经济效益指的是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经济效益和产值增长速度虽有联系，但却是不同的范畴，绝不能等同起来。否则就难以避免做出错误的判断，看不清甚至掩盖当前经济效益下降的严重情况。

我国从1978年改革以来，一段时期内经济效益是有所提高的，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逆转。从许多材料看，1985年以后，关于经济效益的一些重要指标不仅没有提高，而且还下降了。据国家统计局材料，1984~1988年各年度国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分别为24.2%，23.8%，20.7%，20.3%，20.63%；产值利税率分别为23.2%，23.6%，22.3%，22.6%，17.84%；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分别为-2%，-7.7%，-7.3%，-7%，-15.59%。这些经济效益指标均呈下降趋势。

^{*}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90年1月12日。



经济效益下降还表现在企业亏损的增加上。1984~1987年各年度,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面分别为10.7%,10.8%,13.1%,14.1%,亏损企业亏损额分别为34.24亿元,40.52亿元,72.42亿元,84.68亿元。据估计1988年亏损企业亏损额又比1987年增加38.1%,达116亿元。

我国生产部门物质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也是增高的趋势。各个物质生产部门合计,“五五”时期、“六五”时期和1986、1987、1988年物质消耗占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56.1%,57.3%,58.6%,59.4%,60.6%;其中农业部门分别为28.4%,30.5%,32.2%,32.5%,34.9%,工业部门分别为65.4%,66.9%,68.1%,69.1%,70.2%。这种比重增高的现象,虽然同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经济效益下降的结果。

我们早就明确经济建设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所以,不能说我们对于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性完全没有认识。但是,在经济建设的实际工作中,乃至在宣传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中,并没有很好做到(至少是没有始终做到)把经济效益问题放在中心地位上,对提高经济效益的意义缺乏应有的认识。例如,在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尽管应该把效益作为速度的前提,但实际上常常是重视速度而忽视效益。又如,在改革和效益的关系上,尽管改革应该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但不仅有些改革未能提高效益,而且理论上对于改革必须提高经济效益也不是非常明确,有时是为改革而改革。再如,前些时候关于通货膨胀、经济过热、比例失调等问题的讨论中,很多文章提出了种种原因,却忽视了经济效益下降这一重要原因;提出了种种措施,却忽视了提高经济效益这一关键措施。要扭转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首先就要使全党上下都真正认识到提高经济效益的极端重要性。

正确分析影响经济效益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

在分析影响经济效益的因素时,应该看到,我国经济效益为什么低和近些年经济效益为什么下降,这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问题。人们常说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比例失调、技术水平低、管理落后是经济效益差



的重要原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些原因并不能说明（至少不能充分说明）经济效益为什么下降。经济效益差是指的一个时点上经济效益的状况，经济效益下降则是指经济效益在前后不同的时点上的动态变化状况。经济效益下降常常是由于影响经济效益的一些主要因素，不仅没有改进而且趋于恶化，例如产业结构更加不合理、比例关系更加失调、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下降，等等。

在分析经济效益的动态变化时，还应分清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这里我把自然条件、生产力状况、产业结构、经济体制、管理水平等称之为客观因素；把经济发展战略、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人的主动性、积极性等称之为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变动都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导致经济效益提高，一种是导致经济效益下降。需要指出的是，客观因素不仅变化较慢，而且它的变动方向和速度常常与主观因素有关。我国近些年来经济效益出现下降现象，主要就是由于在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存在着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从而导致经济过热，比例失调，经济秩序混乱，管理水平下降。所以，经济效益变动固然是主客观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中主观因素，尤其是战略指导思想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今后，我国经济效益的变动趋势如何呢？从一些主要因素及其影响来看，我认为今后经济效益是完全能够提高的。主要根据是：（1）经过十年改革，企业活力增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增加了；（2）很多企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了；（3）现在进一步明确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急于求成的思想将得到克服，并能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4）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也将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5）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都很大，只要主观上努力，脚踏实地地搞好工作，经济效益将会逐步地、不断地提高。当然也要看到，阻碍经济效益提高的不利因素也不少，如果工作搞得不好，经济效益继续下降仍然是可能的。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主观的努力。

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

为了切实提高经济效益，我们要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



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中的各项措施，并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建国以来我们多次盲目追求过高的速度（主要是追求过高的工业增长速度），这样必然导致以下后果：（1）工业挤农业，工农业比例失调，工业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也比例失调；（2）工业内部互相挤压，或者重工业挤轻工业，或者加工工业挤原材料工业和采掘工业，工业内部也比例失调；（3）基本建设挤生产维修，新建企业挤原有企业，技术改造受阻，技术进步缓慢；（4）经济过热，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出现国民收入超分配和积累消费互相挤压等现象；（5）企业忙于完成产值指标，企业管理不受重视，有关的政府部门也因忙于追求速度而忽视宏观管理；（6）速度过高后被迫进行调整，“大上”往往带来“大下”。这些后果的集中表现就是经济效益下降。要认真吸取4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这个重要经验教训，今后我们必须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正确方针。

第二，正确处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为了克服通货膨胀严重、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秩序混乱等困难，必须坚决进行治理整顿。搞好治理整顿，显然也是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而且提高经济效益本身也是治理整顿的一个目标。在集中力量进行治理整顿期间，改革要围绕着治理整顿来进行，并为它服务。但治理整顿绝不意味着改革停顿不前，更不是“不要改革”和“旧体制复归”。治理整顿不仅将为改革的深入和健康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而且它本身也需要改革的配合。当前有必要也有可能在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财政包干体制、金融体制、外贸承包制、物资管理体制、计划体制以及宏观调控等方面继续深化和完善改革。这样处理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将能尽快扭转经济效益下降的局面，使经济效益逐步提高起来。

第三，加快科技进步的步伐。依靠科学技术可以带来劳动时间的节约，可以有效地利用生产设备，可以提高能源和原材料的利用效率，可以提高产品质量。可见，科技进步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巨大源泉，我国在这方面更是大有潜力的。因此，必须把促进科技进步放到极其重要的地位上来。要选择一批投入少、效益高的科技成果，集中技术力量和科研



经费，大力推广。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选择一批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传统产业技术改造项目、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项目、高技术产品、出口产品及进口替代产品项目，组织大中型企业和科研机构进行技术攻关，尽快形成生产力。要重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技术改造的资金要保证真正用于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节约物质消耗，促进产品更新换代。要加快引进设备的国产化，发展高技术产业。还要发展和完善科技市场，加快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

第四，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还要处理好企业经济效益和整个国民经济效益的关系。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益的基础，而要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既要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又要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而且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于管理水平的提高。现在企业经营管理问题很多，管理混乱、纪律松弛现象相当普遍。有些同志还认为，改革会自然而然地提高管理水平，不少企业存在着“以改代管”、“以包代管”的现象。事实上，改革虽可以为改进管理提供有利条件和强大动力，但绝不能代替管理，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管理水平的提高。为了提高管理水平，必须把深化改革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要下决心和花大气力加强和改进企业的劳动管理、物资管理、资金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以及其他各项基础工作，严格工艺规程和劳动纪律，扎扎实实地开展“双增双节”运动和扭亏增盈工作。还要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坚持实行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就能真正做到从节约中求增产，向经营管理要效益，把企业的潜力充分发掘出来。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效益*

最近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九五”时期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全会强调指出，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转变经济体制；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于转变经济体制，人们是比较熟悉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则是新提出的问题。下面我谈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

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现在流行种种说法：粗放型和集约型，外延型和内涵型，速度型和效益型，数量型和质量型。这些说法揭示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某些特征，但是并未回答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

我同意这种说法，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用的方式方法。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例如，以劳动、资本、土地三项生产要素来说，它们如何搭配，是多用些劳动，还是多用些资本，还是多用些土地，是大可研究的。在农业上，一定量的劳动和资本可以用在较广大的土地上广种薄收，也可以用在较小面积土地上精耕细作，前者通常称为农业上的粗放经营，后者称为集约经营。在工业上，一定量的劳动和资本可以用来建设新的工厂，也可用来改造原有的工厂，前者即通常说的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后者即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以上是讲生产要素的组合问题，还有生产要素的使用问题，即用这些生产要素生产什么，生产粮食，还是生产棉花；生产机器，还是生产食品；生产重工业品，还是生产轻工业品。再从投入产出的比较看，投入生产要素是为了产出，投入要素如何组合、如何使用，对产出的数量质量是很有影响的。如何改进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使用方式方法，增加产出数量，提高产出质量，改

* 本文写于1995年11月21日，原载《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6年第28~29期。



善产出构成，则是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问题。

生产要素不只是劳动、资本和土地。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要素，经营管理也是生产力要素。这样，生产力要素的组合使用问题就更加复杂和重要了。经济学把多用劳动的产业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把多用资本的产业称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把多用技术的产业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从人类历史发展看，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趋势是先由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再由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但这只是一般趋势，各个国家各阶段如何处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决定于许许多多因素。为了增加产出，要把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很好地组织起来，同时很好地使用，求得同样的投入有更多的产出，或同样的产出用较少的投入，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原因。

根据上面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解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适应变化了的情况，改变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用的方式方法，以求得产出的增加，更好地满足居民的需要。概括起来，它包括以下内容：（1）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特别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资本的质量。（2）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一般来说是要增加科学技术的含量，但在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解决就业问题，是一项长期的紧迫任务。（3）改进生产要素的配置，包括在部门间、行业间、地区间、企业间如何合理配置生产要素。（4）发挥生产要素的潜能。同样的生产要素和同样的生产要素组合，产出如何，还有一个发挥它们潜能的问题。

经济增长方式可以有种种分类。马克思、列宁曾用过外延和内涵、粗放和集约等分类方法。例如，马克思说过：如果生产范围扩大了，就是外延的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更有效率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他还说过：在经济学上，我们把集约耕作理解为资本在同一土地上集中，而不是在并存各个土地上的分散。列宁也说过：什么是集约化呢？这就是继续投入劳动和资本。现在人们使用较多的也是这两种分类方法。此外，还有速度和效益、数量和质量、轻型和重型等分类方法。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中的提法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有的同志把它理解为就是从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这是有一定



根据和理由的。长时期来，我们重视新建工厂而忽视改建工厂，而且新建也往往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样的外延确实也就是粗放。不过严格来说，外延型和粗放型是有区别的，外延不等于粗放，有些外延可以是集约程度很高的。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外延扩大再生产还是重要的，我们要力争外延扩大再生产也有较高的集约程度。

《建议》中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提法是准确的。正如李鹏同志在《建议的说明》中所说：我国“在生产、建设和流通等各个领域，资源消耗高，资金周转慢，损失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的问题都很突出”；“今后国内外市场竞争将主要是科技、质量、效率和效益的较量，不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一个企业乃至整个国家，就很难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

李鹏同志提出的效率问题，我认为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国家的产出（可以由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社会总产值等指标表示）决定于投入量（包括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和投入效率（即单位投入的产出量）。产出的增长率就是由投入量的增长率和投入效率的增长率共同决定的。如果理论上假定同样的投入增长率可以带来同样的产出增长率，则实际产出量的增长率减去投入量的增长率就是投入效率的增长率，并可由此计算出来投入量和投入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很高的，但主要是由于投入的增加，投入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1/4，而发达国家一般在1/2左右，发展中国家一般也达30%。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投入效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经济效率的概念和经济效益的概念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上述投入效率通常称为全要素生产率或综合要素生产率，它是总产出（国民生产总值或净国民收入）和总投入的比率。总产出经过分配（如分配为利润、税收、留利、工资），把其中的某一部分或某些部分和投入的某一部分比较，是我们通常说的经济效益指标，如资金利税率、资金利润率等等。所以，经济效益不仅决定于经济效率，而且决定于分配。改革以来，我国综合要素生产率总的还是提高的。但是，有些经济效益指标却是下降的。这是由于产出的分配格局变了，可见提高经济效益是比提高经济效率更为复杂的问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效益是什么关系呢？李鹏同志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中央多年来强调的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精神是一致的。”这是很中肯的说法。因此《建议》中明确“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是今后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第二条重要方针。我体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比提高经济效益包含着更丰富更全面的内容。《建议》第九条在说明第二条方针时明确提出要“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向科技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第十七条除了重申以上要求，又提出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以及“显著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等任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显然应该包括以上这些内容，或者说这些内容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组成部分。因此，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也要进入一个新时期，即以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时期。这个时期提高经济效益的意义更加重要了，要求更加高了，措施更加明确了。

我们还应该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学习。《建议》第五条提出要“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作为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提出来的。江泽民同志在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说：“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李鹏同志在《建议的说明》中也说：“要按照‘中国21世纪议程’的要求，努力做到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大力推广和运用节能、节材、节水、降耗技术，坚决执行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九五’计划和15年远景目标，一定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方针。这是造福当代涉及子孙的大事。在保护资源和环境的问题上，大家一定要把眼光放得更远大些。”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为了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更加丰富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一个新概念。现在这个概念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同。但人们对此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较为普遍的认识是：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



需要的能力。目前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应该在保持资源和环境永续利用的前提下促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要坚持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大力提高人口质量，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建议》体现了这些要求，同时，也说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极为丰富的。



现代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和我国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

我国为什么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一般的回答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是现代经济增长，而现代经济增长理应是集约型增长。现在我国总的来说还处于投入多、产出少的粗放型经营状态，和现代经济增长的要求很不适应，应该尽快改变粗放经营为主，向集约经营为主转变。

以上说明又引出了何谓现代经济增长乃至何谓经济增长等问题。我没有考证过这些名词是谁首先提出来的。但很多人知道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写过一本名为《现代经济增长》和一本名为《各国经济增长》的书。他在1971年接受诺贝尔奖时的演说曾给经济增长下过一个定义。他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供应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这个增长中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根据这个定义，可以把现代经济增长理解为建立在现代技术进步以及它所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基础上的经济增长。

库兹涅茨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可以追溯到经济发达国家18世纪后期。他根据对一些国家长期统计资料的分析，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具有以下六个特征。

1. 发达国家中人均产值和人口的高增长率——两者都是这些国家中以前可观察的速度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速率的大倍数。

2. 生产率（即一切投入的每单位产值）的增长率是高的，即使把劳动这个主要生产要素之外的其他要素包括在投入之中，这里生产率的速率也是过去速率的大倍数。

* 本文写于1995年11月。原载《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6年第28~29期。



3. 经济结构变动的速率是高的。结构变动的主要方面包括：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而最后工业转移到服务；生产单位规模的变化以及与此有关的从个人企业转到非个人经济企业组织，劳动的职业状况有相应的变化。

4. 有密切关系的而且很为重要的社会结构和它的意识形态也迅速变化，如城市化和世俗化。

5. 经济发达国家借助于增大的技术力量，特别是运输和通讯，通过和平和战争，有达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倾向，因而造成以前不曾有过的一个世界。

6. 现代经济增长的传播有限，占世界人口 3/4 的各国的经济成就仍远远达不到现代技术潜力可行的最低水平。

库兹涅茨着重分析了现代经济增长率提高的原因。他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指出：人均产值每 10 年增长 15%，这意味着一个世纪将翻两番。这种难以解释的人均产量的增长现象，只是很小一部分是由于人均投入的增加而增加的。现代经济增长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标志的，即人均产值增长率主要归功于各种投入的质量提高，而非投入量的增加。亦即应归功于更高的效率，即每个单位投入量的更高产出。他还指出，上面讲到的效率的高速增长是发达经济中所有主要部门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特征。农业单位投入产出量的增长幅度虽然低于工业，但也算得上发生了一场革命。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受时代革新的推动，迅速增加了世界上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存量，当这种存量被利用的时候，它就成了现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库兹涅茨还指出，结构的迅速变化也是现代经济迅速增长的因素，而知识存量的增长及其被利用也是经济结构变动的重要原因。概括起来，库茨涅茨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迅速的原因在于生产率提高，经济结构变动和知识存量增加。

库兹涅茨研究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对象的。但他没有把社会主义国家一概排斥在现代经济增长之外。他对于经济增长所下的定义以及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特征的分析，基本上也是适合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从历史事实看，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初期实行粗放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难免的甚至必然的。而到了一定时期就需要向集约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要由完全或主要依靠投入的增加改变为主要甚至完全依靠效率的提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前是不具备现代经济增长的条



件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长期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但就投入效率而言，则还处于粗放经营方式为主的阶段，需要向集约经营为主的阶段转变。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下面提供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投入数量和投入效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情况，并与我国的情况作个比较。

库兹涅茨在《各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曾列举了如下统计数字（见表1）。

表 1

项目 国别	年增长率 (%)			贡献 (%)	
	产值	投入 (包括 劳动力资本)	每一投入 单位的产值	投入的 贡献	全要素增 长率的贡献
英国 国民生产总值 1855 ~ 1913 年	1.82	0.98	0.83	54	46
1925 ~ 1929 ~ 1963 年	1.93	1.09	0.83	56	44
法国 国民生产总值 1913 ~ 1966 年	2.33	0.18	2.15	8	92
挪威 国民生产总值 1879 ~ 1899 年	1.72	0.93	0.78	54	46
1899 ~ 1956 年	2.80	0.72	2.07	26	74
美国 国民生产总值 1889 ~ 1929 年	3.70	2.43	1.24	66	34
1929 ~ 1957 年	2.95	0.64	2.30	22	78
加拿大 国民生产总值 1891 ~ 1926 年	2.96	2.02	0.92	68	32
1926 ~ 1956 年	3.89	1.18	2.68	31	69

他还分析了 1950 ~ 1962 年间一些国家影响国民收入增长的因素，结果如表 2。

表 2

项目 国别	年增长率 (%)			贡献 (%)	
	国民收入	结合投入	每一单位投入	投 入	全要素效率
英 国	2.38	0.82	1.55	35	65
法 国	4.70	0.95	3.71	14	86
比利时	3.03	0.74	2.27	25	75
荷 兰	4.52	1.67	2.80	38	62
德 国	7.26	2.67	4.47	38	62
丹 麦	3.36	1.41	1.92	43	57
挪 威	3.47	0.80	2.65	24	76
意大利	5.95	1.26	4.63	23	77
美 国	3.36	1.46	1.87	44	56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得到如下印象：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从 19 世纪中叶起投入效率的提高就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而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一般都主要是依靠投入效率的提高。例如 1950 ~ 1962 年间法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高达 86%。

以上数字资料从计算方法到结论都有争议，但用来说明现代经济增长必然要走集约经营之路还是有说服力的。它说明集约经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规律性现象。

以上国家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投入效率的贡献为什么会大幅度增加呢？促使增加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很值得认真研究。表 3 是美国数量经济学家丹尼森关于 1929 ~ 1969 年美国国民收入增长因素的数字分析资料，供参考。

表 3 1929 ~ 1969 年国民收入的增长因素 单位：%

国民收入增长因素	1929 ~ 1948 年	1948 ~ 1969 年	1929 ~ 1969 年
国民收入	100	100	100
总投入量	54.2	54.5	54.4
劳动	49.5	33.8	39.3
其中：教育	14.5	10.6	12.3
资本	4.7	20.8	15
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	45.8	45.5	45.6
其中：知识进展	22.5	30.9	27.6
改善资源分配	10.5	7.8	8.7
规模的节约	10.5	10.9	10.8

由表中数字可知，美国 1929 ~ 1969 年间增加的国民收入中，知识进展的贡献超过 1/4，改善资源分配的贡献接近 10%，规模节约的贡献超过 10%。如果把教育也算入投入效率，则投入效率的贡献高达 59.4%，接近 60%。

中国的情况如何？国家统计局的一个课题组提供了如下资料（见表 4）。这个资料和国外数字的口径不完全相同，但是用来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某些情况及其变化趋势，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表 4

时 间	经济 增长率 (%)	劳动 增长率 (%)	资本 增长率 (%)	全要素 增长率 (%)	技术进步 贡献率 (%)	劳动 贡献率 (%)	资本 贡献率 (%)
1953~1978 年	6.0	2.6	9.3	0.4	6.7	23.7	69.6
其中：“一五”	8.9	2.8	12.7	1.7	19.1	17.2	63.7
“二五”	-3.1	1.7	7.5	-7.4			
1963~1965 年	14.7	3.4	8.6	9.0	61.2	12.9	25.9
“三五”	8.3	3.7	11.5	1.1	13.3	24.7	62.0
“四五”	5.5	2.1	8.4	0.6	10.9	20.7	68.4
“五五”	6.1	2.1	8.4	1.1	18.0	19.0	63.0
1979~1993 年	9.2	2.8	12.0	2.3	25.0	16.6	58.4
其中：							
1978~1984 年	8.3	3.1	8.8	2.6	31.3	20.5	48.2
1985~1990 年	8.5	2.8	11.7	1.7	20.0	17.6	62.4
1991~1993 年	12.4	2.2	15.8	4.1	33.1	9.8	57.1

上表中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实际上相当于前面说的投入效率贡献率。我国改革以后和改革以前相比，投入效率贡献率大大提高了。这说明经济改革是十分必要、很有成效的。但是改革以来投入效率贡献率平均只有 25%，1991~1993 年有所提高，也只达到 33.1%，还远低于发达国家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水平。这说明我国还未摆脱粗放经营为主的格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属当务之急。

值得提出的是，我国即使经济发达的省区，也面临着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的紧迫任务。例如，1980~1990 年江苏省科技进步（实际上是投入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 20.7%，一本研究该省经济增长方式的书认为，该省仍处于粗放经营为主的阶段，劳动者素质比较低，机器装备的技术水平比较低，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生产力布局不合理，技术进步慢，产品质量差，资金周转慢，亟待向集约经营转变。^①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应该认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这是由以下情况决定的：

1. 我国要长时期维持较快的发展速度，而现在这样的高速度，由于投入多、产出少，付出代价太大。尤其是由于改革开放等原因，城乡居民对于增加收入的要求和预期大大提高，在个人收入消费上，农村向城市看齐，城市向外国看齐。既要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又要较快地增

^① 《集约型经济发展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加积累，如果不迅速改变粗放经营的现状，要长期维持高速增长是很困难的。出路只能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

2. 在粗放经营条件下力争高速度，难免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导致严重通货膨胀。改革以前经济不断大起大落，改革以来这种现象虽趋缓和，但也还可能出现。目前通货膨胀也还相当严重，克服通货膨胀是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正如李鹏同志所说，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当前经济生活中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以，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上集约经营道路，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避免经济发展中的大起大落和严重的通货膨胀。

3. 我国产业结构不仅面临着合理化而且面临着高级化的任务，这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长期来我们靠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现在应该依靠工业来发展农业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走集约经营之路，才能保证和促进农业健康发展。其他基础产业、第三产业发展也要求国民经济尽快走上集约经营的道路。

4. 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少，许多人均资源居于世界后列，如我国人均耕地草原面积仅相当世界平均的30%，人均森林相当世界平均的13%，人均水资源年径流量相当世界平均的25%，许多重要矿产资源情况类似。据测算，“九五”要维持8%的增长速度，按目前的能源弹性系数，能源供需差率20%左右。资源的高消耗也会加剧环境污染。目前有些地方环境污染十分严重，不改变这种状况，不仅对不起现在的居民，更对不起子孙后代。

5. 国际市场上竞争日益激烈，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而粗放经营是不会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也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6. 走集约经营的道路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实行集约型经济增长，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健康、更迅速地发展经济。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 条件和困难*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什么条件？我国已经具备了哪些条件？哪些条件尚不具备？如何才能具备？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而现在对这些问题研究得不够。

有些同志不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问题，认为只要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提高大家的认识，就能完成任务。我认为，这种看法不够全面。提高认识是很必要的。但不只是要提高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要意义的认识，还要提高对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包括需要什么条件、如何进一步创造条件等问题的认识。我认为，如果不具备必要的条件，即使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未必一定能实现这种转变。这就需要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条件，保证最终完成转变的任务。

苏联和日本的例子充分说明从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过程中条件问题的重要。苏联早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行经济集约化。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为了扭转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和经济效益差的现象，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了经济向集约化为主发展道路过渡的任务。但是，整个70年代乃至80年代初，苏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未取得进展。80年代又重新强调经济集约化方针。1986年苏共二十七次进一步确定“生产的全面集约化”、“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的方针，还提出了加速科技进步、调整投资结构、调整部门结构、提高劳动者文化技术水平以及改革经济体制等措施。但直至苏联解体仍未能真正转向集约经营的轨道。

* 本文写于1995年11月。曾载《粤港经济》1996年第3期。